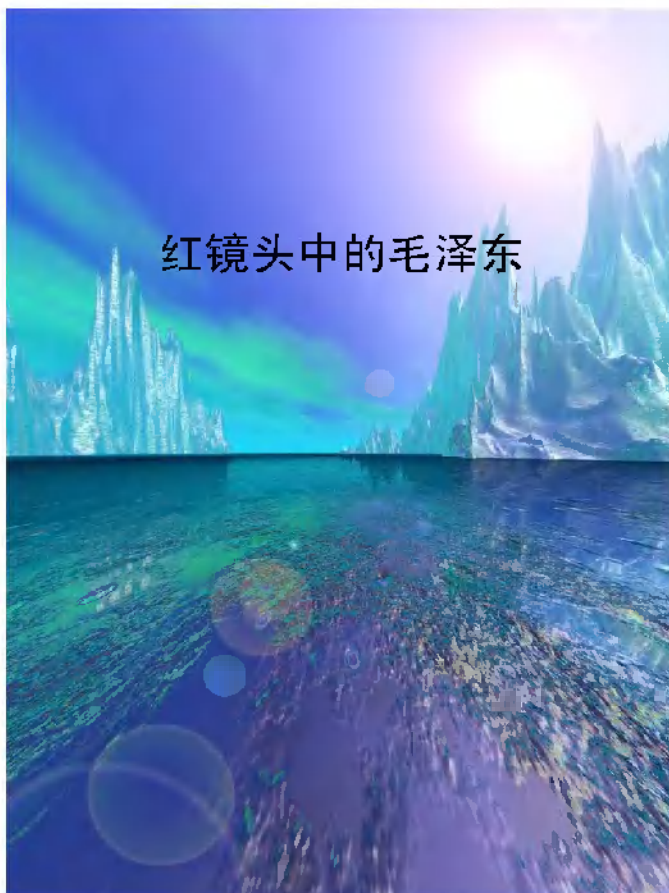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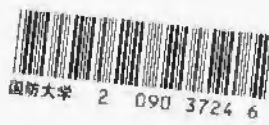


红镜头中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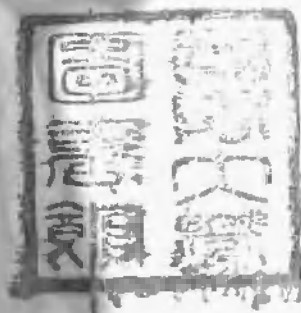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90 3724 6

顾保孜◎撰文
土彦贤◎摄影

红镜头中的

毛泽东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杜修贤 顾保孜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镜头中的毛泽东/杜修贤, 顾保孜编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5

(红镜头系列)

ISBN 7-205-05503-2

I. 红… II. ①杜…②顾… III. 毛泽东 (1893 ~ 1976) —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A75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938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24 1/2

字 数: 33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放 姜 钊

封面设计: 曹小东

版式设计: 王瑶菲

责任校对: 刘再升 崔维诚

定 价: 39.80 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编辑室电话: 024—23284323 23284244

电邮: louling@mail.lnpgc.com.cn

对于读者来说，这些用镜头记录下来的瞬间就是历史，而对于历史来说，这些精彩瞬间则是永恒。

——《中国图书商报》

就这套图书和特点而论，它们就“隐藏在作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摄影记者杜修贤对于两位领袖人物的近距离接触之中。”

——《中华读书报》

这些“充满感情的回忆，既满足了人们对于老一辈领袖工作和生活细节的好奇，也给了读者一个全新视角……”

——《中华读书报》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美丽的中南海……………2
第二章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30
第三章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68
第四章	不平凡的12月26日……………118
第五章	庐山飞云雾……………144
第六章	日出日落天安门……………176
第七章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202
第八章	面对诗友的遗像……………224
第九章	最后一次南巡……………258
第十章	泾渭分明的较量……………278
第十一章	同志加兄弟……………312
第十二章	巨星陨落前的霞光……………342
第十三章	无尽的思念……………366


AC 157/12

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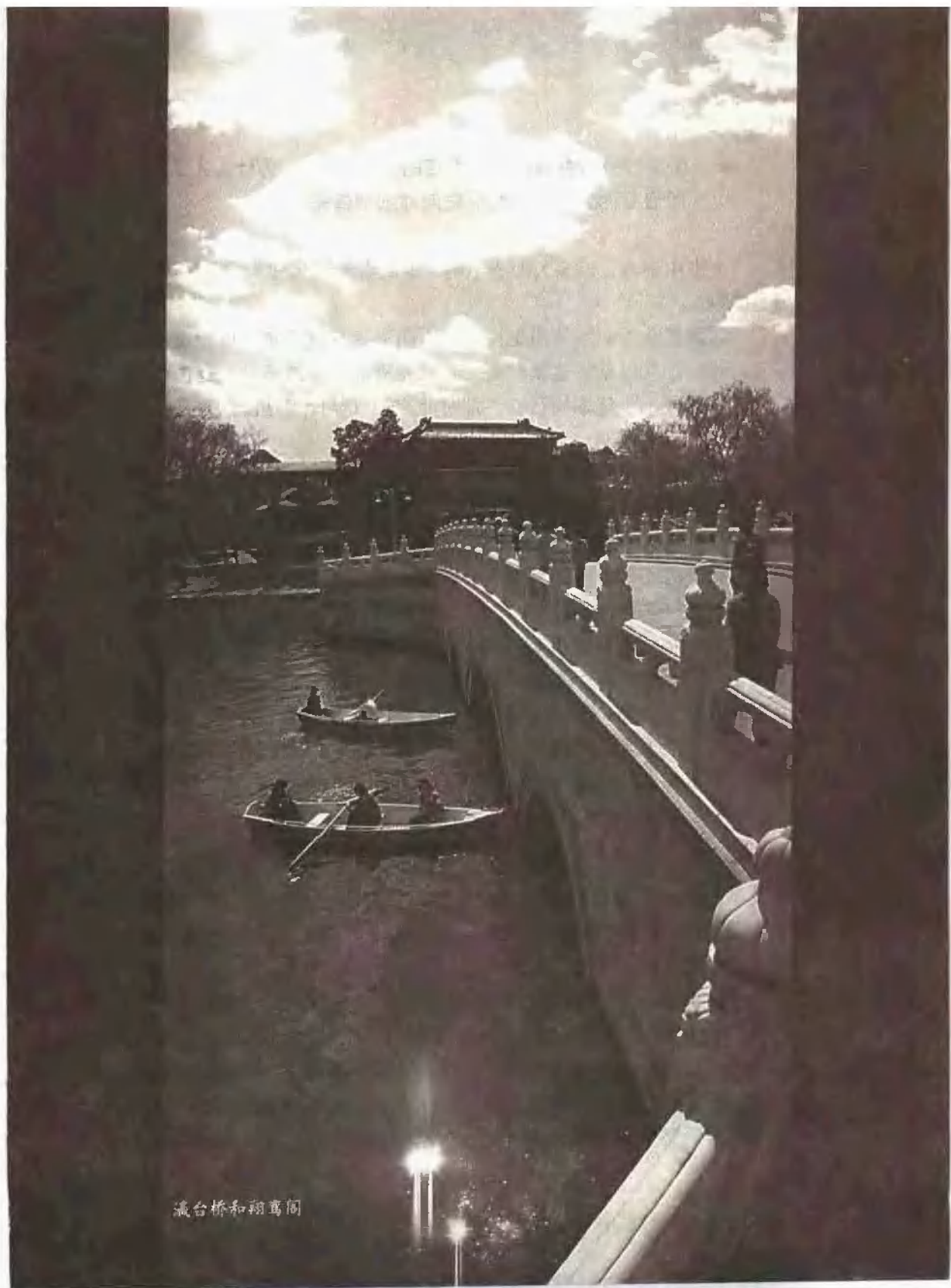
中南海——她不仅是中国政治的心脏，也是一处庄严神圣且充满神秘的地方。因为她与昨天古老悠久的历史，与今天波澜壮阔的局势，与明天充满希望的新岸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中南海是美丽的，是古老的，也是崭新的，这里的一草一木记载着新老主人的足迹，一砖一瓦记录了从古至今高层人物的故事。一桌一椅记忆了无数引人入胜的传说。

因此，当镜头成为书写历史的巨笔时，一个美丽神秘的中南海与她羽翼下的“主人们”真实而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第一章
美丽的中南海



儀台橋和翔鸞閣

★ 干涸的京城竟有泱泱七百亩的“大海子”。为什么人工湖泊要称为“海”？历史向你细细道来

走进中南海，很多人困惑不解，中南海为什么称为“海”，明明是湖嘛！

这就要从中南海的历史说起。中南海这片宫廷建筑群始建于辽宋时代。辽代以前，这里曾是一片风光秀丽的自然湖泊，辽国曾在这群自然湖泊上建瑶屿行宫，那时北京的气候比现在湿润得多，燕山山脉的森林茂密，坝上草原水草丰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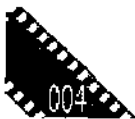
辽国盛极而衰，金朝取而代之，这块自然湖泊上的宫殿迎来了新的主人。公元1153年，金王朝正式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新的主人给瑶屿行宫以新的名称，以表示其极力和自己特有的偏好，于是瑶屿行宫更名为“西华潭”。金王朝一声令下，上万民工开始对这一带进行开挖和改造，使之具有更多人为的痕迹。

斗转星移，又到改朝换代时。蒙古英雄忽必烈挥师驱兵南下，人主中原，把以灿烂文化引为自豪的汉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在燕京建立首都，改名大都。皇宫御苑仍在金朝的老地方，自然又免不了一番整修，几次扩建。这个人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世代代在干旱的蒙古草原上生活的部落，对水就像生命一样珍惜，认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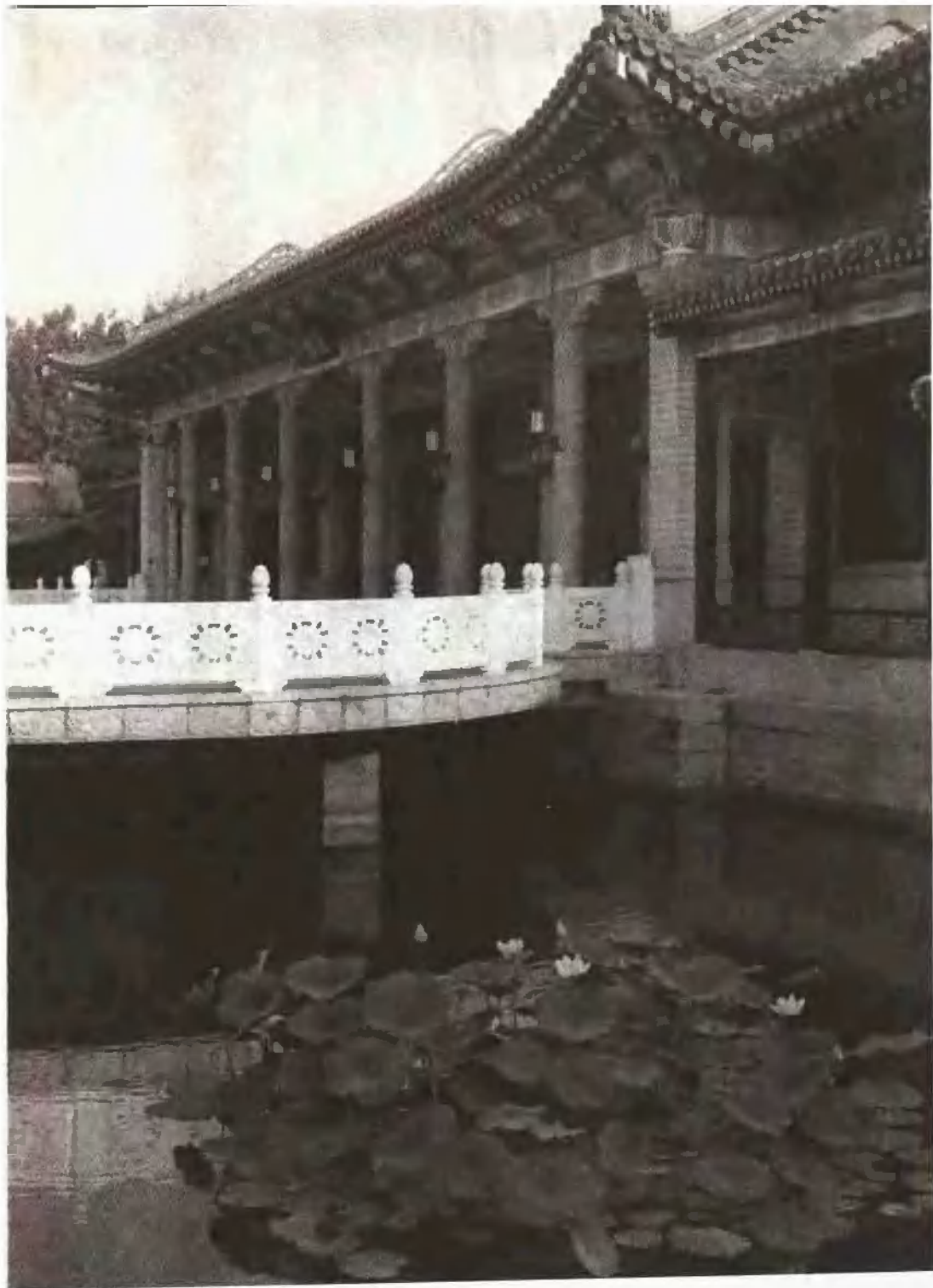
就像花园一样美丽。古代蒙语称水为“海”，“海子”意即花园。一长串经过人工拓展的湖泊：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北海、中海、南海，元代大都城内的湖泊都被称为“海”，中南海的“海”来历也源于此。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改元代国都大都城为北平，1403年明成祖即位，从南京迁都北平，改为北京。明成祖不再在原来的金元皇宫的基础上拓建，而在它的东面营造起一座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的崭新皇宫——紫禁城。明成祖这次营建紫禁城的一大功绩，是为整个北京城确立下一条由北而南的中轴线，乃世代不朽的





山亭之舟



春耦齋

屬丰澤園的一部分。清高宗（乾隆）常在此休閒吟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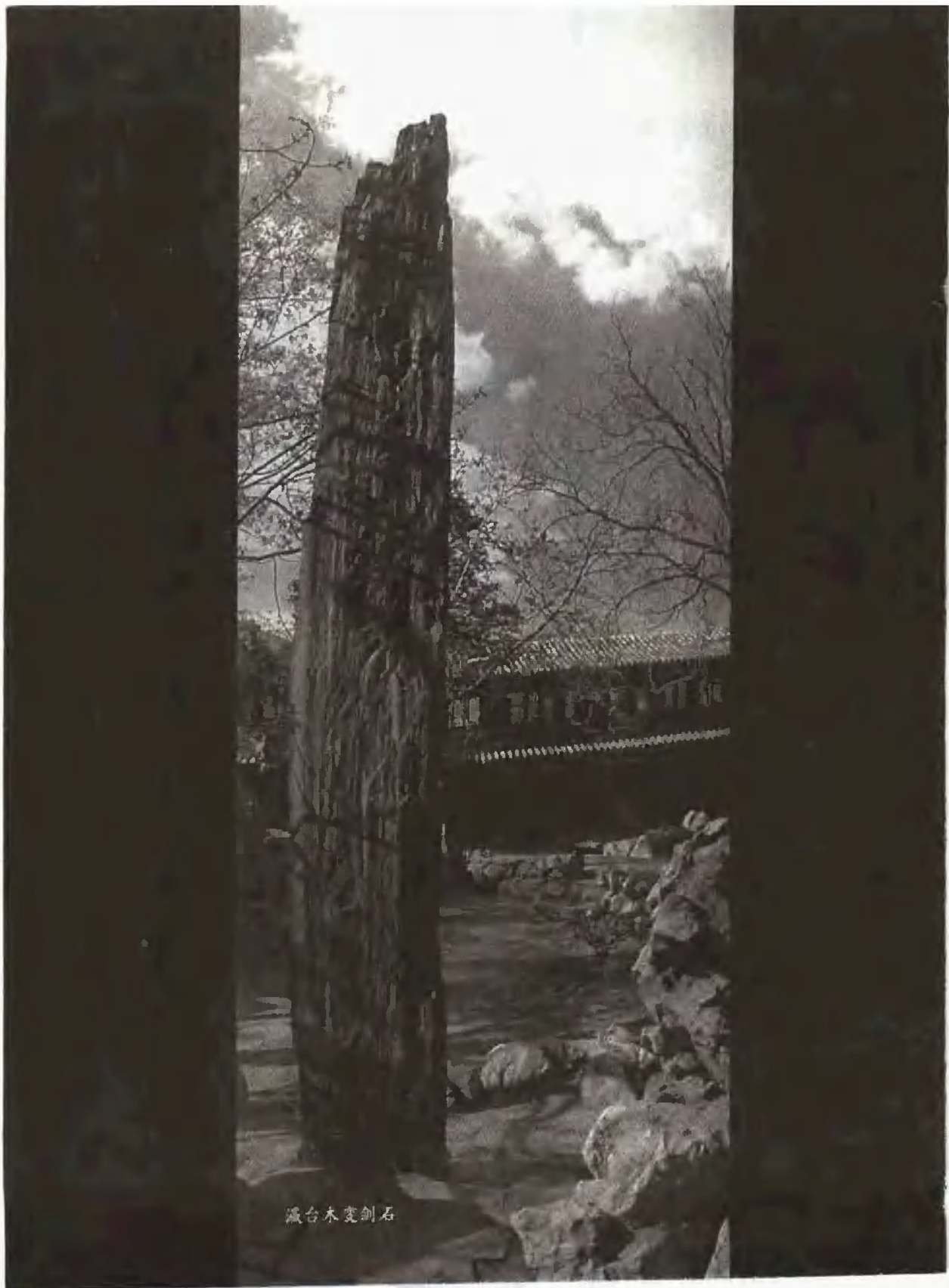
静谷内垫脚石。



基业。原来环水而筑的金元皇宫，则改称“西苑”、“西海子”，作为皇帝的避暑行宫。明世宗时，又在“西海子”上建造起南北两座汉白玉桥，南面蜈蚣桥之南为“南海”，北面的金鳌玉蝀桥之北为“北海”，两桥之间的狭长水面为“中海”。

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起大清王朝，亦定都北京，继续营造紫禁城，拓建西苑三海子。清王朝重新开挖三海，堆土为山，广植林木，山威而海水阔，林秀而宫室幽，成为皇家的洞天福地。

这样，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七百多年的精心营建，西苑三海集山、海、岛、桥、亭、阁、廊、榭，宫阙于一园，成为



藏台木变剑石

真正的人间仙境了。

1912年，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被迫迁出紫禁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南起午门，北至神武门的广大宫室改为“故宫历史博物院”，俗称故宫。原来的西苑三海，以金鳌玉蝾桥为界，北海被辟作平民公园，中海、南海则被北洋军阀首领、窃国大盗袁世凯占据，做了大总统府。这样一来，整座西苑三海便一分为三了。做了“大总统府”的中南海，面积达一千五百亩，其中水面占七百亩。它比东面的故宫大出三分之一，比北海的北海公园则大出近一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南海是迄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占地最广大、保存最完整、风光最秀丽，政治最神秘的一座皇家园林。

★ “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菊香书屋”更显清幽典雅。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

在中南海高大的院墙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建筑群。从中南海的南门，也就是新华门进入中南海，顺着南海西岸的马路行至北头，便会看到一个大院，正门上方所悬的黑色匾额上，雕刻着乾隆皇帝手书的三个金色大字“丰泽园”。丰泽园建于清康熙年间。门外原有

稻田数亩、桑树数十株，为清王室每年仲春演耕之处。

“丰泽园”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群，它由许多小院落组成。

进入丰泽园庭院，迎面为颐年堂，之后为澄怀堂，澄怀堂之后为遐瞩楼。穿过颐年堂东侧，有走廊通往东面一座四合院，就是著名的“菊香书屋”。康熙题联曰：“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静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之前曾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住进，自己搬到西花厅。





丰泽园

010

如果说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那么“菊香书屋”则更显清幽典雅。

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将毛泽东安排在菊香书屋居住是多么美妙，因为这和意志坚强酷爱读书的毛泽东个性很贴近！同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里有一个名为“不染亭”的四方亭也和它的主人个性多么相似！

有幸走进挂着“菊香书屋”匾额房子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厅，穿过它才是一所院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菊香书屋改成“菊香书院”更为合适。



毛主席生前住了17年的住所
菊香书屋（1949-1966）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间呈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为什么有人将毛泽东比喻为“紫云轩主人”？这是由这个牌匾而来。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挖的，毛泽东从来未使用过。这里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五间。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洗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西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工作人员称它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大小、一样格式

相对称的。

东厢房也是五间。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

西厢房也是五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过厅南侧的两间，至今没人披露它到底作何用途。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



静谷

位于丰泽园西边，内有纯一斋、春耦斋、爱翠楼、植秀轩等古迹，并有连理柏一株。园内屏山镜水，云岩奇秀，华林芳径，竹柏葱茏，有“园中之园”之称。



静谷内双廊。

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小的便门出入。

毛泽东很少从西便门出入，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厨师运粮运菜大都经过此门出入，有时也利用北侧的便门。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院内来，找毛泽东，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



流水音

水中的亭子，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在明代无逸殿旧址上新建。亭内有流水九曲，系沿古时“曲水流觞”的习俗而来，名“流杯亭”。当年这里曾有飞泉瀑布下注池中。清高宗（乾隆）曾在亭上亲题匾额“流水音”，此后就习称这里为“流水音”。



1962年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





018

1960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丰泽园门前交谈。新华社记者摄

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里又好像是“客栈”。

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因此这里经常来住一些工作人员的孩子。

出了菊香书屋正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由保健医生王鹤滨住在了那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据一些书籍记载，这里可能是澄怀堂。靠东头的房间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也曾在这里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过面条汤，度过他的生日。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有一次，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置换新鲜的氧气。

初夏时节，这座古旧的四合小院门口摆放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盆花。

“过去这里是公园，由他们随意美化，我们不干涉。可现在我住

在这里，就不要摆了吧。摆一点松柏怎么样？”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商量。

工作人员露出了不解之色。

“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会有工人农民来。”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工作人员立即同花工商量，挪走花盆，只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棵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两盆绿草。

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





毛主席的办公桌朴素而大方，一篇篇富有激情的诗文均从这里诞生。

020

- ★ 毛泽东在生活起居方面以简单随便著称，但对自己的床却有与众不同的“讲究”。一生喜爱简朴的毛泽东，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惊人的“财富”！

当走进紫云轩毛泽东的起居室时，你会惊讶地看到，毛泽东睡的硬木板双人床不仅十分宽大，而且十分简朴，大床的一半放满了整整一尺高的书籍。

这张既不高贵又不豪华的大木板床可谓来之不易，这其中还有



毛主席独特的大木床。



毛主席简朴的饮食。

一段故事呢。

当毛泽东初进北京时，便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一通脾气。原来，毛泽东对卧室那张弹簧床极不满意。其实，这间卧室内惟一豪华的家具就是这张弹簧床。警卫员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床，坐在上面就像是坐在沙发上一样。他们觉得这个床要比毛泽东在农村时睡的任何一张床都要高级，于是将这张床摆好，等待新主人休息。可新主人毛泽东并不买账。他看到这张床，声音很高地对工作人员说：“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他指示卫士们赶紧撤走弹簧床，并说“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吃饭、睡觉、工作，可谓人生三件大事。毛泽东在生活起居方面以简单随便著称，但是，他对床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讲究”。

毛泽东对床有独到的要求——不能是沙发床、席梦思之类的软床，而是木板硬床。

转战陕北时，陕北的老百姓睡火炕，毛泽东睡不惯，走到哪儿，都是临时借用老乡的门板。毛泽东住在河底村时，房东的门卸不下来，他只好睡在火炕上，结果睡得不好。房东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家听说了这事，立刻将门轴锯了，把门取了下来。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批评那个干部“乱弹琴”。随后，毛泽东又检查了那两扇

022

门，看到再安上不受影响，才不生气了。

毛泽东发火引起工作人员的恐慌，临时到哪里去找木板床呢？而毛泽东以前睡的木板床又没有带来。这可怎么办？大家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劝毛泽东暂时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再想办法。

正在伏案工作的毛泽东听了这种安排，头也不抬地说：“弄了木板床来后我再睡。”显然，毛泽东牛脾气又上来了，如果不能弄到木板床，他是不肯睡觉休息的。于是，管理科的同志们赶紧请木匠连夜为毛泽东赶做了一张大木板床。天快明了，毛泽东终于看见了这张木床，很满意，上床倒头就睡，而那张豪华的席梦思被冷落一边，



科学家在中南海参观。

直到后来被搬走。

几个月后，这张木板床随着毛泽东搬进了菊香书屋。不久，工作人员又对毛泽东的木板床进行了改造，使它变大了，足有5尺宽。为什么要把木板床加宽呢？因为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办

公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用来放书的。平时，毛泽东床上的书堆得足有一尺多高。毛泽东自己说过：“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至于我更是比一般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要多。因此，我的床一定要舒服一些。”

改进后的木板床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毫无刻意雕饰，与一般人家的木板床并无区别；二是宽大，可以放很多书。

毛泽东深为满意。此后，他一直睡这种木板床，从来未曾改变过。

这些和他相伴的书都是平时常要看的，一摞摞有秩序地排在床铺的东半侧，等候着主人去阅读、理解和思考。毛泽东将每本书看

紫光閣

1954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在紫光閣前交流。

新华社記者攝





毛主席经常阅读的书籍

过的部分都夹上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记录上的铅笔字。这些纸条都有半截垂露在外面，好像是书的装饰物，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查寻。正看着的书籍还要继续看时，则卷着摆放在那里。这些书籍几乎都是线装的古书。毛泽东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作过馆员有关。

据说，毛泽东最后居住的“游泳池”书房里的书和丰泽园收藏的书共有十多万册。一生喜爱简朴的毛泽东，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惊人的“财富”！至今，书籍、手稿还未全部整理出来，可见这“海洋”之大之深！

毛泽东爱书，爱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饭茶不思的境界。他的办公室、寝室、饭桌、卧榻甚至卫生间，信手拈来都是书。处处显示着书的世界，书的天地和书的魅力。毛泽东每日同书作伴，每日与书共寝。

毛泽东的床头桌右侧，放着盏台灯。只要他未在睡眠中，那盏





毛主席的部分证件。



颐年堂内景。



1950年4月12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颐年堂接见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代表。毛主席在向代表讲话。左二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新华社记者摄



027

台灯总是亮着伴着读书人。在灯光下的书被照得很醒目，主席半卧着读书……当工作人员走进他的寝室时，常会看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一点儿也没有觉察有人走进来，读到有趣之处，常常听到从他那抖动着的喉部迸发出的“格格格”的笑声。

毛泽东的藏书室，设在北房西侧的里间和西厢房靠北侧的两间房屋内，在占据了近一半空间的书架上，摆满了夹着纸条的书籍，其中线装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

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毛泽东推崇司马迁的《史记》。

在近代的著作中，毛泽东赞赏鲁迅先生的著作，对郭沫若的著



1956年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
陈毅，张闻天在颐年堂院内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

作也很关心。每当毛泽东日以继夜地工作之后，走下工作台，说要去睡觉休息了，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就好像卸下了一天的重担，放松下来，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好消息一样，互相转告着：

“主席要休息啦！”


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了，毛泽东从办公室走进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就要睡眠休息了。常常是回到寝室之后，灯光仍然久久不熄，原来他又转入了另外一种工作状态——在灯下看书！

毛泽东起居室里的灯光成了值班卫士观察他读书或睡眠的一个信号。所以每当毛泽东进入卧室后，值班卫士就把视线盯在向南的窗子上，看着那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一小时、两小时地亮着，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还没有休息。这时，大家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影响健康。有时见灯光熄灭得早一些，值班的卫士便会把此事看成是自己值班中的成绩或幸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开了居住了17年的菊香书屋，搬到临中海西湖畔的游泳池旁的一栋普通平房居住。开始是因为毛泽东爱游泳，经常在游泳池边看书、会见客人甚至办公，旁边的房子正好供他休息之用。时间一长，毛泽东干脆在这里住了下来，直到后来把这里变成了居住的地方。他的客厅也兼书房，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读书的地方，这里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令人叹为

观止。那环壁而立的简易书架和层层叠叠的厚书，将人带进了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大世界。毛泽东这小小的书房，犹如地球的一个支撑点，将他精辟的论点和科学的预见，交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





第二章
走进毛泽东的
本色世界



毛泽东主席在“游泳池”书房接见外宾。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毛泽东。 新华社记者摄



★ 摄影记者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也是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同时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多年从事政坛摄影，他有一种重如泰山的压力和责任。然而对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这一重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否胜任没有把握。这时，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诗：高处不胜寒。



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于1966年8月以后在这里居住、办公。

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

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如此，与其犹犹豫豫不如下干脆脆答应了。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服务员合影。

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对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

杜修贤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他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游泳池。

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

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的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

整齐地放着一摆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特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他拿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

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不爱面对镜头的，记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准备提供给画家们使用。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要更换，画家需要临摹的样本，这个拍摄“样本”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新闻摄影小组几个记者的身上。几个记者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任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

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大家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



侧转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

大家见主席放松了，也跟着松了口气。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

过了一会，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有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就一律拦在门外。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周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杜修贤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他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

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毛泽东充满了自信。

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



笑容可掬、喜感亲切的毛泽东。 新华社记者攝



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工作人员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杜修贤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没有想到，这个在中南海干了10年的摄影师一个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就这样降临了。

他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的巨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这简直不可思议！连他会吸烟主席都知道。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哎！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吗？”

杜修贤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呢！”

杜修贤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

他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这一番话勾起了杜修贤遥远的回忆。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了起来。

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每个细节都被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儿接在口袋里，另一个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

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忽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谈完话，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离开主席住所，杜修贤想起了那根雪茄烟，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带劲！原来，他留个心眼：这烟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支雪茄烟杜修贤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许有些年轻人感到他的举动似乎可笑。然而，这却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民，对领袖爱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实流露。

★ 杜修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期间，他的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骤然衰老再也躲不过真实的镜头，而八方责难却向他涌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

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医生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也很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当时周恩来也身患绝症）。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毛澤東主席滿面笑容和人民大會堂的女服務員合影。



毛泽东在第三届人代会上与代表握手。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



197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044

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

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地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

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

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上就座的。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的镜头。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大家的心上。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的记者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后，他却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伙伴们几乎施展了浑身的

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

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

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意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里，江青绝没有记者们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呛：“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你们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样写道“我们对人民日

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可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应。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





毛泽东平时喜欢随意自如地和人交流，他的神态总那样平和智慧。

纸”，再看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应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励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那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毛泽东也不能拒绝这些热忱的请求。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快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

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不停地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不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晚年的毛泽东对华国锋寄予厚望。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



中南海游泳池书房——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的地方。

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里，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儿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朗月，皎皎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紧放线架片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一点，片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啊！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他今天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呀！

第一次的“三分钟”难关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泽东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三分钟摄影时间的最佳分配，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052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好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

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 在江青的提议下，毛泽东书房第一次安装了提影固定灯，解决了刺眼的问题。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就开错了两组灯

1973年2月，基辛格又一次飞过太平洋，来到中国。

也不知是老友相速还是病情好转，毛泽东这次和基辛格会谈，精

神出乎意料地好。审片时，江青也出乎意料地叫好。看得出来，江青当时的高兴情绪是由衷的表露。

“这个镜头拍得好，带劲。主席谈话时津津有味，人民看见会多高兴！”江青倚在高背沙发上，嗓音吊得很高。

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活动的地方。她的放映厅也在这幢楼里。放映厅不大，很舒适。每次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总理放片后再赶到江青的放映厅，杜修贤就有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总理没有自己的放映厅，不是不能配备，而是他从不肯要。所以他在哪儿工作或活动，我们就要将放映机和卷帘幕布带到哪儿，等他利用空隙时间





1973年，为保护毛主席的眼睛，工作人员在书房里试验灯光。

审片。

“主席的眼睛怎么啦？刚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话。工作人员赶紧倒片重看这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画面，果真毛泽东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眯眼表情。

“可能是怕灯光。”杜修贤回答说。

江青朝后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直到片子结束，她没有再说话。

杜修贤和江青平时接触较多，知道她性格的特点，喜怒无常患得患失的。说好听点，搞文艺出身的性格特点。说不好听，这性格

让人觉得神经兮兮的。

嘴碎爱唠叨是某些女人的天性。

他们不怕江青话多，倒怕她阴沉不说话。沉默之后，往往是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风骤雨”。这几年，杜修贤已基本学会和江青近距离打交道的“艺术”——“敬而远之”。

江青不等杜修贤他们出门先开了口：“你们等一下子走。我们谈谈主席眼睛预防问题……主席看书多，光强了，他的眼睛受不了哇！”

江青这番话和这种带感情的语调，使得杜修贤有点感动。“是的，主席上次会见黎德寿后讲‘我最怕这个灯’。我们听了都很着急，可是拍摄时又不能不打摄影灯，也不知想什么办法好。”

江青望望杜修贤，站起身，慷慨激昂的语气里带着大弧度的手势：“可不可以在主席的书房里安固定灯？安在高处。主席座位后面安侧光灯，作为主灯。把开关安在书房外面，这样不会惊动主席。光不直射眼睛，效果也能出来。这既是替主席着想，也是替你们拍摄着想。和办公厅主任说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杜修贤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路子。以前他们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技术上没有把握，加上考虑不成熟，没有敢向上提出来。这次不妨借助江青的积极性把主席那里的光线——可以说是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好。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江青高兴了，她喜欢有人响应她的建议。“我替你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你们创造这个条件。两边暗的地方都可以达到，你们能做得到吗？”

她说的两边暗是指主席书房里两侧光线很暗，固定灯可以照到。你们能做得到吗？估计是指摄影师们摄影灯不及固定灯照耀范围广。

“这事你们要极告总理，也要给主席打个招呼。”江青越谈越兴奋，“光太强了，受不了，很刺眼。我有个小工作间，里面装了几个灯，光从上面打下来，高一米五，前面补助一点，弱一点，有立体感。这样不刺眼，你们拍彩色的光还可以再强一些。”

江青一直有摄影的爱好。她拍照片特别爱在光上作文章。但谁





1973年，为保护毛主席的眼睛，工作人员在书房里试验灯光。

审片。

“主席的眼睛怎么啦？刚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话。工作人员赶紧倒片重看这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画面，果真毛泽东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眯眼表情。

“可能是怕灯光。”杜修贤回答说。

江青朝后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直到片子结束，她没有再说话。

杜修贤和江青平时接触较多，知道她性格的特点，喜怒无常患得患失的。说好听点，搞文艺出身的性格特点。说不好听，这性格

志，如主席不反对，则应先在别处安装试拍，力求安全，测量座位要准确。试好后，再设法安装到主席处，不要临时办，容易出毛病。”

过了两天这份报告回到杜修贤手里时，上面已签满了字。他奇怪地发现，江青用黑铅笔（其他人的批示均是钢笔和红笔）在报告中“主席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波浪线，杜修贤琢磨了半天也没领会出什么意思。

1973年3月，固定灯正式安装在毛泽东的书房里。神情忧郁的毛泽东陷在沙发里，只是抬头看了看高处几个陌生并不起眼的灯座。目光没有闪过惊讶，也没有过多地停留，很快就将视线投在用放大镜扩大出来的字体上。

固定灯安装好后，第一次使用在4月，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

那天，拍摄人员在4号楼待命。警卫局来电话，说是主席今天会见客人。外宾已去长城。杜修贤他们略略地放松了紧张的情绪，但是不敢离开房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说怕万一，万一还真来了。两小时前外宾去了长城，两小时后毛泽东突然要见客。警卫局一边通知杜修贤他们，一边电话追长城的外宾。他们管不了长城那头，这头可不能有一丝差错。杜修贤又将固定灯试拍的程序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以防还有什么细节被遗漏。

有了固定灯，他们轻松了许多，至少省去一大团拖拖拉拉的电线和几个怕碰怕摔的摄影灯。半小时，他们就到了“海里”。

第一次使用固定灯，尽管已经试拍过，效果还不错，但杜修贤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去试了试开关，这开关安在书房外间，而固定灯在里边，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又看不见里面。这合理吗？这个感觉在他的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意识到会出什么差错。

毛泽东已在书房里等了一会儿了，客人才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外面见客人走进书房，就赶紧打开主席身后的两组灯，光从侧面约三米高的地方对射过来。光影交叠投在毛泽东和几张相邻的沙发上，光很明亮却不直射人的脸部。层次、背景都出来了。总理也几次抬头观察侧面的灯座。



杜修贤他们挺高兴，觉得光线还不错。两分钟很顺利地拿了下來。退出书房杜修贤将开关关了，里面顿时暗了许多，但沙发旁边立着落地灯，毛泽东和客人好像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只有总理朝门口看了一眼。

门外留了一个记者在负责开门口的两组灯，杜修贤等人先进去等会谈结束，拍摄主席送客人的镜头。门外的这位记者从门缝里看见主席站起了身，以为会谈结束了，就赶紧将门口的灯打开，没想到开错了，开成主席身后的两组灯，一慌，又忙把门口的两组灯也给打开了。屋里4组10盏800w的灯都开了，一片雪亮。拍电影和拍电视的人也没注意光线强弱，以开灯为拍摄信号，打开机子突突直转。杜修贤定睛一看，主席不是往门口走而是朝书架方向走去，可能是给外宾取书，这时灯亮了正合他老人家的意，他立在书架前从容不迫地选书……

杜修贤急得一步奔到门外想关掉两组灯，手触到开关又缩了回来，正在灯下取书的主席，眼睛怎能禁得起这一明一暗的刺激？再看看里面的人，吓得他魂都飞了，个个脸被强光照得发白，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和摄像肯定要曝光过度……主席咋还不离开书架？咋还不快送客人？

顿时他的脊背冷汗涔涔。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却像挺了一个世纪，主席才出现在书房

的门口。

这次拍摄八成要砸了，杜修贤心里直嘀咕。

照片画面发白，毫无疑问，曝光过了。只好在放大时加以校正。还算好，照片补救过来了。总理没有看出破绽，签发了。照片这一关过了，可电影电视呢？电影记者回了话，说光线基本调过来了。电视可苦了，片基小，光过了就无法调过来，画面发白。

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放完电视片，总理就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杜修贤。他心虚，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嗫嚅道：“电视光过了。主席那灯打过了……多开了两组灯……”



“这怪你没指挥好。你是组长，电视没拍好，你也有责任！看电影。”

灯灭。小银幕上出现了晃动的人影，解说员轻柔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总理这时看见毛泽东和客人坐下谈话，说：“两个人谈话，这样比较好。”

画面出现主席送客人的场景时，杜修贤心里突突地跳，就这时他们将灯开错了。黑暗中，他看总理对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心想电影片可能要好一些。画面上的车队出中南海的南门，拍摄了街道上的建筑。

“这是新角度，拍大街。后面是电报大楼吗？”总理问。

“是的。”

“电影比电视好一些，但光还是有些过了。”

“原来规定好的，到时没想到多开了两组灯，不然光不会过的。我们试片时，片子效果还是不错的。”杜修贤本想解释光过了不是固定灯的问题。

“规定归规定，到时就乱了。这是谁的手？”画面上闪过手的动作。杜修贤一看差点没笑出声，这不是他的手吗？打手势叫门外的人关灯，怎么上了镜头？片子又倒回来重放了有手的镜头，“去掉，不能乱。以后要指挥好。”

“嗯！”杜修贤赶紧应了一声。

总理看完片子，说：“片子送钓鱼台。”

钓鱼台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杜修贤看了看表，已近凌晨。

到钓鱼台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睡，杜修贤将放映工作安排好，头好像要裂开一样，算算快一天一夜没有睡上完整的觉。一会儿，张春桥和姚文元脚前脚后来了，刚坐下，江青摇曳着风衣也来了，她很舒服地朝后一靠，双腿搁在一张软垫凳上。不知为什么王洪文没有来。杜修贤暗暗观察一下，来的三位似乎已进入审片状态，就没等，便开始放映电影。

下午他们几位在大会堂里看过电视机里放的样片，就不准备再



放电视了。

“比电视好一些嘛。”江青首先打破沉默。

“电影比电视片基大，可以调光。”杜修贤介绍电影胶片的性能，没想到引起江青的注意。“主席这次精神还可以，脸上的光怎么平了？”江青的镜片在黑暗中闪烁着反光。“多开灯啦？”她很敏感也很在行，杜修贤知道这事瞒不了她，就直说：“多开了两组灯。”

“开错了？”

“是的。”

她不吭气了，头一扭，像和谁赌气似的。

张春桥冷不丁说了一句：“这个片子是比电视好一些，但光也过了。主席像穿着旧衣服，灰白灰白的。”

见他们这个态度，杜修贤就问姚文元：“这个片子还送不送外宾？”

“嗯。”姚文元含糊不清地应了声。过了一会儿好像才反应过来：“噢，当然送客人，他们来当然要这个纪念意义的礼品。你拍照片，每个客人和主席握手的都照了吗？”

“都照了。”

“几个人？”

“七八个人吧。”

“他们外国人都想要和主席合影的照片，少一张他们就不走。”姚文元对旁边的张春桥说。

“可不是？时间紧，客人多，个个都要和主席握手留念……”杜修贤想趁机诉几声苦。

姚文元毫不同情地打断他的诉苦：“人家外宾千里迢迢来中国，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握上手没有照片，当然有意见。你们无论如何要拍好主席，拍不好全国人民要骂死了。”

他们拍摄的种种艰辛和苦衷，有谁能理解？杜修贤真感到窝火也感到窝囊。

江青这时插了进来：“你能不能负责开灯啊？”

“我？我还要照相。”杜修贤不由得口气生硬起来。



“对呀，这是个矛盾。”江青没听出他口气冲，仍沉浸在她的灯光里。

姚文元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下次要改。”可杜修贤却觉得他一语双关。改什么？灯光，片子，还是脾气？

他不挑明，杜修贤也不说什么。可江青老在灯光上纠缠不休，听得人心烦，既不能发作，又不能躲开。憋得人难受。

姚文元不想再在灯光上停留，站起身，边走边说：“试验不紧张，正式拍摄就紧张。拍了那么多次还紧张？”

杜修贤嗓门又直了：“能不紧张？一家一个，都怕片子出毛病。再说，开灯的人也看不见里面……”

张春桥看了他一眼，眼光很深，杜修贤禁不住打个寒颤，煞住话头。

走到门外，江青还叫住他们，要他们专门研究固定灯的使用，好好总结经验。

回到4号楼，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第二天，电影电视又改了一遍，请示总理是否再看。秘书回话：改了就行，不看了。

姚文元也回了话：写个检查。

按照经验，这个检查非杜修贤这个组长写不可了，而且还不能轻描淡写。

没有想到，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长篇检查如石沉大海，送上去就不再见回音。

★ 周恩来跟“两线”较上了真，并批评杜修贤是“三十无害论者”。直到毛泽东书房里重新安上无害光线固定灯，历时半年的“两线”风波才告结束

毛泽东书房里安了固定灯，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最先进的摄影灯具了，正像江青说的那样：“你们条件不错啦！有固定灯，北影厂的





毛泽东主席在书房里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这时的灯光明显打强了，引起周总理的重视。

062

灯具更差，还比不上你们呢。”想想看，一个大电影厂竟比不上一个小小的摄影组，能知足吗？

就在大家心满意足的时候，没想到灯光里却隐藏了眼睛看不见，用手摸不着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当超过一定数量，对人体就有害。而在这方面他们却一无所知，可以说，他们兴高采烈地将有害光线请进了主席的书房里。

一天，警卫局局长杨德中打电话给杜修贤：“老杜，总理最近看见一份外国资料，那上面说我们中国用的摄影灯，是含紫外线较多的强灯光，对人的身体有害。总理指示要你负责这项工作。你查一

查你们协作组用的灯光和闪光灯，做个技术鉴定，含不含有害光线和有害程度，尽快作个书面报告。”

杨德中说得有道理，拍摄中央高层人士这事可是马虎不得的。杜修贤答应他立即去查。

连夜，杜修贤就将事情汇报给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石少华，事不宜迟，当即召集外事协作组和有关研制人员开会。会上决定请上海的专家做技术鉴定。

第二天晚上，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见到总理，不等他主动汇报灯光的事情，总理就先问：“老杜，德中打电话给你了吗？”

“打了。我们已连夜布置对灯光进行技术鉴定。”

“你上次对我说，美国人说我们的灯好，好在什么地方？”

“灯体积小，轻便，亮度大，灯前加了毛玻璃，光柔不刺眼。”

“有没有超量的紫外线和红外线？”

“这……这，少华同志已去上海鉴定了。”杜修贤有点语塞。

“没有搞清楚，还能用吗？”

“……”杜修贤无言可答。

他叹了口气，痛惜地说：“主席的眼睛与经常受摄影灯照射有关系，医生说的，眼睛就是这个灯照坏的。中央首长里有许多人的眼睛都不行，活动后感到眼睛发胀发花。唉，这怪我没有及早发现这个严重性，强光照多了，慢慢积累就会诱发眼病，以前不知道，没

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在一个外国的资料上看到，说我们用的摄影灯光强，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对身体有害。你们只管照，也不管有害无害？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啊！你们是拍摄中央领导人的记者，外国人都知道有害，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总理表情很严肃，好像指责他一点都不管中央领导人的眼睛似的，杜修贤心里有点委屈。

“主席那儿我们使用了固定灯，没有再使用摄影灯。”

“许多公开场合，不是还使用摄影灯吗？”

杜修贤又哑了。



“如果对身体有害，我看宁可不用，或者少用为好。”总理看了看他手里的闪光灯，问，“外国人用的灯有没有有害光线？”

“有！当然有！他们的灯没有毛玻璃，光更透更亮。”杜修贤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态度要科学，说话要有根据。你负责搞清楚多少光里含多少有害光线，有多大损害。写个报告，要快！”说到这里，总理起身去福建厅会见外宾。

也真邪乎了，从那以后，杜修贤发现摄影灯的光真是这样刺眼。就像总理说的是“杀人武器”一样。

几天后，石少华从上海回到北京，带回了数据，杜修贤一看，乐得差点没跳起来。几天忐忑的心终于有了底。正好当晚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客人，他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总理，让总理也了却这桩心事。

晚上，总理悄然无声地走进了大会堂，和上次一样，他又将忧愁的目光投在地毯上那几只横七竖八的摄影灯上。这次杜修贤心里安稳了，不再发毛了。你看就看呗！

总理来到他的身边，“老杜，上海有消息吗？”

“少华同志回来了。数据也出来了。”杜修贤还故意停顿一下，似乎想制造一点惊人的悬念，“红外线滤去百分之七十；紫外线滤去百分之九十！”

杜修贤挺神气地望着总理，这回您该放心了吧！

“那百分之三十的红外线怎么办？”

百分之三十红外线？天！……总理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措手不及中杜修贤急中生智，“总理，人还是需要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那百分之三十的红外线可能没害。”

“可能”激怒了总理，他平素最反对人在他面前使用“可能”、“大概”、“也许”之类的猜测词句，现在他的摄影记者也在含糊地对待关系到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的大事，他怎能不生气？

“身体需要，眼睛不需要！你是组长，怎么能这样抱有侥幸心理



理？要管起来，管好。上次姬外长访问伊朗，中国电视台的记者在宴会上炸灯，那光彩吗？你不检查不报告。为什么出国前你不负责检查摄影灯？……什么？你说什么？”他把耳朵侧向正在小声咕哝的杜修贤。

“上海也炸过灯！”杜修贤又大点声说。

总理又好气又好笑地打量了他一眼，“你只举例子，例子多得很，一百个也有，你活到老也是这样。要解决问题，不是举例。伊朗爆炸你不注意。日本爆炸呢？美国爆炸呢？你不重视？伊朗是小国也要重视。离人家这么近拍摄，在人家头顶上拍，不礼貌嘛！夫人的衣服烧了个洞。赔了没有？”

“赔了。赔了一块好衣料！”

“做得对。那个记者要检查，你负责向我报告。怎么？……不服气？‘可能’？中央领导人的眼睛都是给照坏的。你还‘可能’没有害处。你呀，是个‘三十无害论者’。回去好好想想。”

总理说完气呼呼地朝门外走，到了门口又扭过头来补了一句：“不把有害光线搞清楚，你们再照，我就下令不让你们照！”

厅里鸦雀无声。杜修贤愣愣地望着已经空落的门口。别看他嘴硬，其实心里比谁都急。这摄影灯光线不搞个水落石出，他们怎能心安理得地将摄影灯对着中央领导人？又怎么向总理交代？

没有多久，三份测定报告送到杜修贤的手上——《三种人像灯

的红外线和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和《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能量测定报告》。

报告称：据上海气象局对上海地区太阳辐射能量的测定数据，在历年4月份上午10时左右的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三十毫瓦左右，波长在三百五十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五百微瓦左右。在离改进灯2型二米处，红外线能量约为上述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的一百二十分之一；波长在三百五十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仅为上述太阳光中同波长紫外线能量的一万五千分之一左右。

一个一百二十分之一，一个一万五千分之一。这次绝不是“可



能”，而是白纸黑字。

杜修贤立即报告了总理。

原以为这场红外线、紫外线风波可以落下帷幕了，哪知这场风波的高潮还在后面呢！

按理，他只是个摄影记者，最多还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可是外事协作组的组长往头上一套，这就套出了一大堆本不属他管辖的事情来。什么电影电视机器设备的引进，什么人员配备，什么彩色胶卷研制，什么研制无害灯具……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灯光风波想像不到地复杂，也想像不到地曲折！

7月底，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叫杜修贤立即去总理的办公室，有事找他。

正是太阳当顶时，酷热难耐的街道上几乎不见行人的踪迹。车子进了西花厅，杜修贤一下车，路面像晒熟了一般，脚下立即感到一阵炙热。

总理的办公室门虚掩着，他没敲门就轻轻地推开了……

总理坐在已铺席垫的沙发上看文件。脚步声惊动了他，他的目光从垂落鼻梁的老花镜上面射了过来。杜修贤看他脸色不太好，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敢先开口，只是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老杜，主席书房里的固定灯是你负责安的吗？”

“是啊。”

“谁同意的？”

“江青提议，办公厅主任同意的。”

“灯是从天安门城楼上卸下来的吧？”

“对！”杜修贤心里奇怪，总理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测定了没有？你只给我一个手动摄影灯的测定数据。固定灯呢？为什么不测定一下？”

杜修贤心里一沉，坏了。我怎么忘了固定灯？这可是最重要的地方啊！



“我了解过了，那种灯含有较强的有害光线，立即停止使用！”

这一次，总理又把杜修贤“将”住了。

他望着总理清癯的脸颊，心里充满了失职的悔疚，真不该给日理万机的总理增添这样不该增添的麻烦，让他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分心了。这段时间看着总理消瘦下去，听说生病了。可怎么不见好起来？怪叫人揪心的。

回去的一路上，杜修贤一直都在责骂自己，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疏忽呢？这不是昏了头是什么？

第二天，毛泽东书房里的固定灯停止使用。从3月装上使用到7月停止，一共使用过4次，幸好发现早，还没酿成不可挽回的灾祸。

杜修贤一边等上海制造新型灯具，一边用手灯在主席书房里拍摄。毛泽东更加显得不适，他的一只眼才开刀摘除了白内障，术后的眼睛经常流泪。如果见强光，眼睛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于是，杜修贤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变成了一分钟，这几乎是喘一口气的工夫。

一个月后，上海的新型灯具终于到了。电工们连夜突击安装，悬吊在原来旧灯的位置上。大家兴奋得和盖新房上梁似的，终于大功告成，可以松一口气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灯，连续开灯20分钟，灯外的镀膜就掉了，这还过滤个屁呀！杜修贤差点没给气疯了。

面对“脱皮掉肉”后束之高阁的灯，他们哭笑不得，一筹莫展。

说什么也不想惊动总理了。可是精明心细的总理每次都陪外宾到主席的书房，他们手里醒目的手灯，怎能瞒过他那双洞察秋毫的眼睛呢？

“想想办法，在北京附近的工厂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镀膜工艺。”总理和他们一同想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他们在北京的一家部队研究所里找到了“救星”。固定灯重镀后，一试，令人开颜：50小时也没脱膜。这年代要找个质量过关的产品还真不容易！

历时半年之久的红外线和紫外线风波终告结束。





第三章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第一次将林彪的镜头排除在重大的节日之外。 图片由作者提供

★ 国庆节，斯诺被毛泽东请上了天安门。很可惜，斯诺在
中国的新闻竟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在1972年内，他和周恩来——两位中国的巨人，他们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也在他们合作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确立，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跨出了关键一步。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美国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反华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

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

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已成为对中国安全
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当
一个高鼻子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

当斯诺知道他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



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人吗？”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要不是充满好奇心，当年他会到陕北红色的土地上去吗？

今天，他登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他对这座东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回忆起往事自然都很高兴。斯诺还记起，当时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采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很兴奋。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此时，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有的江苏口音普通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地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又向林彪介绍斯诺，他对斯诺说：“这是林副主席。”

斯诺和林彪认识，在延安时他采访过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所以他说：“林彪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林彪说：“斯诺先生，你是毛主席请来的，我们热烈欢迎你！”

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使斯诺感到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们身后。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的各大报上。

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至于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



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这不仅是在天安门上作了一个象征，而且是和斯诺明明白白地说了。这在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中已经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年逾八旬的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总统福特与老朋友基辛格，显得格外高兴。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做旅行者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们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能转告到尼克松那里……

★ 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这次尼克松没糊涂，派了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

1971年4月6日深夜，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桌上放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比赛期间，中国邀请了若干个国家的球队在归国途中来北京打球。一些美国队员很想来中国。碰巧，在他们动身去日本之前，美国政府完全取消了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方面的限制。美国运动员向中国运动员表示了他们的兴趣。

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这里，向他汇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当周恩来汇报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时，毛泽东沉默了！他深思着，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策。

1970年，曾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期·顾夫·德姆维尔。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做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当年进行的。戴高乐如来中国访问，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然而，戴高乐却去世了。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泽东还给戴高乐夫人发去了对这位将军的信电，这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非共产党政治家的惟一的一次赞扬。

想到这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





毛泽东主席向基辛格博士竖食指，论证他的观点。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毛泽东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代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亮得早，屋外响着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与基辛格博士在书房交谈。

076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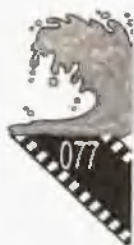
4月14日下午2时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1976年2月，毛泽东主席接见基辛格，幽默地指着他的高个子夫人南希说：“压倒他！”



坐在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立刻报以热烈的鼓掌。

乒乓球运动是中国体育运动的强项，被视为是中国的国球，多次参加国际比赛，拿回来的冠军最多。连外国人也惊叹：这个小球简直就是为中国人发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真可谓以长克短，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

虽然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一板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却为这一板叫

绝、叫好。

这一回该轮到美国人出击了，他们也不含糊，为了寻求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总统尼克松派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

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遇大事不糊涂”、“此人有文化”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是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身后是很有外交风度的黄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来迎接基辛格的车子是中国最高级的轿车“红旗”。这种车子最明显的标志是前面的一面有机玻璃制作的红旗。基辛格面色冷峻，毫不犹豫地坐上了“红旗”车。

一路绿灯。

他们很快来到了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6号接。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从里到外充满了东方情调。

叶剑英举行的欢迎宴会是相当丰盛的。基辛格曾经以“中国通”面著称于世，却不会使用中国筷子。他对那两根用竹木或是象牙制作的棍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他不能不承认，中国菜正像毛泽东说的，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但基辛格此时的兴趣却没有放在中国菜上，他急于想见周恩来，因为，见到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的成果能有多大。很快，他被告知，周恩来要到他住的6号

楼来和他举行会谈。

站在楼门口的基辛格看到周恩来的车子停下之后，周恩来从车内走了出来。这位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似乎没有疲劳的时候。

他快步走到了基辛格的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和基辛格伸过来的手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道：“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





1963年6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杨尚昆在中南海观看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的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和女子双打冠军奖杯，左一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

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

由于基辛格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必将把历史性握手和震惊世界的新闻留给总统尼克松。

1971年7月15日，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随着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它的公布人一个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个是尼克松特使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秘密来华和周恩来几次会谈后产生的公告。

公告全文不过200来字，从起草到达成协议也不过只有几个小时，可花费了相当大的气力。为了准确表达双方的意思，避免“谁先主动”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磨，已经不是在咬文嚼字了，而是在咬嫩嚼擦，负责起草公告的黄华和章文晋，几乎到了把公告嚼碎了还能倒背如流的程度，才算基本定下来。可是最后定稿时，周恩来还在一遍遍地仔细琢磨措辞，考虑尼克松要求来华，我们才邀请，他们美国的而子难看，就将“要求”去掉，加上“获悉”，使这句话变成“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改动，基辛格喜出望外，拍手称好。当即就爽快地同意在他秘密离开中国的第四天，即15日同时由中美两国向外界宣布这个公告。

继这个惊天动地的公告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转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翘首等待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的时刻。



★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杜修贤当机立断，率先按响了快门

1972年2月21日清晨。窗外的天色还没有亮透，灰蒙蒙的，中南海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便早早起身，开始忙碌起来。

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不仅是中美史上的大事，也是摄影记者的大事。永恒的瞬间将系在摄影师的食指上，真可谓弹指千钧！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北京的早春二月，寒气依然逼人，空旷的机场上卷过一阵阵寒风。大街上和往常一样安静。但是细心的人们还是从街头橱窗的报纸上，看到了尼克松即将来华的消息。

机场上一百多名记者，站在人工搭的架子上，耐心等待着历史经过长期准备后形成的伟大瞬间。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机场上空。

候机厅旁的小休息室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已等候多时。天上银色的飞机扯着尖锐的呼啸，发出颤震的轰鸣，降落在主跑道上。这时周恩来率先走出大厅门，站在分支跑道边。跑道

两边插着彩旗，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穿着大衣笔直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

一会儿，飞机像辆硕大的车子，高展双翼，飞快地从主跑道驶上分支跑道，越跑越慢，最后停在离人群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哗……哗，记者们一阵骚乱，只听见照相机、摄影机的碰挤声。飞机还未停稳，所有的片子却已贴稳在眼眶上了！

记者们屏息静气，紧张地等待大洋两岸历史性的握手！

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紧跟身后的是他的夫人。尼克松身着灰色的呢大衣，夫人则如一团火，鲜红鲜红的……

尼克松步子很快，他一会儿挥手，一会儿鼓掌，一只脚刚落平地，手就笔直地伸向二三十米开外的周恩来。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当机立断，一锤定音，率先按响了快门。随后一百多部片子发出爆豆般的脆响。

“不车不亢”是这次的接待方针。为了能体现这一方针，杜修贤琢磨了不少日子，才周密细致地捕捉到这个难得的瞬间。

按照惯例，每次活动后两小时内，要将照片送给周恩来审阅。摄影记者选了一张握上手的，又选了一张没摄上手的照片送审。周恩来拿着照片反复比较，最后拿出那张由杜修贤拍摄的没有握上手的

照片，交给新华社发表。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他的“游泳池”住宅会见了尼克松和夫人，以及全体随同官员。

在这一个月前，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一直重病缠身，精神情绪都不好。

开始会谈时，毛泽东的动作显得迟缓，表情也呆板。可是谈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情绪渐渐高涨起来，红晕淡淡漫上了苍白的脸颊。他一会儿将手高高扬起，一会儿又笔直落下，这忽上忽下的大幅动作，使美国客人消除了紧张情绪，也受到了这个愉快气氛的感染，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美国总统尼克松伸过来的手。



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交谈。他的身体已显出苍老和病态。

话也多了，快乐诙谐的会谈中还夹杂着争辩。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

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惊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做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

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

毛泽东最后说：“你们下午还有事，谈到这里差不多了吧。”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

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10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



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

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



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尼克松总统继续举行会谈。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博士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乔冠华等。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尽量不让这些分歧危害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

在尼克松提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到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人处着眼，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2月26日凌晨，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谈定了《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下午，又陪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

2月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往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予以公布。至此，中美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1972年2月28日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7日，毛泽东接见了田中。周恩来和田中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作出的新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大地提高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长达

二十多年的铁幕被打破了。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四十一个国家。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尼克松说：毛泽东在“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听到后，也说了一句：“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吗？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这两句话，一句是唯心主义的，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却这样地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把握了历史的时机，拨正了航向，改变了中美的关系、中日的关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尼克松为适应这种形势，也迈出了





1974年5月，毛泽东主席和外交部长乔冠华握手。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对他率领埃及友好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1974年5月，毛泽东主席和外交部长乔冠华握手。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对他率领埃及友好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时仔细询问对方。



毛泽东主席与非洲贵宾会谈。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毛泽东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早在抗战初期，乔冠华留学德国回到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工作。那时二次大战刚拉开序幕，欧洲战争迭起，乔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甚有预见。比如他的文章曾预见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以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



有人借此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粱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粱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心情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向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体成员乔冠华、黄华、符

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后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他信心大大提高了。

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



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面。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对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

赞比亚1964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就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联名致电祝贺该国独立，祝贺卡翁达就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派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两国于10月29日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与赞比亚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大使馆，连个代表也没有，更没有派过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卡翁达对赞比亚同中国的接触保持着慎重的态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见有机可乘，更极力破坏中国与赞比亚的友好关系，诱使卡翁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此，美国宣布帮助赞比亚改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公路，宣称要以公路替代坦赞铁路。

为进一步向赞比亚施加压力，美国和一些面方国家指使南非殖民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经济封锁，卡翁达听从尼雷尔的劝告，开始向中





毛泽东会见非洲客人卡翁达。

096

国寻求帮助。

卡翁达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一贯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热心人，被称为非洲民族运动的元老人物，但是由于修建坦赞铁路实在非同小可，他又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沉重压力，下决心并不容易，但他被周恩来的人品和魅力折服了，在等待、观望和比较了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终于来到中国访问。

卡翁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与其在人民大会堂愉快会见。

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问道：“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



毛泽东在苏联大使馆与苏联专家举杯同庆。



里吗？”

周恩来衷心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一句话就轻而易举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这正是卡翁达感到对中国最理亏的地方，但卡翁达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稳住阵脚巧妙地回答：“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泽东见好即收，关切地询问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对答如流：“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1972年9月，赞比亚副总统迈因扎·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

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其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乔纳询问中国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分析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越南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

乔纳提到国际上有所谓美国“体面撤走”的说法，不知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全部撤走，才是最体面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事物都在发展。”

1974年2月21日，卡翁达偕夫人二次访华来到北京，这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外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访问。22日下午，在中南海，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卡翁达进行亲切的会见，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谈话。

毛泽东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呀！”

卡翁达对此完全赞成：“对。”

毛泽东友好地发问：“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很快作答：“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泽东显然对此回答感到满意，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的回答是：“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认为卡翁达说对了一部分，他提出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这个战略思想简练地予以解释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

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以非洲著名政治家的眼先马上做出评价：“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道：“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迅即表态：“确实如此。”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大发宏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在与卡翁达的几次会谈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做出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具有最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周恩来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间地带的历史演变过程，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对卡翁达说：

“祸根还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两霸争夺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从第二中间地带演变而来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亚非拉。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两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他并不完全根据过去以社会性质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与解放，把它们称为民族





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00

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完成，再用原来划分方法就不合适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当时的苏联，在毛泽东看来已变成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再用原来的划分方法和提法更不合适了。再加上世界局势从70年代起，已逐渐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使他不可能对这个思想作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而作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论述的是邓小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的

发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联合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贯彻的一条统一战线。这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一条正确的路线。

★ 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凝聚昔日辉煌的老照片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

进入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进入晚年时期，疾病缠绕着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已力不从心；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体检中发现有早期的癌症症状。但是，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改变世界

1975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及孩子。





在长沙的毛泽东主席会见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毛泽东以惊人的反应，超越正常的中国人握手礼节，对夫人行了个吻手礼。夫人高兴地说：“我很荣幸。”

102

的形势，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交往。

1974年9月，北京的气候慢慢转凉，火辣辣的太阳换上了温和的面孔。

还未和我国建交的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马科斯派他的夫人和儿子来中国访问。总理这时刚刚动了手术，身体还很虚弱，他在医院里会见了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

江青又一次像吞了兴奋剂，情绪空前高涨。马科斯夫人在京期间，江青喧宾夺主，总是抢在李先念、邓小平前面讲话。甚至擅自做

主带马科斯夫人去天津小靳庄访问，这是原来接待计划里没有的项目。

江青有时用极复杂的眼光打量雍容华贵面容美丽的马科斯夫人。酸酸的嫉妒，还有蔑视的傲气在瞳仁里交织在一起。摄影记者杜修贤有心拍一张照片，无奈江青不允许。她和伊梅尔达单独谈话时，不准他们在旁边拍摄，理由是，拍摄的响动总是打断她谈话的思路，使她不能集中精力。他们只好提着相机站在一边，眼睁睁望着江青“出戏”的镜头从指尖失去。

马科斯夫人提出要去长沙拜会毛泽东。杜修贤挎相机随同拍摄采访。

已经9月了，长沙的气候还很闷热。毛泽东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环境优美、宁静。去的那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

从照片上看，马科斯总统相貌有点像我们中国广东人。他的夫人却天生丽质，听说她是菲律宾的第一美人。已经40岁的人了，却打扮得像20多岁的人。

毛泽东的客厅比游泳池的书房要大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书。

毛泽东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马科斯夫人先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转身介绍她的儿子。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的脸上随即浮现出幽默的笑容。此时的毛泽东以惊人的反应，那

超越既定之规的天性促使他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自如行了这个“洋人”的礼节。夫人笑着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

杜修贤被毛泽东这个意外的举止搞蒙了，竟没反应过来，这个镜头本也可以拍摄的，但一怔，这个潇洒的镜头几乎没人注意就永远地结束了。杜修贤当时遗憾极了，这几年老一套的外交礼规，把他的思想和视野都搞得僵化陈腐起来，这么动情的镜头却丢了。

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仅诙谐幽默，还有诗人的潇洒，所以这个瞬间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以前的工作人员常讲主



席的趣事。就他本人的战地爱情浪漫曲不谈，他在百忙中帮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找对象、甚至帮文化不高的卫士写情书，参谋着叫卫上去赢得姑娘的芳心……

在杜修贤的记忆里，暮年的毛泽东在这个潇洒瞬间后，再没有出现过奇迹。他的身体沿着自然规律的轨道迅速地下滑，而他的威望随着人们的爱戴、人们的仰慕迅速走向世界。

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还要不分白天黑夜忙于会见外宾。杜修贤他们有时都看着心痛。现在都说那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热爱近似一种迷信，那么外国人眼里的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呢？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地位和魅力。

毛泽东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会见外宾的新闻照片，杜修贤都要给他亲自审阅后才发表。他一直想在爱戴他的人民面前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一旦照片上出现苍老和病态，他就“以守为攻”，宁愿不上镜头也不想破坏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1974年11月6日，主席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事后杜修贤将照片送给他的秘书，让她转给主席审阅。秘书告诉杜修贤，以后不要再发主席和外宾的合影照片，这是主席本人的意思。

以后毛泽东不再让杜修贤拍摄他和外宾站立的合影。他的心思杜修贤理解，因为从镜头里看到久病的人和健康的人站在一起合影，反差对比更加鲜明强烈。

毛泽东也在争取维护自己形象不受侵害的权利！

这年底，南斯拉夫的客人走进毛泽东温暖的书房里，似乎给沉静的空气里注入了活跃的生机，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可是难懂的湖南话和口齿不清让翻译为难，只好求助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秘书，秘书仔细地听辨后又告诉翻译，翻译再翻给外宾。

毛泽东虽然讲话不清，但头脑和听力还是很好的。他表达的意思，秘书理会对了，便笑着点头；如果没听懂，他就会烦躁地直打手势，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秘书听懂为止。

会谈往往就是在这么有趣也很困难之中进行的。最后客人告辞



时，毛泽东仍不忘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

客人这时都衷心地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

毛泽东生了重病以后，与外宾会见时，他爱和客人谈起“上帝”，像告诉秘密似地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开心的表情真像是生活中一个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他去光临一般。

他说得很从容自然，而工作人员在一边听得心里苦苦的——和谁约会都不能和上帝约会呀！

客人离去后，杜修贤在过厅里收拾摄影箱。张秘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不吭盯着他收拾东西。杜修贤觉得有趣就逗她：“怎么？不放心啊，怕我带窃听器？”

“文化大革命”时期杜修贤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人身边。

“扑哧”——小张笑了，说：“让你多喘几口气，不感谢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哇！”

张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好几年了。有一次总理将杜修贤找去，告诉他：“张秘书在外地照顾主席，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你逢年过节时带她的家人到公园去玩玩，让她安心在主席身边工作。”

总理说这话时，已经患重病住在医院里，可他惦念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杜修贤和张秘书一直比较熟悉，说话也就随便。她见她心事重重的模样，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主席身体一直不好，这你知道。他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话。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孤独的，他和江青不和，和孩子们又不能自由往来，最后连视力也下降了，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可是红墙外



头的人们谁能知晓和体谅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能想像到一个名扬四海如“不落太阳”的伟人，个人生活竟如此痛楚苦恼。

杜修贤颇同情小张，“你们也真不容易呀！要照顾主席，又要对付那个人的胡搅蛮缠。别理那么多，专心照顾好主席。”

“那个人”指江青，小张会意地点点头。

“我们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主席的影集画册，已经将黑白照片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正好将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也选一选。”

“真的！可快点拿来呀。”

过了几天，杜修贤从汽车里拖出一个大盒子，张秘书连忙从他手里接过大盒子。

“小心点小心点……全是照片哪！”

到过厅，小张打开盒子一看，“好家伙，满满一盒子。”

“这里有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今年的都有。你打个收条给我，记住！一张不能少哇。”

张秘书高兴地把照片搬进书房里。

转眼，到隆冬寒季。这个季节一般没有外宾来访。

杜修贤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整理照片。可是电话铃声又打乱了他的工作日程。是张秘书的电话，她叫杜修贤来一下游泳池，要开个碰头会。

杜修贤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主席的住宅，一看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他看。

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不错，这两张人物姿态是不太好，摄影部也提出要换这两张。我这次又带几张给主席选选。”

说着杜修贤将一个牛皮纸口袋交给张秘书。

他问小张：“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些照片大，他看得清楚，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小张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画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擦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忍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也是一张陕北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修贤心里一沉，岁月给毛泽东留下了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在送审单上，他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画了个圈。这个圈画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越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他去世后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看见这本唤起他强烈情感和美好回忆的影集，但这里面浓缩着他的气魄，他的才智，他的热望，他的情感，还有

他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他完整的人生。

★ 尼克松再一次访华。老朋友相聚格外高兴，尼克松和毛泽东竟然端起茶杯，以茶代酒。当两个茶杯“乒”地碰在一起的时候，摄影师的快门也按响了

进入1976年，毛泽东明显不行了，几乎不能再走路了，全身颤抖得更加厉害。有时杜修贤握着照相机的手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颤抖起来。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坚持会见了最后一批美国客人。因为他



1975年12月，毛泽东会见福特总统和夫人、女儿。
这是继尼克松之后，他会见的第二位美国总统。



知道中美关系还很不坚实，台湾当局对他们的外交失败并不甘心。

继尼克松访华后，他的后任福特总统也将手伸向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身体和尼克松来华时相比，更加不行了。当时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但是他的记忆力和思维却是惊人的，不仅记得尼克松来华的细节小事，而且对全球的形势，美国的时事有精辟的见解。

1975年12月2日晚6时半，基辛格和总统福特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

基辛格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怎样，毛泽东非常幽默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毛泽东接着又用手



1976年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夫妇，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

拍拍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点毛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他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毛泽东

还泰然自若地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政治家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出这些话之后，基辛格笑着回答道：“不要急于接受。”毛泽东听了基辛格的话，由于当时不能连贯说话，就随手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了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这是一句双关语，意思是既指医生，又指基辛格博士。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改换了话题。毛泽东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接着，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指着拳头对基辛格说：“你们是这个”，又竖起小拇指说：“我们是这



毛泽东主席对尼克松女儿和女婿说：“我要和上帝见面了！”

个。”基辛格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在一张纸上用英文写着：“对”。

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四年前同一时间(尼克松有意

选择了这一天)，尼克松夫妇再次访华。尽管他已非总统，毛泽东仍按总统的“规格”会见了。毛泽东不顾重病，与这位老友长谈达1小时40分钟。尼克松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毛泽东虽步履维艰，说话也困难，但精神集中，思想活跃，纵论国际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尼克松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



这种情况，尼克松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但毛泽东依然沉浸在和这位前总统风趣、诙谐的唇枪舌剑中，谈兴大增。大病未愈的毛泽东，这时脸颊上浮动着急奋的光彩。

毛泽东喜欢争论，特别是和隔海相互敌视了几十年的“头号敌人”同室争论，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兴致和激情。美国前总统和他的随员们也被毛泽东的语言魅力倾倒，笑声一阵阵地从门缝里挤出来。杜修贤站在门外过厅里等候拍摄会谈结束的场面，听见这愉快的笑声，估计会谈进入尾声了，就轻轻闪身进了毛泽东会谈的房间，准备拍摄宾主告别的镜头。刚进去，他就看见毛泽东颤巍巍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举了举，示意尼克松也端起茶杯。开始，尼克松没有明白毛泽东这个奇怪的举动，愕然地望着青瓷茶杯，但他很快反应过来，随之热烈响应，也端起了青瓷茶杯，高高举起……当两个茶杯“乒”地碰在一起的时候，杜修贤的快门也跟着按响了。刹那间，他意识到这是毛泽东最新创举——以茶代酒，手疾眼快当即抢下了这戏剧性的镜头。

毛泽东边干杯边风趣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隔海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嘛！我们应该为冤家干一杯！我不会喝酒……”他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模样，“不过不要紧，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酒有水，以水代酒——干杯！”

这个奇特的碰杯将会谈的气氛推到了高潮，在场的人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前外国元首了。仅仅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为之洒泪。他于9月9日当天发表声明说：

“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这不是溢美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话。在尼克松图书馆，竖立

着10尊与真人大小一样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这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政治家，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身着中山装、穿圆口布鞋、坐在沙发上健谈的毛泽东……

★ 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面对镜头再也不能站立了。这是他最后的外交会见，而留下的瞬间却令人苦涩和不安

为毛泽东拍摄，杜修贤是越来越惶恐。只要听到是游泳池的电话，他就忧心忡忡，不知拍出照片是个什么样子，能不能让读者满意。

新闻摄影强调真实，可是拍摄领袖人物仅仅靠真实还不行，特别是毛泽东的晚年摄影，很大程度上不能全都依赖真实表现。这时，杜修贤感到他的相机是多么沉重，不仅要有敏锐的观察，还要有准确的判断，并且迅速融进百分之一的瞬间。往往为拍摄能有把握，一般都是拍摄毛泽东和外宾握手，或是坐着谈话的镜头。画面显得机械、呆板、缺乏生动的情趣。

1973年初，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又一次访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按照平时的规矩，杜修贤拍摄了毛泽东和基辛格握手的镜头。会谈结束，当他们起身进中餐的时候，杜修贤发现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不停地比比画画讲述他的观点和认识，他不由得举起机

子，镜头里的毛泽东竖起了食指，基辛格正在注意倾听，后面的周恩来却默默无语，三人的神情特别有意思，有个性。他果断地按下了快门。

照片发出来后，引起国外新闻舆论的重视，外电连续报道这张新闻照片。有的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新闻照片改变以前陈旧的握手模式，照片里的毛泽东很他谈，他要用他的理论征服美国。”

还有报道说：“毛泽东竖起食指，论证他的一个观点，展现了一位东方巨人不可战胜的意志。”五花八门的报道中也有莫名其妙的报道：“毛泽东出现在镜头前面，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退到后面，将聚





1976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书房里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伟人留下的最后瞬间。

光灯照在毛泽东的身上。”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后，仅半个月又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114

杜修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头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嘴微微地张着，似乎都能听见他艰难的喘息声。他一见，心里又凉了半截。今天保准又拍不到好镜头了。

人们从电视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毛泽东面容憔悴，缺乏表情，双目微睁，行动不便，宽大的裤管下露出了缺乏肌肉的足踝，叠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大摞方形纸块和一闪而过取纸擦拭口角的镜头，使人们不由得将中风后遗症与之联系在一起，据说他还患有帕金森氏病，亦即震颤麻痹。

布托笑容满面由华国锋陪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前两年




和他见过，这次相逢，毛泽东的神情好像比以前精神些。毛泽东坐在自己的沙发上，他已经无法站立起来。双手被布托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毛泽东面部略带微笑，显得和蔼忠厚，古铜色的肤色显得光洁。

就在毛泽东用双手紧紧握住布托双手的一霎间，毛泽东脸上浮现出了慈祥的笑容，杜修贤被这难得的表情激动坏了，成败在此一瞬，连忙按下快门。

当照片冲洗出来，连杜修贤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拍出这么好的镜头？毛泽东和布托紧紧地握手，他面如满月，略带古铜色的肤色显得光亮和健康。

布托离开北京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这时，杜修贤意识到他捕捉到的一瞬不可多得的表情，是为毛泽东留下了最后一张，也是成功的一张照片。



第四章

不平凡的12月26日



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少数民族代表。



各族代表面对心中的红太阳，心情格外激动，掌声雷动。

★ 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跟罗瑞卿开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六十大寿作出重大决定，解决中央存在的分裂隐患

毛泽东一生很少提及自己生辰，按他的想法，一个人的生日，最好让它偷偷过去，不要留下什么“寿星”的感觉。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它偷偷地走过



1984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前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在北京开会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代表。



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哇！”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更加反对为他做寿，生日那天最多加一碗“长寿面”而已。然而就这为数不多的几次“长寿面”往往酝酿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情。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准备离开北京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动身前却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耽搁了。

事情起源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



1960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会见会议代表。

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调京。1952年8月，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五人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素有“五马进京”之说。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高岗、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器重的，权力、地位在五人中甚为突出。

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们在一起，与尉凤英握手。



是高岗，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正在这时，他们的个人野心又有了一个急剧膨胀的机会——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自然而然也会随之相应调整。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高岗不由得心花怒放。他马上利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活动。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所幸毛泽东及时地察觉了高岗的“小动作”，亲自到会讲话，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

本来，周恩来已为会议作了总结，毛泽东是可以不讲话的。但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主要是指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另一方面也认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同时，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

毛泽东虽不点名批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高岗、饶漱石而言的。毛泽东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是金口玉言，马上引起非

同小可的影响。高岗精心策划的“反薄倒刘”阴谋被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击得粉碎。

面对毛泽东出示的黄牌警告，高岗、饶漱石却不买账。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活动。饶漱石也利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摇旗呐喊，因为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进京后见高岗常去见毛泽东，以为亲近高岗必然会得到毛泽东的刮目相看，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一唱一和，十分默契。为配合高岗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反薄倒刘”活动，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毛泽东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亲切握手。



因为他们“倒刘”活动太明显了，阴谋夺权的野心在中央高层暴露无遗。尽管毛泽东身居“深宫大院”内却知天下事。高、饶两人狼狈为奸的事情，一件也没瞒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十分反感他们的做法，但还是耐下心来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为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高压之下，饶漱石的锋芒有所收敛。可高岗愈加地走火入魔，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篡权活动有增无减。就在毛泽东走近60岁之际，高岗的“倒刘”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一时，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并一一指出讲话稿中的“严重”错误。

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毛主席，问起主席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在鼓里哩！”

眼见着高岗逐步发展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这必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临去杭州之前，毛泽东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这时的提议有着特殊的含意，不仅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也是对高岗一个明示——刘少奇不是你一个高岗能“倒”的。可是刘少奇被高岗搞得心情很不好，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而是沉闷地抽着烟，以毛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为由，提出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的建议。

毛泽东一时哑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他强调了全党要谦虚，言外之意，是希望中央领导人顾全大局，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刘少奇此时却以此谦让，无疑在毛泽东心头投下一团阴影。

后来因为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刘少奇依然负责中央

的工作。

当然他们中间还有一人是极力反对刘少奇独自负责的，那就是高岗。他力排众议，第一次站在刘少奇一边，十分赞同轮流负责的方案。“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此刻，高岗为了取代刘少奇已经心急如焚了。

毛泽东把洞悉一切的目光投向了高岗，心里冒出一连串的愤慨：高岗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解放前你虽没被敌人的枪弹所击中，但解放后为什么却被骄傲和权欲击中了呢？





毛泽东和郭沫若亲切握手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他第二张黄牌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全都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还有谁不知道“别人司令”何许人也？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警卫人员，将乒乓球室当作餐厅，大家围坐一起，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汤面，为中央最高统帅过了一个特别的六十大寿。毛泽东当过“寿星”后放心地去了杭州，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之中。因为中央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安排，在他两张黄牌警告之后往往就是一张“驱逐下场”的红牌，剩余的事情留给同仁们去收场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委托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二个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但是，高岗、饶漱石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依然执迷不悟，不肯悬崖勒马，不作深刻检讨，也不痛改前非。高岗干脆顽抗到底，来了个鱼死网破，以自杀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虽然经过抢救没有死成，但他去意已决。

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证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

悔改，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一年前还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的高岗，很快马失前蹄，翻身落马，掉下了万丈深渊，永远背负着羞辱的墓碑。

1955年3月下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一场在毛泽东60岁诞辰前后进行的反对高饶的斗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命运之神却不断翻新捉弄人的把戏。10年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诞辰，黄牌举向了刘少奇……

★ 毛泽东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借此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1963年底，共和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度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

按人之常情，七十做寿并不过分。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外宾，谈的时间很长。会见结束，用餐时间已过。服务员按情况为主席准备好了晚饭。熟悉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于是，特为老“寿星”的便饭多准备两个菜，一碗面条，即四菜一汤和一碗汤面。这就是大家为毛泽东准备的古稀寿宴。但毛泽东看到了桌子上为他摆的菜饭，顿时不悦，“我好好





1963年1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领导和代表们在一起。

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

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起身在118斤内慢慢散起了步。服务人员见到这个场面，真有点紧张。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没有为主席做成寿，为主席服务的服务员却成了座上客。席间，



1965年10月1日，首都各界人民舉行盛大遊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周年。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等貴賓在天安門主席台上檢閱遊行隊伍。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领导人在第三届人代会上。

大家举杯，祝毛主席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长寿！”这回主席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毛泽东风趣的谈话引起了满厅人的笑声。



毛泽东主席和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合影留念。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当然如毛泽东往常在这里吃便饭时一样，都由他支付。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那一年，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12月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几千名代表走进神





毛泽东主席接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和随同访华的巴基斯坦贵宾。

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家按地区分片入座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农村的典型——大寨。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



毛泽东与刘少奇经常在一起接见外宾。



1962年，毛泽东与他的领导集体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与陈云等商谈经济观点。

134

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脸上堆积着皱纹，一身黑袄，一看就知道是位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这一年他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业绩却是全国农民瞩目的。他以平静却带有虔诚的表情仔细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开会时值毛泽东主席71岁寿辰，中央办公厅为主席的生日做了一番安排，这一天准备请几位会议代表出席主席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毛泽东71岁寿宴时，特意邀请了三届人大代表参加。这是董加耕、邢燕子与毛主席在一起的镜头。



等坐到寿筵边，人们再次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给这次生日宴会赋予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早在八大后，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陶铸夫妇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陶铸他们还是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训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相当严肃：“社教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

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会见劳动模范，与陈永贵亲切握手。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大家相信，“搞独立王国”，毛泽东虽然是面对着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宴席上与陈永贵交谈。

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

138

们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起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

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这一桌。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呀，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整个宴席丝毫没有祝寿的气氛，个个都紧张

而困惑。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动碗碟的声响外，听不到一点喜庆热烈的声音。毛泽东一连串话中有话，像陈永贵这些从基层来的人是蒙在鼓里的，也不可能想到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在座还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就知道毛泽东这些莫名其妙的讲话缘以何故。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 10年后，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最后使命。傍晚，周恩来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进入1974年12月，天气骤然变冷，凛冽刺骨的寒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的上空飞舞、呼啸。周恩来从初夏住进305医院直到隆冬，已度过近半年的时间，连着动了两次大手术。癌症虽然得到暂时的控制，但是手术后的身体十分虚弱。

140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精神上却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在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决斗场上一有疏忽，往往就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江青一伙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周恩来紧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保持了真诚的尊重，但却从不阿谀他。他靠非凡的才能和无私令毛泽东信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病体难支，深居简出，加之



1974年4月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桑戈尔总统。

身边的人鱼龙混杂，江青等人打小报告、进谗言，使他时信时疑，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抚慰”。然而，在决定国家权力由谁掌握的四届人大前夕，应该让毛泽东公正地定夺班子，以保证红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的手中。

和毛泽东共事了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伟大领袖的个性。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但在他面前讲话要讲透、讲准，讲得适合时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只能顺着他的思想去发挥，去变通。但是，现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关键时刻，刻不容缓。毛泽东又住长沙，必须面陈直谏。叶剑英等老师们亲自安排护送周恩来飞往长沙事宜。最后定在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才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节外生枝。

周恩来却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飞一次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去，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登上了专机。他对这位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个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他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二是为了避免和总理同机的难堪场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4个人里，能和主席说上话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地位也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上几句，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

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了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住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在他的房间里稍稍地体息了一下，就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

两位老人先是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周恩来还关切地用手按了按毛泽东略有些浮肿的足踝，对毛泽东的健康深感担忧。很快，他

们的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投机。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当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不由得轻轻舒了口气。夜幕降临，王洪文还没有到长沙。这时在长沙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也着急，不停地往北京打电话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专机才出现在长沙的夜空。

一到长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轻幼稚……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主席面前为江青说好话。两天后，日历醒目地印着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主席的生日。于是，总理对大家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从不为自己过生日的，他也不提倡过生日。

傍晚，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所，特意叫厨师准备一桌生日宴席，将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相隔不久，“寿星”也在自己的住宅里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长寿面。场面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感觉，但大家还是感到这一天主席的笑容多了，而且话也多了，可见毛泽东为自己在晚年的生日前后再次定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班子而欣慰。


28日，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飞回北京。

8天之后，即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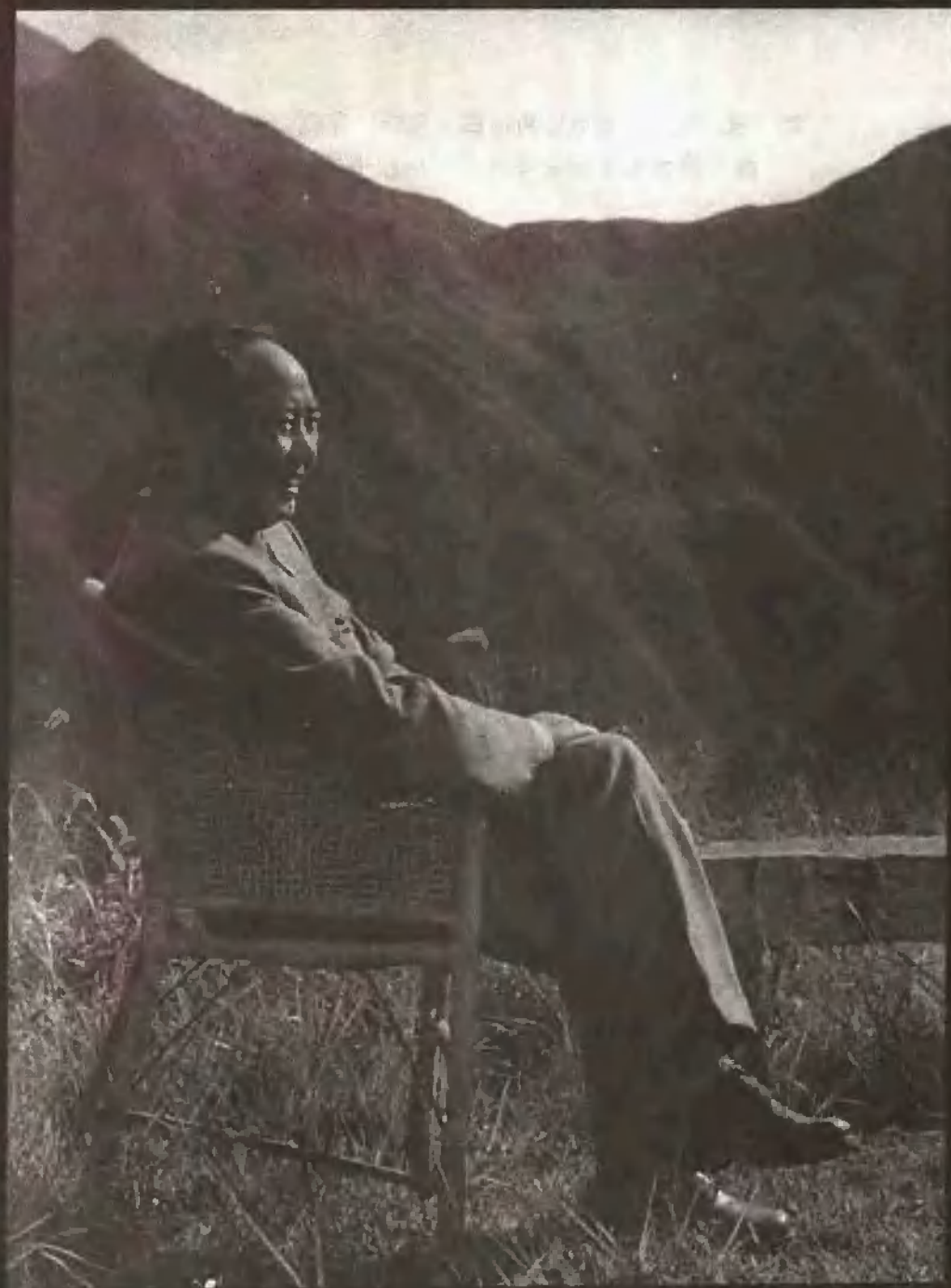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为中国革命完成了一项非凡的使命。





第五章

庐山飞云雾



面对庐山的浓雾和景色，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充满了激情与兴奋。

新华社记者摄

★ 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想到难以启齿的主席之争将要在庐山悄悄拉开帷幕

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辉煌的落日下，从西边奔腾而来，它擦过九江城，便同鄱阳湖的浩渺烟波相遇，流向东海。

一座神秘的仙山，站在九江的南面，默默地注视着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而几千年来它总是躲在云雾里不露峥嵘，漠然傲岸一旁，只有在黄昏时刻，斑斓的余晖将那浓雾滤得透明时，它才从云雾中傲傲露出一张朦胧的脸孔，这是一座永远被云雾笼锁的“仙山”。

难怪古人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

也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又把庐山称为政治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就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了庐山，也是最后一次放在了庐山。

杜修贤是第一次来到庐山。在上山前，他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面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他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工作人

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

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杜修贤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杭州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杜修贤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回到北京，杜修贤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的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他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林彪晃动红宝书的模样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标志。这次九届二中全会，他已临近政治生涯的尾声。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

杜修贤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可是令杜修贤意想不到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却在这次会议上向党中央突然发难。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当然，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下面的这些故事杜修贤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事件发生后，他如坠云雾，百思不解。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许毛泽东已预感到林彪将在会上有大文章出台，最后他告诫大家：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早在这年的3月，毛泽东就提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职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确定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

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看来是必需的个人崇拜的东西现在显得过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很快就见到了。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

一个星期后，林彪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对毛泽东改变国家体制的建议明确提出反对。他表示：应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这样，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惟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惟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会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晚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



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宪法》工作小组中同样存在两种意见。康生、张春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吴法宪、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两

派意见时常发生冲突。

林彪一派虽然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抵触，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有关提法发生争执。

此前，张春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亲耳听到毛泽东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张春桥以此为依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三个副词。



吴法宪不同意，他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通过黄永胜将争论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三个副词出自“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开头，发明权属于林彪。毛泽东已多次表示反对这种说法，他在1969年审定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时，也删去了初稿中的这三个副词。

对于自己的发明，林彪十分珍惜，岂能放弃？

林彪、叶群估计在将要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还会有一番激烈争论。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在称“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准备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出乎他们意外的是，8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按林彪一伙的意思顺利通过。

尽管如此，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仍未改变主意。



★ 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西面时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师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会场全景。

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

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



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先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156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

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

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急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有着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把政变经背得烂熟的林彪。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





197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在庐山召开。

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

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此后，他们便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会议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拿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

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杜修贤回忆道：“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地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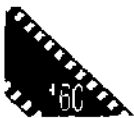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麻麻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

就这样，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大戏。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59年夏天那次庐山会议，看看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 历史有时就像风雨一样变幻莫测，当彭德怀因铮铮真言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机会

1959年的夏天特别炎热，党中央决定在著名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系统地研究怎样有效地克服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为完成本年度的人跃进计划扫除障碍。

在6月底7月初的几天，中央的决策者和各地领导人陆续抵达庐山，虽然会面、交谈、笑声、问好声不断，但人们的话语、眉间



毛泽东在庐山。新华社记者摄



1954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散步交谈。



1955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向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彭德怀祝酒。 新华社记者摄



彭德怀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经济建设情况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摄



163

总是透露出隐隐的不安。

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被毛泽东请上了山。

庐山,真是人间仙境,前来赴会的领导者们暂时远离尘嚣,放松精神,从容议事。会议最初几天,与会者大都心情舒畅。

毛泽东谈笑风生,鼓励大家踊跃发言。

关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很欣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三句话,就借用来概括,即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上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专门谈到了“大家要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

做热锅上的蚂蚁”。

“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

毛泽东用强调的口气说：“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毛泽东的定调讲话，和庐山的云雾一样，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暑气，会议的空气轻松起来。

刘少奇的话更使“神仙”们飘逸起来。他话语不多，但切中要点：

“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了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

他对会议的总的调子是这样解释的：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接下来的讨论发言，坦率与热烈，可以说是过去党的会议上少见的，或许是现实现状逼使与会者不得不谈。

会上的“神仙”在会后的言谈中，变得更加直率，更能反映庐山会议前期领导者们对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党的领导的失误的沉痛反省。

田家英、吴冷西、胡乔木、陈伯达、李锐等为毛泽东所倚重的“才子”们在7月6日，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他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在交谈以后，显出沉重的忧虑。

应毛泽东亲自之邀而来的彭德怀元帅，在这种气氛影响下，也

作了不同凡响的发言。他说：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热了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实验。总之，大胜利以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拉。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



154





彭德怀元帅接见外宾时的神情。新华社记者摄



1962年1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

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有人在暗示彭德怀，不能再“放大炮”了，但他全然不理，又提出去年毛泽东曾经给他安上的“算账派”、“观潮派”帽子之事“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人们都紧盯彭德怀，有人恨不得堵上耳朵，也有人已经在手心里攥出汗来了。

彭德怀积郁久矣，一吐为快，但他哪里知道，他的讲话记录被柯庆施悄悄地呈送给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庐山显得格外宁静，点缀在群峰之间的灯火，似乎也在沉默。此刻，彭德怀十分焦虑。毛泽东既然把大家请上山来，就是要好好总结一下近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为什么不能找毛泽东谈一谈，坦陈自己对目前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看法？

但是，他未能见到毛泽东，因为他刚刚睡下，警卫礼貌地挡了驾。

彭德怀决定用写信的方式向主席坦陈自己的看法。

信终于送出去了。

但让彭德怀意想不到的，这封信给他带来了人生悲剧，庐山的平静也终于被打破了。

第二天，会议重新编组，会议代表人手一份《意见书》，结合原定的《会议纪要》进行讨论。

最初的“神仙会”的那种飘逸的气氛全然消失了，整个会议已经开始转向，为目前形势和中央决策大唱赞歌的人越来越多，对彭德怀的公开的和间接的指责也越来越多。彭德怀郑重声明：这是私人信件，不是什么意见书，要求中央收回，但已经迟了。

也就是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理论权威”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他“提醒”毛泽东，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多年来，这位“老粗”就与党同床异梦，如此等等。

没有多久林彪来到了庐山，他的到来无疑是给批判彭德怀的大火再添一把柴。

历史往往也就这么复杂，彭德怀铮铮真言把自己推入地狱门口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获得渴望已久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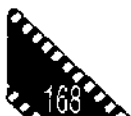
性格内向的林彪，虽然在休养，但他对政治风云的这种变幻却十分敏感。他对鼓吹神话般的乌托邦主义给神州大地带来的令人毛

骨悚然的灾难并没有亲身感受。他住在四周山清水秀、豪华舒适的别墅里，像相门中的公子，顿顿吃的是美味佳肴，怎么能体会到流浪街头的叫花子的苦衷？但敏感的神经已经告诉他，一场风暴迟早要来临。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日子，是庐山会议发生转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激烈的讲话。

彭德怀意识到，自己的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委屈之情涌上心头。他要向主席表白：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在会议室门口，彭德怀迎住毛泽东：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

“主席，我的信是给您个人的，没有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径直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等他把话说完。

刚强的元帅难以承受这沉重的打击。他还是不明白，事情怎么到这种地步？

在强大的压力下，彭德怀作了检讨。

7月31日，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政治局委员彭真、彭德怀、贺龙等，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彭真让李锐作记录。

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主题是批判彭德怀。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虽然不再明显地袒护彭德怀，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论。

“隔靴搔痒。”毛泽东抬起腿来，用手在鞋面上比画了几下。他对朱德在庐山会议的表现一直不满意。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忽然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大声怒斥：“你彭德怀一贯对毛主席不忠，心怀二心！”

接着，他历数彭德怀的“罪行”：“在抗日战争时，你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百团大战！在你的眼睛里还有毛主席的地位吗？”他自问自答地一挥手，“没有。你根本看不起毛主席。你自以为身经百战，打下了江山，立下了汗马

功劳，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不听了。你不是真心实意地来干革命，而是‘入股’来了，你一脑子旧军阀主义思想。你这种老大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国内，让你带兵出国作战，你又表现大国主义思想，不尊重朝鲜同志。你是《三国演义》里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上长着反骨。平时，你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模样，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这些是假的，到关键的时候，你的反骨就露了出来。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伟大创举。人民公社，是跨入共产主义的金桥，好得很。你睁开眼睛看看，世界



上有哪一个国家，钢铁产量能在一年之内翻番，粮食产量能在一年中成倍增长？”

他环顾了一下会场，又说：“没有，这种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奇迹，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可是，你对这些鼓舞人心的奇迹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攻击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难道毛主席和党中央都错了，惟独你彭德怀正确？你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他越说越激动，“你彭德怀懂得个屁！你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他用一种刀子似的眼光狠狠扫了一下彭德怀，冷嘲热讽地说：“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你就像《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成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的眼里，一切都是颠倒的。中国人民，不，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我们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我们打了天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领域里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这是有口皆碑的。可你却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究竟想干什么？”他提高了嗓门，又说：“你是不是想把毛主席赶走，你上台？你太不自量力了。让你这样满脑子旧思想的人上台，中国只能退到旧社会中去，中国人民还要受二茬罪……”

在整个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林彪的发言调门尤其高。当时有不少人处于观望态度：或思想不通，或撕不开面子。惟独林彪一改以前和彭德怀的关系，大肆给彭德怀滥加罪名。

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即刻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定在8月2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斗争有了新的部署，这并不因为他的检讨多么诚恳而变动。

那天，实到中央委员147人（缺席44人），列席15人，与会者共162人。

第二天，大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



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由于在会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情和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也一同把他们打入反党集团的成员。

这次庐山会议受益最大的就是林彪，他踏着彭德怀倒下的身躯当上了国防部长，挤进了党和国家要人的行列里。

★ 在南巡视察中，毛泽东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少数人不要跟林彪干坏事。十二年后，林彪走完了他的“O”形路

历史往往是那么有趣，当年林彪打倒彭德怀后，仍不甘心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也许是报应，林彪在同一地点、同一类型的会议上，完成了他的“O”形路途，跌入了庐山的深渊。

为了动摇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反党根基，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巡视一番。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但在当时也确实存在着危险。

毛泽东的南巡行动，他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极力寻找机会，乘毛泽东外出下毒手。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住了10天，与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除了解各地的问题外，

主要是谈1970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后来作了整理，形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其中谈到林彪集团问题的有：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



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就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这些谈话对林彪集团是致命的打击，林彪一伙必然千方百计地要打探到这个谈话的内容。林彪手中虽然有一定的军权，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他在谈话中曾说道：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似乎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同时也告诫军队，不要跟林彪干坏事。

毛泽东在武汉做的谈话，一时没有传到林彪的耳中。毛泽东也做了交代，大家都先不要传达，他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到了湖南长沙及江西南昌，这两地稍住了几天，先后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并做了不少谈话。在南昌时，毛泽东听取了江面省负责人的汇报，在南昌地区做了参观。他看到了林彪在江西建造的一个巨大工程。

这个工程不在地面上在地下，是一个指挥用的工程。它可以指挥全国。江面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面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引起毛泽东高度的警觉：这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向下下达的任务。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一看这个工程，就了解个大概了。这是林彪搞政变后，企图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用的一个指挥机关。江西这个工程搞了那么多年，毛泽东一点不知。毛泽东参观完

这个使他“大吃一惊”的工程后，没有在南昌久住，就匆匆地奔向浙江杭州。

9月3日至10日，毛泽东在杭州逗留。这是林彪一伙组织的所谓“联合舰队”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要实施“武装政变”阴谋计划基本力量的所在地。毛泽东到杭州是很危险的，也许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估计到或察觉了什么。9月8日午夜，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下令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告诉别人，不要让林彪死党陈励耘等人送行。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使他得以安全地




离开杭州。

9月10日近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此时，林立果“联合舰队”收到了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下毒手的时候到了，林立果等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的，然而出乎意料，毛泽东乘专列到上海后，并没有下火车，毛泽东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夜。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赶到上海，直奔专列，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她。但是，没有准许安排在上海谋杀毛泽东的林彪死党王维国上火车。事后，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可见，毛泽东对王维国等人已有了高度警惕。11日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等人下车去吃午饭时又把王维国叫上了车。这种时叫时不叫，使王维国不知所措。11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下令列车离开上海，直奔北京方向。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之外。

9月1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正以全速向北京驶去。晚上20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驶过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南京、蚌埠、济南、天津都过去了，毛泽东不让停车。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9月12日下午4时列车到达丰台车站时，毛泽东下令停车，并把吴德、吴忠等人叫到了车上，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列车停了两个小时，到黄昏时分，毛泽东才下令列车进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安然地回到了中南海。这个消息，使林彪一伙震惊。这个

消息，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又宣告了林彪集团所谓“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





第六章

日出日落天安门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度国庆节。



毛泽东满脸泛着红光，充满微笑在眺望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群众。

★ 在老百姓的心中，天安门永远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好像毛泽东生活在天安门上一样……

如果在中国评选知名度最高的“门”，天安门肯定当选。

这倒不是因为它金碧辉煌，在建筑史上占有怎样重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它早已成为共和国的象征。国徽图案上有它，电视新闻的第一组画面是它，人民币上防止伪造的标志也是它，就连咿呀学语的孩童唱的歌儿也离不开它，甚至打排球拦网成功了也被称为“天安门城墙”……

在封建社会，这里是皇帝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地方。每当举行重大庆典（如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时，就在天安门颁发诏书。宣读完诏书，用一个木雕的金凤悬着从城楼上缓缓系下来，礼部的官员跪在楼下接诏。这就是所谓金凤颁诏。皇帝利用城楼，显示皇权。至于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是禁地。百姓不要说从那里走过，就是多停一会儿，也会以“私窥宫门”治罪……

一唱雄鸡天下白。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标志着天安门回到了人民手中。自那以后，广场几经扩建，城楼更加庄严。每逢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举行重大的国事活动。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心目中是崇高的，在崇敬之中，也觉得有几分神秘飘渺，可

望而不可及。直到1988年天安门对所有的人开放，老百姓才有机会登上它……

从那以后，人们总爱把天安门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好像毛泽东生活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样。其实，毛泽东一生上天安门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有人作过比较确切的统计，他老人家总共上过45次天安门。——正常情况下，他每年上两次，“五一”一次，“十一”一次。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了。1966年，他老人家一年上了8次天安门——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接见“红卫兵”小将……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已经作古，他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在





1964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



1964年国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人们中间流传。同样，他在天安门上也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回忆和思考的脚印。

毛泽东挥动帽子，亲切地向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致意，这是当年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画面。直到现在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的一幅巨型油画，就是画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站立在城楼上，毛泽东面带微笑，神采奕奕，挥动着灰色的帽子的形象。

毛泽东每次上城楼都是走城楼后面的西马道，然后再坐电梯上到城楼的顶层。毛泽东来到电梯的门前，他不急于进去，而是站立在门口，开始大家不知道毛泽东这是在等谁，为什么不进去。不一



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民群众挥手致意。

会儿，宋庆龄副主席来了，毛泽东微笑地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并肩走进电梯。这细小的举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宋庆龄副主席的尊重。可是，许多人不知道，在他们来到城楼之前，周恩来总理已经先期到达，他先在电梯里乘坐一个上下，要亲自检查电梯的安全情况。而他自己从不坐电梯上城楼，都是从旁边的台阶拾级登上城楼。上去后，又亲自站在电梯门前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多少年，毛泽东主席总是挽着宋庆龄副主席登上城楼，周恩来总理又总是这样迎来送往。

无论是战火乱世还是太平盛世，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舟共济，可见两位战友情深意笃！毛泽东一上城楼，就快步走到平台的栏杆前，一边高呼“人民万岁”，一边挥帽致意。为了使热爱他的人民都能看见他，他一次又一次从城楼的这端走向另一端，这可不是一般的运动量，城楼平台足足有一二百米长。毛泽东主席丝毫不显得疲倦，脸上泛着红光。人民的领袖爱人民，人民的领袖人民爱。摄影镜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画面是无声的，静止的。摄影师镜头的画外音却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毛泽东登城楼的动人故事。



★ 毛泽东第一次上天安门，心情无法不激动，他对着麦克风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青年同志们……

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想像，这天毛泽东是清晨才睡觉的。当成千上万的人群拥上十里长街的时候，毛泽东却正在梦乡。

这些日子，他实在是太忙了，也实在是太累了。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马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有多少工作要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他身为统帅，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是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摄

绝对不过分的。

据当时的卫士回忆，他是中午1点钟才起床的。

从他当时的面容看，他睡得不是特别好——他毕竟是要登天安门，他的心中不能没有波澜。

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以后的第一工作是浏览床头的报纸。今天，卫士不得不打断他的习惯，催他穿衣吃饭。

他穿上了特意为他缝制的“礼服”——这是一套黄色的美国将校呢制服，是特级技师为他精心制作的。

他先来到了中南海的勤政殿，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领导人欢聚一堂，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点50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他们要在这里排队集合，登上天安门。毛泽东自然站在了最前面，朱德、刘少奇等紧随其后。

天安门的東西两口有两条马道，是供人们上下天安门用的。毛泽东走上马道的时候，的确有一种“马道通天”的感觉，面前是碧蓝的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苍穹，还有那么一两朵云彩点缀。

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因而，毛泽东的神情是严肃的。他走到天安门的正中央，立正站好，双目炯炯地看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

这时候，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

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了一下人群，平缓了一下呼吸。用湖南官话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声音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语。后来，人们说他在天安门上宣布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不是，他只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没有另外的话。

天安门广场上沸腾了。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要亲手升起共和国的国旗。





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无数的镜头聚焦在他的周围。

他大步走到升旗的按钮下，按动按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鸣礼炮28响。

惊天动地的礼炮声，使人们看到，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此时此刻，领袖的心情是激动的，群众的心情也是激动的。他们浴血奋斗几十年，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他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打下了一个新的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激动的吗？

朱德总司令下达阅兵令，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率领受阅部队接受最高统帅的检阅。是军威，也是特定的环境的作用，广场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方队整齐的脚步声。

毛泽东看着这雄壮的队伍，举起了指挥千军万马的手臂，向这支英雄的队伍敬礼。

阅兵到黄昏才结束。群众游行便在“团结就是力量”等歌声中开始了。整个广场上灯笼火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天，广场上最动人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

这个口号之所以喊出来，完全是出自人们的内心。人们已经无法用别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之情了。

曾经有人考证过，“万岁”这个词，是有点封建主义的味道，及至后来的“万寿无疆”，则更是旧时代的产物。不知为什么，人们那时偏偏选择了它。

当一个人被千百群众高呼万岁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这天毛泽东自始至终站在城楼上，始终举手向群众致意。面对群众的万岁声，他忍不住朝群众喊：“同志们万岁！”

当青年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金水桥的时候，毛主席对他们喊：“青年同志们万岁！”青年学生更加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走到扩音器前，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学生们的队伍。”

霎时，水银灯亮了，青年学生更加兴奋，几乎把嗓子喊哑了……



★ 毛泽东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1971年的“五·一”节。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但这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当然，这个事件中国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真相的。这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庐山会议上挫败了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计划。

这时的林彪撕去了唯唯诺诺的西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五一”那天晚上，有盛大的广场焰火晚会。杜修贤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

在这之前，杜修贤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他们跟了总理十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

杜修贤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

一般按照职位高低严格划分，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到城楼，见杜修贤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一般不能随便到跟前，这





1971年5月1日，林彪姗姗来迟，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这是当晚留下的唯一一张“正副统帅”在同一画面中的照片。



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规矩。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才参加过活动，晚上还能来吗？”杜修贤心里琢磨着，似乎有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去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北京后，好像精神状态不佳，几乎都在北戴河养病。工作人员私下里悄悄嘀咕，说林彪其实没什么病，主要是和主席闹意见。主席没同意他当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真是的。

夜幕终于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

色灯装，彩灯像画笔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跌宕起伏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光芒闪烁。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他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去年“十一”，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在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哟！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

老总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赅，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得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疑问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

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么？过去炮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眼前微妙复杂的局势？

城楼上，溴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杜修贤才发现林彪还没来。他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眉头，一脸枯寂的样子，从杜修贤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身上的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过来。大概没过瘾，才一

副委靡不振的模样。

他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他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没有再拍，到别处找镜头了。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头去，眯细眼望着林





毛泽东与外宾一同在天安门城楼欣赏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

彪、谦和而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天安门广场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看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

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寞无伴的刹那。随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当杜修贤再慢慢地踱到主席桌边准备拍摄时……啊！他僵住了，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杜修贤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好像非要证实自己的预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杜修贤心里慌慌的，希望不是这样。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他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杜修贤也没有意识到他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但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希望林彪还会出现在他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都在猜测，杜修贤心里滚过一阵阵的不安和惊恐，林彪究竟上哪儿去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简直

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作出今天这样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人们中间要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的头由右侧扭向左侧，目光扫过对面的空座位，没有停留，没有疑问，没有寻究……是否以为那空位子就应该空着？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总理跟前，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杜修贤一见，心里暗暗叫道：不好！连忙跑去问林彪哪儿去了。“林彪早就回家了！”杜修贤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我们也不知道哇。”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杜修贤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哇！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视不就被砸了吗？杜修贤又想起他的相机里那张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史无前例的窝囊，窝囊透了！

杜修贤茫然地回到主桌旁。毛泽东望着绚丽多彩的天幕，微微张着嘴，露出亲切和善还带有童趣的笑容。眼前变化无穷的画面，使他忘记烦恼，愉快地沉浸在色泽、光束、跳跃的遐想中。

闪烁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那样地刺目！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不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向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最好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

怪行为。

当时城楼上还有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惊恐地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杜修贤不由得望了望手里的相机，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惟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填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礼花仍在不断地“噌噌”地往天上蹿，漆黑的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着自己多姿多色的肢体。





1971年5月1日晚，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欢呼的群众招手致意。

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天安门城楼……大地仿佛置身在瞬息万变的彩色光环中。

夜色多华丽！

毛泽东忘情地瞅着一个又一个轰然而炸的巨大“花朵”……周恩来却烦躁不安，不时地望望这边的空位子……

在礼花和礼花相衔接的刹那，杜修贤突然发现天空怎么这样漆黑幽深，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没有一点亮点，他可从没有觉得天空有这么黑，像泼洒了一整版的浓墨！

★ 当晚，记者们从没见过周总理发过这么大的火。这张特殊的照片竟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的见证

终于，礼花结束了她千折百回的变化和重复。

月亮、星辰渐渐她从浓墨底层浮了出来，铺在大海般的天幕上。杜修贤又寻回了他所熟悉的星光月色，心灵的震动和骇怕似乎平淡了许多。

“老杜。”

杜修贤又一震，是总理叫他。杜修贤原地转了个圈，找不着总理在哪儿叫他。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过人影缝者见总理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他。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她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杜修贤刚想说没有，见总理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



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杜修贤见总理神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

杜修贤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随杜修贤走进休息室，总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杜修贤悄悄地擦着总理背后，躲到旁边的屏风后面。当时见总理气恼的样子，心里发虚，就萌生了个小小的“计策”。先躲在总理的身后，如果点到他的名，他可以立即投入总理的视线中，如果不点他的名，总理可以看不到他。

杜修贤在屏风后面听到总理一个个挨着点名，心怦怦差点从嘴巴里蹦出来，好像下一个就会点他的名似的。最后没有点他的名字。是忘了还是没叫他？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活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总理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儿。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



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后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着坑，在自己的裤缝上摩擦出皱褶。

……屏气凝息中似乎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沉默需要有特别的承受力！

杜修贤跟总理这么多年，头遭见他发这么大火，吓得窝在屏风后面一动不动。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靠你们解释。”

这时总理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的身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98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暗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总理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杜修贤也轻轻地从屏风后面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1971年5月1日晚，周恩来总理神情严肃地
注视着不辞而别的林彪留下的座位。



“老杜，你等一下。”

杜修贤心里一哆嗦：我的天，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哎！”杜修贤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路上，杜修贤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杜修贤目不转睛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他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此时他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说实话，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做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抄在袖筒里，他弓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

车灯又一次划破夜幕，在宁静的马路上疾驶。沙沙沙……偶尔一个颠簸，杜修贤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困倦迅速席卷全身……渐渐地走进另一个世界。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机把他从梦中推醒。

下了车，双脚像踩在棉絮上，走了几步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已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杜修贤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杜修贤，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他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杜修贤坐。杜修贤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一会儿他问杜修贤，“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不好回答，因为他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杜修贤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

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杜修贤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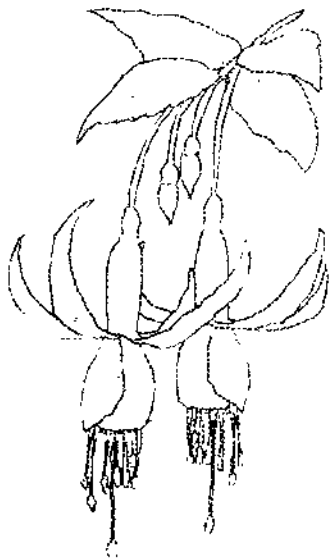
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但此事在新闻记者中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视的。


——他们看到了林彪的另一些表现，看到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另一些情况。他并不是时时事事紧跟毛泽东的，也不是时时高举语录本重复毛泽东的话的。

看来他真的要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这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

打那以后，毛泽东再没有气宇轩昂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第七章
惊心动魄的
九·一三



1971年7月，毛泽东与林彪会见罗马尼亚客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会见外宾。

★ 杜修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一人萎缩在大厅的西北角，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再在杜修贤镜头里出现时已是6月中旬，天气已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他也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客人。

这次接见罗马尼亚的客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这是毛泽东经常会见外宾的地方。心细的读者或许会以为毛泽东是湖南人所以也就喜欢湖南厅。其实不然，湖南厅紧靠着人民大会堂的西大门，不像有些厅要东拐西拐，楼上楼下地跑，一进人民大会堂西南的第一个门就是湖南厅，进进出出很方便。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般称湖南厅为118房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轨道，他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他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的记者，叫把先拍的胶卷送回社

里冲洗。回到大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面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杜修贤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他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出来的！

人家光着头还热得哧哧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尊陈设的蜡人。当时杜修贤还以为他生什么急病，奇便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





1971年7月，周恩来参加会见罗马尼亚客人的外事活动。



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首长上医院？其实，林彪此时正在受着大烟瘾的折磨，谁也救不了他，只有“救星”大烟土能使他摆脱折磨。他的警卫员们清楚知道他的“病情”，所以在一边并不着急，等待首长熬过痛苦的时刻。

可林彪长长的枯坐，使杜修贤这个不明真相的人经历了长长的忧怕！

他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空椅子几乎是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

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

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

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杜修贤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杜修贤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里。他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海深处映出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杜修贤从内心惧怕他，躲避他，一想起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浑身就不自在。

他没有停留，快步走出人民大会堂。

晚上，他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大会堂里宴请罗马尼亚的客人。杜修贤在西大厅里找到总理，将照片交他审阅。他站着匆匆看了一遍，十分果断地选了三张照片签发。

杜修贤接过这三张照片，心里有点抱不平，总理干吗老是将自己放在后面？明明可以放在前面他还是放在后面，他扣下自己单独的照片不让发。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康生和周恩来会见客人。

总理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在前面，谁不该在前面，等等诸多细节他都会考虑得全面周到。可近一年里审阅照片，连杜修贤这个粗线条的人也察觉了一种变化，总理似乎比以前更细心——一种近似拘谨防备的细心。往日的慎重和今日的谨慎已经有着不相同的内涵。

转眼，到了中国共产党诞辰日，正好整整50周年，肯定会大庆一番。

没有想到“七一”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公开露面。

没有他们合影怎么办？报纸发愁啦。党的生日正副统帅都不露面，老百姓这一关说不过去。幸好搞报纸的人都极有想像力，想出一套“鱼目混珠”的办法。还真的真假难辨呢！“七一”那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了一张以前的照片，林彪手摇“红宝书”紧跟在挥手的毛泽东身后，这个形象是当时的“标准形象”。见报后，谁也没有对这张照片形成的时间发生疑义。不过善良的平民百姓从不会无端地怀疑中国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会有什么不忠！

报纸又一次平安度过重头新闻的敏感日子。人民的心灵被“紧密团结”的大幅照片安慰了。

那大幅照片后面是什么？

不必说老百姓了，就连中央高层也未必知道“紧密团结”的后面是什么。

四平八稳的新闻照片后面是杀气腾腾的军事政变！

新中国的纪念节日，大多集中在下半年每月的首日。新闻界好容易度过“七一”，马上又迎来“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日，没有正副统帅露面更不行。报纸只好又如法炮制。这次发照片，新闻界已是颤颤巍巍的，生怕露马脚。没有想到江青这时插了进来，帮了新闻界一个大忙——《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扉页，亮出一幅林彪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大照片，题为“孜孜不倦”，下方署名：峻岭。

人们第一次看见林彪不戴帽子，亮出半秃前顶，孜孜不倦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无疑，林彪“无限忠于”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

作者峻岭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能近距离接触林彪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好奇的视线热点渐渐地凝聚在对作者和林彪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探询上。消息的渠道有时就和地上的道路一样四通八达。

峻岭就是江青！

他们从1966年合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最后一次1971年画报发表江青拍摄的林彪学习



《毛泽东选集》的大幅照片。五年间，他们之间有过合作也有过争斗，有过利用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关系犹如微妙循环的圆周，这次合作命中注定是他们最后和开始的重合。

★ 九·一三前夜，人民大会堂的气氛倏然紧张。总理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自己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张大夫猜测：是不是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

后来杜修贤听总理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详细叙述，才知道林彪外逃那一刻，总理是多么地紧张，他以惊人的反应处理了这个重大事件。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两三次会。

会议进行到10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止。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

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



在外事场合中，毛泽东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更是散不了会的。

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尾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1965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118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与外宾合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用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促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



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张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

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扭头朝北

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

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勾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思。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

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地遗丢在机场的跑道上，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子弹痕迹。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追逐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林彪乘坐专车上那三个白色弹着点，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惟一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沙漠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

又载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时干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阴谋败露，不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118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118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20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俩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听见总理提高嗓门儿，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撑挥手，就转身往回走。

事后才听有人说，主席那次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说：“主席还说了，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 灯光，投在毛泽东憔悴的脸上。无法接受的事实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十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





1974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里会见外宾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无，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



晚年的毛泽东总是沉默少语，目光中多了沉郁的神色。

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儿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都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从内部捣乱，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13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

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操劳而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大。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光，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

灯光，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

灯光，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欢迎外宾。

毛泽东历经沧桑，临大事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无疑也是对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言宣判。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1971年初冬。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倏忽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烁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大家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杜修贤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还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218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毛泽东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意念，仿佛陷人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了，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

酷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

★ 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周恩来兴奋地叫道：“拿茅台酒来，大家庆贺庆贺！”聚集在会议厅里的高级将领一听总理这话，高兴地取来杯子，和总理一同开怀畅饮

14日上午，中方得知蒙古境内坠毁一架民航客机。

15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领随员前往出事地点，经过两天的巡视和验尸，所得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是林彪所乘逃跑的飞机。当天夜里，这个比较准确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第一个松了口气的是周恩来，他穿着睡衣，兴冲冲地由他的西大厅跑到毛泽东住的118房间，将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主席。

林彪外逃失败这是最理想的结局。

至少大量的军事机密没有泄漏出去，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叫道：“拿茅台酒来，大家庆贺庆贺！”聚集在会议厅里的都是待命的高级将领。他们一听总理这话，唰地起身，高兴地取来杯子，和总理一同开怀畅饮。

所有的紧张、担忧和沉重，顷刻间被浓郁的酒水融化了。他们品尝了一杯从未品尝过的好酒！留在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因为林彪摔死，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

林彪虽然死了，但遗留的工作仍然棘手，比如要层层开小口吹



风，一点点增加人们的心理准备；对关闭机场、停止国庆庆祝活动等，大家也都非常敏感，必须做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已经向世界公布了《中美联合公报》，全世界都在翘首以待来年初美国总统的访华活动，中国政府怎样既要淡化林彪的身份，又不惊动国际舆论……这许多事情的处理都使周恩来煞费苦心。

作为林彪死党，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10月3日，刚刚过了国庆节，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传播，对外还一直保着密，包括部队，所以对于黄、吴、李、邱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才能逮捕法办。先从内部控制他们，不能打草惊蛇，不然，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

到了10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灾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和反党计划，最著名的文件大概要数《“571工程”纪要》。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

他们的口号和纲领之反动之猖狂之恐怖实属罕见。“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1967年逮捕“王、关、戚”，1968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秘密行动。中央警卫局——毛泽东的绝对听从指挥的部队，一声令下，抓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尽管抓“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神圣使命。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采取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



为了不打草惊蛇，中央决定让邱会作出访越南。



毛泽东主席与外国来宾在天安门城楼上。

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请进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来人，由办公厅负责人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了。

不一会儿，黄、吴、李三个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被带进吉普车里。在捉拿黄永胜的时候，还费了点劲。黄永胜自恃自己是总参谋


长，见有人来架他，马上警觉地高声叫道：“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且奋力挣扎。但是事先考虑到反抗的问题，选派执行任务的人不仅个儿大，而且都是副团长以上职务的军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非常镇静，也富有经验，不等黄永胜再挣扎就利落地将他手反背到身后。为防止不测，从他身上搜出了水果刀、药品等物品。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别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

事不宜迟！打电话追到西郊机场，通知他马上到大会堂开会，对邱会作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将他逮捕。他没有反抗，被抓，好像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将他押进电梯的时候，他看见了张大夫，就叫他。张大夫知道他已经不灵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还是应该上前去看看。电梯的门开着，邱会作被两个人看押着，以前的威风不见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向张大夫要安眠药，说是没有药他睡不着。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毕竟和政治不一样。他觉得从医德出发，可以给他一点药。就说：“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的想法和他一样，可以给一点药，量不要大。张大夫取了几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药性小的安眠药，送给还等在电梯里的邱会作。他接了药，连连说谢谢。或许这几片药还真的帮他度过了几个难熬的长夜。

后来大家参观邱会作的住宅，才知道他生活极其糜烂，吃药成瘾，各种药品堆满了房间，补药品种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直到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首先惦记的还是药。





第八章

面对诗友的遗像

悼念陈毅同志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时
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 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在凌晨的钟声中停止了跳动。“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的突然决定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去世的。

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熟睡一样，那么安详，那么轻松。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生命的钟声永远地沉默了。

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白发苍苍，颧颤巍巍的老帅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老战友，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冲杀出来的，今天说什么也不忍心让陈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送他一程又一程。

一程比一程凄凉，一程比一程涕零。

几个小时前，他醒过来，听见叶帅的声音：“二月逆流”平反了。他终于了却了人世间巨大的也是最后的心病。

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床前那台心动监视荧屏似乎再禁不起亮点的蹦跳，它太累了，歇息下来，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陈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南海。

1月8日，毛泽东含泪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在八宝山。

当毛泽东看到悼词时，发现连头带尾只有600字，而且简历占去了一半篇幅。毛泽东提笔圈去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但是，接连几天，宋庆龄副主席都来电话说，她坚持要出席陈



陈毅副总理喜欢下围棋，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对弈。



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发来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还有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

陈毅的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这一天的中午，身穿淡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安。他面色略显憔悴，腮边胡须很长。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以前。这一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

半月来，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散散步。但是，这时的毛泽东由于受健康状况的限制已经不能散步了。

按惯例，午饭后，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他今天躺在床上，四周虽寂静无声，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那么地烦躁不安。

卧室里没有日历，床头没放钟表，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以后，他一直心中不安。没有任何人提醒他，10日，就是今天，再过一会儿，3点钟就到了，陈毅的追悼会就要举行。

突然，他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告诉他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人感到太突然了。工作人员赶紧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人。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大家赶忙替他穿好上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

行呢？可是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有时候使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抱着大衣搀扶着毛泽东上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处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但他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說：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又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搁下电话，周恩来乘车急速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张茜听到这突然的消息后，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双泪长流。周恩来安慰道：

“张茜，你要镇静些呀！”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呀？”

是啊，从1956年以后，毛泽东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人的追悼会。这一次，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呢？从表面上看，毛泽东要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突然性，但是，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自责和悔恨的流露。

经过“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的强烈刺激，毛泽东毕竟老了。这时的毛泽东尽管意志依然坚强，但心理却无可避免地变得脆弱和易动感情起来了，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从而又一次进入了极为沉重的反思。

1971年9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度过了一连两个不眠之夜。一个月后，他以自嘲的口吻对别人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呀！”他又引杜牧的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说：“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

真是‘折戟沉沙’呀！”

经过反思，毛泽东一方面彻底认清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便他加深了对像陈毅这样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被打倒或遭贬抑的老同志、老战友的认识和感情。

1972年2月，正当“九·一三”事件刚刚在全国传达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了。毛泽东同他谈话时，似开玩笑又似自责地说道：“我喜欢右派。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后来，他又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



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几个月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见上帝去了。”

认识愈是清楚，感情愈是加深，从而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便产生了一种自责和悔恨之感。他十分希望陈毅等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经历了这一场风波，曲折之后能够谅解他，并恢复原来的友谊和信任。

痛苦和失望、自责和悔恨、痛惜和希望，这种种矛盾一直纠缠着毛泽东的心。因此，毛泽东决定抱着重病之躯亲自来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或许可以说，这既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更是使他的心灵能够得到解脱的一服良药吧。更何况井冈山的老战友一个一个地都离他而去，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

★ 周恩来在致悼词中，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向前，他双泪
长流，静静地听着

追悼会安排在下午3点开始。

吃过午饭，摄影记者杜修贤提前赶到了追悼会现场，在休息室

里休息。

“总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句。

他一看表，才两点，这么早！

总理已经站在台阶上正指挥人去找电炉。看见杜修贤，高声叫道：“老杜，你也来了？正好正好。”

什么正好？杜修贤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看着总理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他又插不上嘴问。过一会儿见到了总理的卫士长，一把拉住他，“哎，老张，总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啊呀！你不知道？主席要来参加陈老总的追悼会。”卫士长一



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陈毅那开朗的性格几乎就写在他的脸上。

字一顿告诉他。“谁？主席！”他一惊，“真的吗？真叫人意外。”

十几只电炉很快就找来了，在休息室里发出通红的电光，热气弥漫，整个房间变得暖洋洋的。

总理来时，进八宝山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还阒无一人。转眼警卫人员已立柱般地守在路的两旁……刚把安全工作布置好，毛泽东的“吉斯”车便驶进了人们的视线里……

主席的车一停，杜修贤连忙举起相机。我的天！主席这是穿的什么呀？

灰色的呢大衣下面露着一大截睡衣下摆，再下面是灯笼似的绒裤，脚上一双“老头鞋”。

不管怎样先拍下来再说，他迅速抓了几个镜头。

这时毛泽东已被大家簇拥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他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后来才知道穿睡衣出门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周恩来也是穿着睡衣坐进“大红旗”里的。

当时总理打完电话，也忘了身上还穿着睡衣，就匆匆往外走。几个卫士七手八脚抱着总理的衣服，提着鞋，叫总理，总理却说：“上车穿！”上车时卫士还绞了把热毛巾，好给总理擦把脸。坐在车里，总理也不忙换衣服，一个劲儿地叫司机快快……车子跑得都快飞起来了。车厢里小，人窝着换衣服，真不得劲！把总理折腾得够呛，卫

士们也忙了一头汗。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的会场，而周恩来在汽车里换下了睡衣。

张茜的脸色憔悴、苍白。见到主席时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声音呜咽暗哑：“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杜修贤这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独特的瞬间。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转而关切地问张茜：“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又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毛泽东还一一问及陈毅四个孩子的情况，最后深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努力奋斗哟！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张茜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有多少话要对毛泽东说呀，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是能团结人的。”

在毛泽东谈话即将结束时，张茜真诚地请求说：“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摇头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说，西哈努克亲王和央人来了。主席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总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席穿着睡衣带药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周恩来总理致悼词。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是参加追悼会的唯一的外国人。

理没法答复他，当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怎么能同意一个外国人参加呢？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亲王面部紧张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西哈努克亲王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摔死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



逃掉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会场内没有奏哀乐的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随着哀乐声起，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沉重、缓慢，不足600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向前。他双泪长流，静静地听着……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当他抬起头时，久久凝视着陈毅微笑着的遗像，他默默地望着，站着，仿佛在思索着什么，……然后才慢慢地离去。

陈老总啊，此时此刻你能听见毛泽东的心声吗？！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她看到毛泽东上汽车时，腿明显地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只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诗友的追悼会。

望着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渐渐远去，强压在张茜心头的悲痛和激动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跑过去紧紧地抱着陈毅的骨灰盒，放声痛哭。她多么盼望能用自己的哭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陈毅呀！她又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心灵的呼唤，驱散陈毅直至去世仍凝聚在眉宇间的悲愤和忧虑呀！早在1961年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就曾担心地说道：“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当然，把我说得那么好我也不赞成。我只求那时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是啊！敬爱的陈老总，坏人是造了你不少的谣，可是，今天，毛泽东没有忘记你，终于给你平了反，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吧！

236



★ 陈毅的去世，使杜修贤失去了倍感知己的领导、朋友。他禁不住又走进了与陈老总相处的岁月，又想起了那小小的打火机，那忘不了的遗憾将伴随他终生……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杜修贤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一会儿工夫，白天追悼会上那令人心碎神摇、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立刻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主席睡衣怎么



陈毅元帅与外国贵宾热烈握手。

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从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看不出毛泽东穿睡衣的痕迹了。

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照片和消息发在全国各大报上,反响非同寻常,毛泽东的一席话无疑是给受“二月逆流”冤屈的老干部们带来了希望。

陈毅的去世,使杜修贤失去了倍感知己的领导、朋友。悲怜的心灵又一次失去控制,他禁不住又走进了与陈老总相处的岁月,又想起了那小小的打火机,那忘不了的遗憾将伴随他终生……

我们那次相遇是在庐山。当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场召开。也就在那次会议上,林彪一伙突然跳了出来,打着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旗号,妄图篡党夺权。

当我拍完台下的场景,突然看见陈老总坐在离我不远的前排,我惊喜万分,叫道:“老总,久违了!”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真想和他好好唠唠,许久没有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和诙谐的川腔了。

1969年底,我从新疆回到北京,就去中南海他家里看他,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老总一家疏散了。疏散?后来一问,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差不多都被疏散了: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

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几次想去石家庄看望他,可红墙里的拍摄不停地加码,不久又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拍摄,更是一步也走不出红墙了。没想到在庐山看见了时常挂念的陈老总。

可相见正逢有拍摄任务,不敢停留,和老总一句话也没说上就匆匆走了。

大会期间,疏散各地的老同志参加所在地区的分片小组讨论。

陈毅分在华北组。

就在这时，我提着机子转悠到华北组的会议室里。一进门就觉得里面的气氛压抑！怎么个个脸都阴沉沉的，发言的人也不像其他组慷慨激昂，眉飞色舞的，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

我的目光朝陈老总看去，他的注意力在手上的一份材料里，脸上浮动着一一种叫人陌生至少叫我陌生的沉闷情绪，以前他可不是有这种情绪的人啊！我想了许多，惟独没有想到老总被推到“众矢之的”的艰难境地，先受林彪及其同伙的非难，后成张春桥攻击的目标。

我拍了几张照片，就准备离开这间充满不愉快空气的房子。

“喀哒、喀哒……喀哒”耳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喀哒、喀哒……”打火机的声音一下一下固执地响着，这是谁的打火机？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陈老总的。他嘴上叼着烟，苦着眉，望着手里的打火机。我一看打火机那笨拙样子就知道是国产货，用汽油的。老总又使劲地猛甩了几下，“喀哒、喀哒……”任凭拇指捻动搓轮，只见火星，不见火苗。老总气急了，“砰”的将打火机摔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抹下嘴角的烟。虽然他嘴上什么也没说，可我清楚地听见他心里重重地骂了一句：龟儿子打火机！

我掏出火柴，大步走到老总的沙发后面，“嚓”地划着了火柴，递到老总的侧面。老总一惊，猛地调过头，见是我，顿时眼窝里荡出愉悦的波纹。他笑咪咪地拢起手围住火，将香烟投进火苗里。“哈——”他舒坦地吐出一口浓烟，我干脆将火柴塞进他的大手里。他惬意地朝我挤了挤眼睛，仿佛说：好安逸哟！

我一阵心酸……不敢再和他对视，转身快步走出会议室。

陈老总那股子倔强、固执、乐观的劲头儿都收进了我





陈毅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向全体军队学员讲话。

的眼睛里。

他没有变，一点没变！

天渐渐暗了，庐山的群峰隐进了神秘的夜空里。

明亮的灯光和闪烁的星光搂抱在一起，飘渺的云影和黝黑的山峦也搂抱在一起，组合成美妙如仙境的夜晚。

我在宾馆里，将当天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后，又选出发稿的照片。这时夜已很深了。我望着窗外朦朦胧胧已开始涌动的云雾，仿佛又看见老总沉闷愁苦的眼光和一闪即逝的愉悦……最后我决定去看他，立即就去！

陈毅住的地方离我们工作人员住地不远，老帅住区大多是两层小楼。我找到他的秘书，秘书和我是老朋友，也多年不见了。他高兴地带我去陈老总住的小楼，推开虚掩的厅门，秘书丢下我就“咚咚”地往楼上跑，向陈老总通报我这个不速之客。

老总在二楼的客厅里。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苍老却又快活的四川腔：“叫他上来，快叫他上来呀！”可待见到我时又叫道：“老杜，你好大胆子，敢来看我呀？”

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刚才还叫我快进来，这会儿又说我胆子大敢来看他。

“老杜，我是啥子人物？中央点了名的人哟！”

他这是指“二月逆流”事件。我知道。这有什么？我才无所谓呢！

“我有什么不敢？我也被打倒了，倒了好几年呢。”

“噢……你也倒喽？那怎么解放出来的？”

“总理把我解放出来的。去年，总理要我随他出访朝鲜，才把我从新疆调回中南海，不然晚几天，我连命都丢在新疆了。别说胆大敢来看您，那时就是想胆大胆也没了。”

“哈哈……你好福气呀！有个好后台。哈哈……”

这震耳的笑声真让人浑身舒服，心里说不出地高兴。

“老杜哇，以后不要来看我，这样对你不好哇。这次见到熟人我都不敢和别人打招呼，怕影响别人嘛！”说着他取了一包烟往我跟前一丢，“抽烟。还这么大瘾吗？”

“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口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维艰，时时要躲明枪防暗箭的，可是心里还想着别人，替别人考虑。

空气开始沉闷。



我换了一个话题：“老总，你看上去身体还可以嘛。我年轻吸烟多没问题，你可要节制吸烟哟，烟可以提神、解闷，听说也致癌呀。”

不幸被我言中。老总回到石家庄就发现得了肠癌，而且是晚期。

“还凑合吧。人老了，就有个别零件磨损了，有时运转不灵，不是这卡着就是那生锈。我想我大病不会有的，心脏就没病，这是主要部件。”已和死亡之神握手的陈老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要保重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挺忧虑的。

“来，再抽一支。”这时老总掏出白天打不燃的打火机，他没用手去捻轮子，而是搁在手心里颠过来颠过去地看。“唉！这龟儿子打火机，用了没几天就打不出火来了，打出人一肚子气！”

我用火柴给老总和自已点燃了烟，说：“老总，咱们自己国产的打火机就是比不上外国生产的。老外生产的一种新型打火机，好像是……叫气体打火机。比咱这个好使多了。”

“是啊，我也早就听说了，硬是搞不到。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哎，老杜，你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怎么样？帮我

搞一个。”

陈老总朝我跟前凑凑，略带神秘地作了个拇指按打火机的动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谁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外交部部长会为一只气体打火机而苦恼？

这个世界已颠倒得叫人欲哭无泪，欲说无语！

我哽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南海常有特制的烟和火柴供应，加上常要出国，能买到一些国内的优质产品，这



些生活琐事从不会让元帅自己操心的。而现在陈老总竟和我们一样，生活变得这样现实这样普通也这样烦恼。

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幽默乐观地对待自己坎坷的人生。他一边嘲弄手里的打火机，又一边爱不释手地摩挲它。

我深深地感动，也由衷地敬佩，便一口答应了他。因为我以前曾从熟人手里抢过一个气体的，没几天又被另一个熟人抢走了，就这么抢中抢似乎搞一个并不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为陈老总搞气体打火机竟是如此地难。

陈老总的眉头立即飞扬起来，好像手里已拥有了朝思暮想的气体打火机，“那我可要好好谢谢你哦！”

我看看时间已过了午夜，就赶忙告辞。

陈老总一直将我送到楼下，出了门，他宽大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重重地甩了一下。我心里顿时滚过酸涩的热浪，眼眶也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地揣度陈老总刚才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心里想，莫非他……真的被甩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吗？

山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天，天色似墨，幽静的山道显得哗哗作响的溪水声更加欢腾，富有诗意。到

驻地天色似乎透出幽蓝，隐约勾出兀立的山崖和浑厚的山脊。浮云凝在山腰，像拴在山腰上的带子……我好像听见大山的叹息和云带的笑语。

后来几天，我知道了老总的处境不妙，开始为他捏着把汗。陈老总性子直而锐，他能承受吗？

陈毅镇静自若，沉默不语。

这是悲哀呀，极大的人类悲哀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陈老总就在艰难地吞咽。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就餐的餐厅是个两层楼，上面是部分领导人就餐，下面一层是我们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和陈毅的秘书，徐向前的秘书，还有蔡扬的秘书在一个桌上吃饭。谈笑间，陈老总背着手走到我们桌前，像是巡视，目光扫过桌上的每一份菜，我们连忙招呼他坐下一起吃。他大手一抹嘴，“我吃过了。哟，你们的菜和我们吃的一样嘛！嗯，就少了酒。”说完他看着我，问我：“还喝酒吗？”我回答：“喝！”没想到老总转身就往楼上走，“我去拿一瓶给你们喝。”

这怎么能劳驾老总亲自去拿酒！我忙想制止，老总已上了楼。我只好不安地等老总拿酒下来。

“老总就记得你会喝酒，还逞能，代总理喝酒，结果喝得东倒西歪。现在还这么穷喝？等会儿酒来了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秘书们知我的底细，取笑地揭我的短。

“什么呀？老总爱喝酒，我是陪他喝的，待会儿没你们的份儿，我和老总喝！”

“老总现在不能喝了，消化不好，一喝酒就闹肚子痛。”陈毅的秘书接我话说。

“哦——？”我不相信，陈老总的酒量可大了，不喝酒

他不难过？

砰的一声手榴弹似的酒瓶立在我们的面前。哟，我们顿时眼睛一亮，“四特酒”——江西的名酒哇。

“老杜你能喝，一斤八两不会醉的。”陈老总乐呵呵地望着我。

“老总你也来一杯。”我为他斟满一杯酒。

“我没有口福了，不能喝酒喽，一喝肚子就有意见。你们喝吧，喝吧。”

我遗憾地望望老总，只好作罢。



他站在我们旁边，一直看着我们斟满酒才满意地离去。

一会儿一瓶酒就叫我们几条喉咙“量”个底朝天。

陈老总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没有发现的绝症飞回石家庄。

我在庐山又停留了几天，拍了些风景照，回到北京已是9月中旬。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四处打听谁要出国，忙得像个“克格勃”。线倒是抛出了好几条，拉回来的都是空钩，不是没带回来，就是带回来了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气得我够呛！

一次我听说一个熟人从国外回来了，赶到他家。一问，还真有一个气体打火机。可还没出他家的门，被他回家的爱人堵住了，非要我留下打火机才让我走，说是她早我一步已答应给别人了。

空欢喜一场，煞是扫兴！

再问熟人：“什么时候能再带一个？”不问还好，一问急得我差点没去跳楼。

我的名次排在第29位！

因是陈老总要的打火机，熟人答应把我的名次提前，早一点带一个给我，我这才稍稍地宽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托人的事没个准，气体打火机仍

无着落。我又一时没出国任务，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来陈毅患癌症的消息，我更加焦急地盼望熟人能出乎意外地给我带一只精美的打火机，能让我送到老总的床头。可是我寄予重望的朋友没有回来……

杜修贤在医院里陪着陈老总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但心灵的遗憾却要伴他度过终身——未能实现老总生前小小的“奢望”，给他找一个气体打火机。

陈老总走了，永远地走了。





毛泽东发现了他最不喜欢的“家伙”——记者的摄影机。

246



几天后，朋友兴高采烈往杜修贤面前丢来一只气体打火机，杜修贤浑身颤悸，咆哮道：“太迟了！为什么不早点，为什么不早点哪！”

朋友僵然，许久没有想出一句安慰他的话。

杜修贤掩面长叹。将迟到的打火机珍藏在书橱的高处，成为纪念也成为终生的遗憾，已随他度过三十多个春秋……

★ 虽然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陈毅开始就很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要紧跟毛泽东，积极地参加。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各种罪恶活动，终于引起了陈毅极大的愤慨和抗争

陈毅的去世，他中南海的毛泽东又大病了一场，是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他那孤独、悲伤的心灵难以平静？……

他想起一句他曾经当着陈毅面说过的，最令陈毅心寒的话。

那是“九大”的前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九大”代表问题时，陈毅表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三条标准，恐怕自己已不够格了。

然而，毛泽东说：“这三条你不够格，你可做右的代表嘛。”

毛泽东的话使陈毅感到震惊万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句话来，是毛泽东为了避免障碍，设法让陈毅参加“九大”而采取的一个策略，还是我陈毅在毛泽东的眼中真的成为一个右派了？陈毅陷入了苦苦的深思之中，他百思而不得其解。

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让陈毅避了罪，让张春桥一伙更猖狂。

会前，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委竟发函给陈毅说，上海几十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投身革命40余年，陈毅是党内公认的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更没有否定过。他曾亲口对孩子们说过：“你们学我，就学我的坚定性，无论革命遭到什么样的困难、曲折甚至惨痛失政，我都没有动摇过！”

然而，如今被否定的，正是他惟一自信的革命坚定性！他对秘书说：“到底我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做结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情最终会弄清楚！”

“九大”如期在北京召开。按照大会的严格规定，陈毅不带秘书，



一人住进了京西宾馆。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会议期间，陈毅被安排在上海小组讨论。早在开会之前，由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委为了肃清陈毅在上海的影响，特地炮制了一个《陈毅黑话》分发给上海市参加“九大”的每一位代表。

陈毅第一天参加会议就受到了批判。那天，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有几位代表站了起来，亲热地与他握手、问好，陈毅微笑着一一还礼。再往前走，有人故意当着他的面不打招呼，假装没有看见；有的还指指点点，像观赏一个什么怪物似的……陈毅并不知道，刚才握手的那几位，都是代表团的“右”派代表。市委编印的《陈毅黑话》没有发给他们。

陈毅刚坐下，徐景贤突然领头呼喊：“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陈毅有点气愤，但他并不惊慌，他缓缓地站起身来，面对周围冰冷、生疏的面孔，语调缓重地说：“诸位代表，各位同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九大代表，我一定要……”

“陈毅！”陈毅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人就站起来恶狠狠地说，“在党的会议上，你竟敢继续反党！”顿时，口号声震耳欲聋……党的代表大会一下子变成了对陈毅的批判会。

陈毅十分心寒。

多少年来，陈毅对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他老人家也是无限忠诚。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陈毅开始就很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要紧跟毛泽东，积极地参加到这场让他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在每一次的政治斗争中总是正确的。

他曾经说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我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这



就是陈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心态。因此，在这一时期，陈毅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求身边的同志和自己的子女也要这样做。一次，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儿子回家，当他得知七机部正开群众大会时，便催促儿子赶快回去参加大会。他说：你应该积极参加群众运动，不要自己跑回来，应参加大家的斗争。运动刚开始不久，当华东某省委书记来找他，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时，他还劝这位省委书记要接近群众，采纳正确意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毅为了能紧跟毛泽东，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尽量往好的方面去理解。1966年9月下旬，在一次国务院工作会议上，陈毅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说，“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政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不久，他又说，为什么要开展一个“文化大革命”，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结果，不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危险性很大。接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思想、各种组织的出现，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世界革命的逻辑。“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革命气魄，敢干，敢接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赞成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同年11月13日，陈毅在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上又说，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一直是正确的，而且最会作路线斗争，我们最佩服的也是他。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开展下去，陈毅还向毛泽东提出了“教会娃娃们接路线斗争”的建议。那是在1966年8月3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陈毅见到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接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

于是，陈毅便利用一切机会从自己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出发，针对当时的情况大讲特讲“要学会搞路线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也会发脾气——冲着黑森森的镜头喊声“出去！”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陈毅对这场运动越来越感到不理解了，他开始陷入深深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1967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全国有了进一步蔓延。年初，在所谓“一月风暴”的狂飚中，全国到处掀起“夺权”的浪潮，各级党政机关很快陷入了瘫痪状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个领导干部挨批斗、被整死……林彪、江青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惟恐天下还乱得不够，他们乱了我们的国家，乱了我们的党，还要乱我们的军队。这一切使人们对林彪、江青这一伙阴谋家的野心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从而对他们的各种罪恶活动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愤慨，胸中积满了怒火。“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为了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他已经不能再忍，不能再退了，他要和老师们起来抗争。他说：“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人顺顺从从，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又说：“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我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这时不跳，更待何时！”

2月中旬，一场公开的抗争终于在怀仁堂爆发了。

2月11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

堂举行。在这次会上，叶剑英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康生蛮不讲理地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





陈毅同志追悼会场外人山人海，络绎不绝地向老师作最后的告别。

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小声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这次会议是小试锋芒，大的抗争还在后头。2月16日下午，陈毅夹着皮包，迈着缓慢沉稳的步子又走进怀仁堂会议室。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几位副总理也来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肖华、杨成武等一身戎装，迈着军人特有的庄严步伐也来了。过一会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等也慢腾腾地走了进来。

一场激烈的抗争开始了。



请看当时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集体整理和核对”的这次会议记录。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要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

史上任何一次。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拿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的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从这个经过整理的记录来看，陈毅当时讲的这些话，触及了三个重要的“痛点”问题：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这三个问题对毛泽东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晚年斯大林”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现在毛泽东把班交给了谁，谁相当于赫鲁晓夫，是路人皆知；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是伟大的，但其中有些问题，颇为重要和敏感，从来心照不宣。如今陈毅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了。

这就是所话的老师们“大闹怀仁堂”。

254



★ 陈毅在行将告别人世的最后几个年头里，他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是十分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的感情带着苦涩和悲怆的味道

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怒火。但是，毛泽东并不像林彪、江青一伙那样要乘机把陈毅等老师统统打倒，而是他对亲自动机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太热心了，容不得人有半点的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

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陈毅挨了整，但他对毛泽东几十年的情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弱，相反，在行将告别人世的最后几个年头里，陈毅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是十分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的感情带着苦涩和悲怆的味道。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陈毅原定去开封，徐向前考虑自己身体比陈毅好些，石家庄医疗条件较开封好，便向周恩来提出，让陈毅去石家庄，他自己去了开封。

陈毅到石家庄后不久，就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张茜为陈毅的身体深感不安，她同陈毅商量：“还是回北京去检查一下吧？”

陈毅执拗地摇了摇头。后来，张茜见陈毅的身体日渐消瘦，疼痛不断加剧，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病。周恩来接信后立即同意。

1970年10月21日，在石家庄已经生活了一年的陈毅和张茜回到了北京。由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阻挠，陈毅的病在301医院一直没有得到正常的治疗。

1971年来到了，陈毅的病又发生了变化，住进了医院，经外科主任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明显，由此诊断是“亚急性阑尾炎”，须立即开刀。

1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接到301医院要为陈毅动手术的报告，立即批准了手术，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

晚6点15分，手术开始了。

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原来，腹腔被打开后，医生才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区处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的切口向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及，把已经转移的癌细胞尽力切除干净。因为手术室根本没有做大手术的准备，手术只能做做停停，原先预定半小时的手术，整整做了5个多小时。



手术后，陈毅连续发烧。不久，又因身体受损过度，并发心肌梗塞，经治疗，两周后才慢慢恢复。

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夜晚，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与广场上身穿各民族盛装、载歌载舞的欢庆人群交相辉映。

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正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其他外宾。

一向工作全神贯注的周恩来，今天似乎心绪不宁，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不时地向外张望。他在找谁呢？

“主席，您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周恩来异常激动地招呼着。

“主席，您好！”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地加快脚步走到毛泽东面前，尊敬地行了个军礼。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伸出大手握着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这是陈毅重病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好了，好了！”陈毅高兴地答复。

这几个月，瞧着陈毅的身体逐渐恢复，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脸上都有了笑容，就连大半年来一直忧心忡忡的张茜，也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

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等出逃，摔死在蒙古

温都尔汗荒原上。陈毅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重病人，忘记了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了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去。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

经过这次竭尽生命全力的殊死搏斗，陈毅又病倒了。这一病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1971年12月26日清晨5点钟，大地还在黑夜中沉睡，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陈毅突然睁开了双眼，他握着一一直守护在病床边的女



256



儿珊珊的手，虚弱地说：“我要吃面条。”


在几个孩子中，由于珊珊最小，陈毅也就最疼爱这个宝贝女儿，珊珊也最爱自己的爸爸。听到陈毅要吃面条，珊珊连忙说：“爸爸您等一会儿，我就去端来！”珊珊兴冲冲地走出病房，心里甜滋滋的。这些天爸爸总不能吃东西，今天想吃，恐怕是病情缓解了。但愿苍天有眼哪！

陈毅已多天不能进食了。当珊珊把面条端来喂他时，他吞咽非常缓慢、困难，每吞一口，额头上都冒出豆大的汗珠。但陈毅仍然坚持吃了几根面条。今天，陈毅为什么想起吃面条呢？

直到7点钟，医生进屋查房，这个谜才揭开。当陈毅看到医生时，他费力地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听了陈毅的话，医生和护士们的眼睛潮湿了，站在一旁的珊珊这才恍然大悟，泪如泉涌。陈毅从10月底卧床，到今天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屋子里既没有挂日历，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他又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毛泽东的生日的呢？他是每天在心里算着这个日子啊！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陈毅想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家人，而是毛泽东。如果陈毅对毛泽东没有深厚的感情，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第九章

最后一次南巡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外宾。

★ 年年飘香的东湖桂树，迎来了这位历史巨人在这里最后驻足。黄鹤楼将永远寄托毛泽东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忧国忧民的情感

一抹晚霞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湖面。暮色中，宽阔的长安街上已是华灯齐放，车水马龙。

伴随着电报大楼钟楼发出的浑厚、悠扬的乐曲，夜幕开始悄悄降临。

当喧闹的街头变得车少人稀、渐渐安静下来时，一队轿车从中南海新华门鱼贯而出，转弯向东，急速驶向北京站……

轿车里坐着年逾八旬、耄耋垂暮的毛泽东。这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非凡的政治家和诗人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次外出巡视，也许他已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也许他还想最后一次重温那叱咤风云的年代，所以这次在外停留时间最长。

毛泽东此次外出，是经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后才同意的。此行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湖北省会武汉市。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的交汇外，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因交通便利，地处要冲，故久有“九省通衢”之称。

1918年夏，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第二年冬，他率湖

南驱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再临江城，并在这里同恽代英会晤。

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失败。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里，33岁的毛泽东只身登临位于武昌江岸的黄鹤楼旧址，不由得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挥笔写下《菩萨蛮·黄鹤楼》一词。其中有：“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同年夏，毛泽东离开武汉。此一别就是25年！

然而，江城武汉，尤其是毛泽东词中的黄鹤楼，却与革命家兼诗人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3年春，毛泽东建国后首次来汉。2月18日，他重访阔别了

25个春秋的黄鹤楼旧址。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当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青年，而是开天辟地、创造了一个新中国的亿万人民的领袖。

在从黄鹤楼下山的路上，毛泽东被一小孩认出，转眼间，毛泽东便被成千上万的游人所包围。“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犹如滚滚春雷，震撼整个江岸上空。经身边的工作人员奋力保护，毛泽东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脱身离去。对此，毛泽东一笑置之，道一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看得出，毛泽东心中十分快慰。

此后20多年里，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来武汉停留，总计来汉30余次。仅他在武汉长江游泳的记录，就有18次之多！

1956年6月初，毛泽东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概，在武汉首次畅游长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情，使得诗人“今日得宽余”，挥洒出《水调歌头·游泳》的壮丽词篇。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连续主持召开汉口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留下了许多历史文献。

在毛泽东下榻的武昌东湖，他先后接见过许多国家元首和贵宾，包括朝鲜首相金日成，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依斯博士，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浅沼稻次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数次来汉视察。1966年7月，他

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试图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大演习”。随即，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然而，第二年夏天来汉的毛泽东，却不能左右“天下大乱”的局势，因所谓“七·二〇事件”而被迫离汉飞沪。1971年，毛泽东南巡途中亦首站到武汉，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

1974年7月18日到10月12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来武汉的时间。在这里，毛泽东仍下榻于武昌东湖住所——梅岭一号，为时近3个月之久。



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眼病会诊。

1974年，毛泽东的视力明显下降，看景物愈来愈感觉模糊难辨。由此，一直主张自己动手批阅文件、写各类文字稿的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多年来的工作习惯，由他人代读、代写。

对毛泽东所患眼病的治疗，党中央极为重视。先是周恩来直接抓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待这一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的治疗工作又改由邓小平负责。

8月，一些著名眼科专家汇集武昌。经反复检查分析，确诊毛泽东所患眼疾为“老年性白内障”，并以右目为重，左目为轻。

从医学上讲，白内障是指眼球内透明晶体所发生的混浊现象，导致视力下降乃至失明。此病一般发生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常为双侧，多数是先后发生。白内障属眼病中较棘手的病症之一，尚无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须经其初发、膨胀、成熟和过熟这四个阶段之后，才能视患者情况进行手术治疗。

毛泽东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属最常见的一种，更具体地讲，毛泽东为皮质性老年性白内障。

当得知在武汉的毛泽东双目均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后，刚在医院做过治疗手术的周恩来焦虑万分，寝食难安。他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花镜带给毛泽东，并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

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从中可见一斑。

在武汉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内政局，亲自批准和提出了若干重要决策。其中有的决策对后来党和国家前途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的影响。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透知》。这是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对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同志予以平反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中央《通知》里，列举了林彪一伙蓄意捏造、诬陷贺龙的许



多重要事实，但却回避了江青、康生等人在贺龙问题上的大量见不得人的表现。因此，这个平反文件实际上仍是不彻底的、有限的。

尽管如此，《通知》向全党宣布：“贺龙是一个好同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等于是在不点名地批驳和揭露江青、康生一伙的卑劣行径，为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撑了腰，出了气。

早在1973年底，毛泽东就提出，在整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的问题上，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为此，他当场向在座的军队高级干部作自我批评。而在贺龙问题上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江青等人，不仅从未作过“自我批评”，对毛泽东一再提出的贺龙问题要“翻案”的指示，也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时隔9个月，在武汉的毛泽东见到专程陪外宾来汉的邓小平，即对邓表示：要抓紧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回京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于是，经过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努力，排除了“四人帮”的重重干扰，终于起草出党中央关于为贺龙问题平反的通知稿。在送毛泽东审定前，周恩来抱病细阅了通知及有关附件全文，并提笔将原稿中对贺龙一生的评价“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一句，改为“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

很快，毛泽东便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他还对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提出个人意见，要求增加萧华、刘志坚等人。

第二天，在医院的周恩来立即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又补充提出了几位爱国人士亲属的名字，其中包括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

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前往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亲自主持世人瞩目的盛大国宴，并发表祝酒词。病中的周恩来毫不掩饰对毛泽东批准“解放”贺龙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10月4日，国庆节才过3天，毛泽东又做出一项他在武汉期间的最重要的决策，这就是关于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建议。

自这一年6月周总理病重住院后，国务院总理的人选问题实际上已在毛泽东考虑之中。而早就在窥伺总理宝座的江青一伙，也正因为此暗中进行准备。

作为周恩来的本意，继他之后的新中国的第二任总理人选，自然应是与她共事了几十年的老战友邓小平。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邓小平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全面担负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才亲自安排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参加国内外各种重要活动。

与此同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一再从中作梗，反对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不久前江青竭力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的举动，就是一个明证。

10月4日，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传达他关于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这个消息对江青一伙来说，不啻是五雷轰顶，大难临头。对此，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竟有意封锁毛泽东的指示，没有马上把它传达给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而是直接通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

也正是从这天起，“四人帮”开始秘密抗拒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系列“组阁”活动。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之后不到半个月，那个口口声声自诩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便率先在中央政治局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实质是反对毛泽东的提议。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四年前，毛泽东也是在武汉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由此引发出林彪一伙大闹庐山会议。这一次，又是在关于国务院“组阁”问题上，江青几个人的行径与林彪一伙简直如出一辙！



或许毛泽东早就预料到江青等人会借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生事”。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在这个《通知》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一段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与其说这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一个号召，倒不如说这是洞悉江青一伙作乱本性的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对“四人帮”发出的一次警告。

就在中共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的夜晚，毛泽东乘上南下的专列，离开了他居住86天的江城武汉。

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晓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武汉时的心境。但滚滚不息的长江流水，年年飘香的东湖桂树，尤其是那寄托了青年毛泽东不屈不挠斗志和目睹了老年毛泽东忧国忧民情感的黄鹤楼故地，将永久铭记这位历史巨人在这里留下的深深的足迹。



★ 橘子洲头，万山红遍。八旬高龄的毛泽东重访故地，心中多少感慨！多少眷恋！但他最终却没能实现他再遍韶山的心愿

1974年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徐徐驶入长沙站。

在前一天就得到中央办公厅通知的湖南省党、政、军负责人，早已等候在车站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长沙距武汉仅三百多公里的路程。毛泽东在车上没有休息，因

而略显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走下专列，握住前来问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手说：“我这一次来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在寒暄之后，毛泽东一行坐汽车前往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九所宾馆下榻。

途中，路经湘江岸边时，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湘江之水，凝望秋色如旧的橘子洲头，毛泽东不禁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这是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在这里写下的《沁园春·长沙》一词。50年后，八旬高龄的毛泽东重访故地，心中该有多少感慨呀！

在湘江两岸，在岳麓山周围，到处都留有当年毛泽东活动的“记忆”。可以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毛泽东都十分熟悉，而且注满深情。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40余次来湖南巡视，长沙几乎是他每次来湘的必经之地。比较而言，毛泽东回故乡韶山仅有两次（1959年、1966年），而在长沙停留的次数却要得多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沙交通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从工作需要考虑的。

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住所是一套平房，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在毛泽东的房前，挺立着一棵扶叶繁茂的桂树。当房主

人抵达时，正值桂香袭人、枫林如火的季节。

从1974年10月13日起，至1975年2月初，毛泽东在这里居住达3个多月，共计114天。这是毛泽东此次外出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

毛泽东来长沙后不到一周，便发生了“四人帮”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表面上看，这是江青一伙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一次争吵向毛泽东告“御状”；而实际上这是“四人帮”为掌握四届人大“组阁”大权所蓄谋已久的一个严重步骤：攻倒邓小平，继而扳倒支持邓的周恩来。

但是，“四人帮”彻底央算了。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

一辈革命家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毛泽东一次次旗帜鲜明地肯定、支持周、邓的意见，同时毫不留情地严词揭露、批驳江青一伙。

12月26日，在毛泽东81岁诞辰之际，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革命家在一起促膝长谈，对西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做出最后决策，由此奠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基础。

1975年1月初，毛泽东在长沙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后，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至此，毛泽东、周恩来做出的“长沙决策”得以实现，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遭到彻底破产。四届人大之后，居心叵测的江青曾于1月23日飞赴长沙“看望”毛泽东，试图从毛泽东那里再最后捞取些什么。但毛泽东只和她见一面，除冷遇和责备外，江青长沙之行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返回北京。

这样，在长沙岳麓山下“养病”的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停止他作为卓越政治家的大脑的思维。正是在他不断遏制“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同时，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才得

到巩固和加强，并在后来卓有成效地进行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壮举。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民领袖，毛泽东除时时把握中国的政治“脉搏”外，地也有自己的爱好、习性，也常常流露出内心的喜、怒、哀、乐。面正是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却显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自在”。

在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运动就是早、晚沿着门前的草坪散步。他总是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有时思绪集中时，便止步不前，不发一言。这时，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





1959年，毛主席同韶山学校的师生们在一起。这是一张听得到笑声的照片。

新华社记者摄

人员也远远站住脚，不再高声讲话，以免打断毛泽东的思路。

一次散步时，步履蹒跚的毛泽东由于思考专注，脚下不慎绊了一下，老人家那高大的身躯晃动起来，眼看就要摔倒。幸好，毛泽东身边有一排花架，毛泽东急忙伸手扶住，稳定了身子。吓得脸色惨白的工作人员急步跑上来扶着毛泽东问：“主席，您……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毛泽东望着紧张失色的工作人员，故作轻松地拍了拍腿，“我这双腿……看来是不中用了哟！”说罢，毛泽东手扶花架，坐在了花坛的石阶上。

“我就在这里坐坐，没什么事。你们爱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毛泽东向围拢过来的工作人员挥了挥手。

当然，大家服从地散开了。但仍有两三个人在院子里“守候”老人家。毛泽东环顾一下周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极不情愿他人代劳和保护自己的毛泽东，毕竟这时已无法抗拒自身所处处体现的自然法则。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望着眼前这些曾一次次伴随自己旅居的桂树、樟木、枫林，毛泽东不由得从心底默诵出庾信《枯树赋》中的句子。

在长沙，毛泽东还曾驱车巡视长沙市容，以回忆、体味当年读书和开展革命斗争时的情景。酷爱游泳的毛泽东，固然已无法再下

到湘江“中流击水”，但他却连续5次秘密到市内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游时30分钟，用故乡之水舒展筋骨。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游泳。

1975年2月初，毛泽东从来自北京的医疗组的诊断报告中，得知了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的消息。内心极度伤感的毛泽东吃力地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机要秘书按毛泽东的嘱咐，向中南海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和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达了在长沙的毛泽东的问候。

当毛泽东问候的电话记录送到305医院周恩来的病榻前时，深



解毛泽东心态和苦楚的周恩来不由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抱病起身，在病房致书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

周恩来的信，成为毛泽东在长沙收到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结束了他在长沙岳麓山下的休养。在向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九所宾馆工作人员一一道别后，他乘上东进的专列，朝南昌方向驶去。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故土。至于离长沙不远的故乡韶山，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本打算再去看看，以拜访那些日夜思念他的父老乡亲，并在父母墓前再表一回儿子的敬意。为此，韶山管理局和滴水洞别墅都已敬好了接待的准备。

然而，毛泽东最终没有再回到韶山。他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大家已经很辛苦了。‘客敬主人安’，我走了以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讲得周围的人不禁热泪盈眶。

应该说，毛泽东自己并没有认为这次来湖南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返回故土。否则，从常理上讲，他无论如何也要回韶山一趟。过去，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将在故乡韶山“养老送终”。

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病危时，他尤其怀念家乡，思归故里。7月，毛泽东的专机曾多次在北京——长沙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这时的毛泽东已不能再坐专列长途旅行）。

同年8月，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又几次提出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为此，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后，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最后的请求。

9月8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长沙打电话给滴水洞宾馆负责人：“根据毛主席的愿望，中央决定安排毛主席于9月15日回韶山，计划在滴水洞住一段时间。请你们抓紧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但是，就在当天夜晚11时，滴水洞宾馆又接到紧急通知：“接待毛主席的准备工作暂停……”

一生眷恋乡土的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再返故乡的心愿。



★ 唐由之以他精湛的医术，让历史巨人重见光明。见到唐大夫，毛泽东吟诗相迎：“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毛泽东自1975年2月3日离开长沙后，当天便东进300公里，到达江西省会南昌市。

在南昌的3天里，毛泽东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2月5日）。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的成员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和粟裕等11人。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仍为新的军委常委会的主持人。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当时至关重要的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上，毛泽东仍将信任票投给了叶剑英、邓小平等多数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而王洪文、张春桥二人不仅是极少数，而且没有实职或实权，不过徒有虚名而已。难怪王洪文曾对此慨叹：“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即‘四人帮’）手里……”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个举措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在他和周恩来都年迈多病、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把军权交给何人，是有关

国家命运的大事，证明毛泽东此举具有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十分巧合的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前途和命运的这个关键性决定，恰恰是在人民军队的诞生地——1927年“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做出的。

2月5日，毛泽东从南昌启程向东，开始他下一段的行程。在经鹰潭、上饶、金华等地后，毛泽东将抵达浙江省会杭州——他此次“出巡”的最后一站。

建国后，杭州却成了毛泽东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从1953年12月毛泽东首次来杭开始，他几乎年年南下，回回到杭，有时一年内要





毛泽东与眼科大王唐由之（左三）合影。

272

来杭州几次。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毛泽东共计来杭40余次，是他外出所到次数最多的一个省会。为此，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起初，毛泽东来杭州住在紧靠西湖的丁家山下的刘庄。这里原是晚清举人刘学询的私人庄园，故名“刘庄”。园内的建筑设计、室内摆设和庭院风格等，都隐隐透出一种闽广格调。当年的刘庄，曾享有“西湖第一名园”之誉。但因年久失修，古色古香的刘庄到建国初期已变得荒芜、破旧。

后来，根据毛泽东提议，工作人员将这里进行了一番“改造”：

在院内及后面的丁家山上垦荒种植，开辟出一块块茶林、果园、菜地。这样，全无生机的刘庄才开始变了样。每年春天，园里山上一片桃红梨白，花香沁脾；每临秋季，这里又一派收获景象，到处果实累累，招人喜爱。

然而，毛泽东在一次大发脾气之后，断然“告别”了这所充满生机的庭院。

那是1961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此前，毛泽东曾几次来杭州居住。为了表示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决心，在这繁花似锦的山庄里，他竟没有沾过一次肉腥。1961年2月，当毛泽东再次来杭时，有关部门已将他住的“一号楼”进行了翻修。其工程在今天看来并不过分，不过是依照原来建筑的式样做了部分修饰，换去了多年的朽木破瓦，新漆了门窗雕栏。根据毛泽东工作、生活需要，在主要厅室添置了一批新的家具设备，搞了较多的内装修，仅此而已。但不料这些“举动”已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内在的“标准”，引起他一顿雷霆震怒。

据说，毛泽东当天进到宅宅“一号楼”，在转了一圈后，脸色变得铁青，目光吓人。他深思良久，猛地大吼一声：“败家子！”回头便对机要秘书叶子龙一挥手，“我们走，不住这里了！”说完，大步跨出楼厅。从此，刘庄再难见毛泽东的身影。

毛泽东离开刘庄后，便搬进了他在杭州的另一处住所——汪庄。

这是一座极普通的宅院，位于西湖南岸，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住处仍称“一号楼”。

在杭州，毛泽东主持起草或审定过难以数计的重要文件、文章等。如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稿，就是他在杭州领导修订的。这类文稿审阅工作，一直伴随到毛泽东最后一次来杭。

在1966年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1968年除外），毛泽东仍照例每年南下，每次都不忘来杭停留。在此期间，他曾借阅过《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古文辞类纂》和《续古文辞类纂》等古籍以及《观堂集林》、《观堂别集》。惟有1971年9月，是毛



泽东来杭未借任何书籍的一次“特殊例外”。当时，正值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因风云骤变，形势吃紧，毛泽东仅在杭州住了几天就离开了。

如果说，武汉的长江为毛泽东创下了他在建国后最多的游泳记录，那么，西湖周围的群山，则留下了毛泽东难以统计的攀缘的足迹。

从2月8日这天起，直到4月13日止，毛泽东在杭州共计留住两个月零五天。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继续检查、诊断眼疾。毛泽东晚年身体疾病比较多，其中眼睛的疾病最令他苦恼。

一生靠眼睛读书写文章、靠眼睛洞察秋毫、高瞻远瞩的人，如今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朦胧的混浊，这对于一个领袖，而且是一个生性敏锐、充满激情的领袖来说，该是多么地痛苦。

到了杭州，毛泽东的眼睛基本失明，因为是白内障，还有手术的可能，然而这个手术的对象不是一般人，所以手术前经过专家们反复研究病历才确定了手术方案。主刀的医生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大夫。

因为春节放假，唐由之还在家里休假。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到他家里请他作好准备，第二天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在飞机上，唐由

之根据太阳的方向，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他看到雷峰塔的旧址。作为杭州人的他，知道他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杭州，可是到杭州来做什么呢？

这时飞机上有人对他们几位医学专家说，这次未是给毛泽东看病，毛泽东第二天要接见大家。人家一听，简直惊呆了，个个顿时激动万分。

第二天，唐由之跟着汪东兴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沙发里，头发花白，眼睛没有什么神采，穿着一件旧浴衣，浴衣上打着补丁……他还在疑惑：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吗？外面不是



一直说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吗？

他不禁想起1974年底的几次医学专家会诊，那时他们专家得到的只是病历，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定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果然，他的判断没有错，这个病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已经82岁了，还是努力要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大家。那一天毛泽东正患感冒，唐由之忙抢步上前说：“不敢当！不敢当！”但毛泽东还是执意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毛泽东同张晓楼大夫握手时，诙谐地说：“看来你的楼盖不大了，永远是小楼！”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于是专家们开始为毛泽东检查，诊断为白内障。

“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这回的任务要落在我头上了。”唐由之回忆说，“果然如此。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后来汪东兴叫我去上海准备医疗器械。”

唐由之发现毛泽东的房间里除了彩电，其它物品全是国货，连腕上的手表都是一块老“上海”牌。于是，他准备的医疗器械也全是国货。

准备好医疗器械，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

医学专家们就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七人医疗小组，由唐由之负责。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做出的。为了此事，中央政治局还开

过许多次会议。那时周恩来已经患了膀胱癌，住在305医院，定下来后，他把唐由之叫到医院，详细地询问情况。“我切身感到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忘我的爱。周总理还要我从上海专门带回一副最好的人体骨架，他要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唐由之深情地回忆着。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一间书房腾出来辟为“阳光屋”手术室，进行消毒、准备。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毛泽东也开始为期十天的术前准备。一次毛泽东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觉特别好，马上问谁来了，服



务员告诉他是唐由之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他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白菜、菠菜、白切肉，一盘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唐由之又一次去看毛泽东吃饭，毛泽东高兴了，说：“唐由之又来了？快，坐下一起吃！”

十天过去，要做手术了。毛泽东作息不分昼夜，累了就睡，醒来就工作。晚上8点，毛泽东一觉醒来，唐由之进去请示毛泽东是否准备好了手术，他一挥手说：“做！”于是大家忙起来。有人去通知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当时他们都在窗外看着。

手术室就设在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住宅里。手术前，毛泽东叫秘书打开留声机，他要听岳飞的《满江红》，这是由北方昆剧院著名演员演唱的词曲。

岳飞这首词是毛泽东平时最喜欢的诗词之一，它词韵工整，琅琅上口，充满了爱国英雄者的悲壮情怀和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

这次手术，毛泽东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明白，自己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即使是小手术，也可能引起意外事故……音乐声起，在场的人立即明白了主席的用意，他用这首词曲稳定自己和医生的情绪，同时也用这首激昂的旋律激励自己勇敢地面对死神的挑战。

他从居室走向隔壁的临时手术室，这首歌正好唱到高昂处，毛泽东用手有力地握紧搀扶他的工作人员的手，好像表达了他不可战

胜的信心和力量。毛泽东平静地躺上了手术台，平静地等待医生的手术。悠扬的音乐在手术台前轻轻地回荡，空气开始缓缓流淌，像一条平静的河，把紧张的波浪慢慢熨平，直到手术进行了一半，工作人员才轻轻关掉机子。

手术很顺利地完成了，唐由之出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成功了，太好了！下一步一定要注意护理，不要有并发症。”

那天晚上唐由之就睡在毛泽东的外间。毛泽东垂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去。毛泽东问：“谁来了？”服务员说是唐大夫，毛泽东立即吟诗相迎：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原来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毛泽东幽默地借用了“花开花落两由之”的诗句，来融洽他与医护人员的感情，缩短与他们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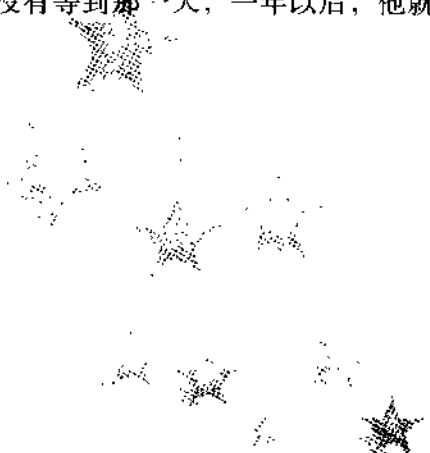
五天后，毛泽东的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了。那天，毛泽东别提多么兴奋，他叫工作人员扶他出去，他要看看中南海的湖水，看看广阔的天空。那天，医务人员都流下了眼泪……这蜿蜒而下的泪水，像无声的音乐，随着敬爱领袖飞向蓝天的视线，无声地谱写在大地上。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后，唐由之再一次去主席那里探视。这一次唐由之腼腆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主席吟诵的诗，他不懂。想请主席写在纸上。

毛泽东听后，拿起笔，亲自把诗默写在纸上。没想到唐由之“得寸进尺”，又请求主席将名字写上，主席欣然应允，并签下自己的名字。毛泽东还满足了医疗组医务人员的愿望，和他们一起合影。未

了，毛泽东说：“再请你来，为我做右眼的手术。”

可惜毛泽东没有等到那一天，一年以后，他就逝世了。





第十章

泾渭分明的较量



毛泽东在餐桌边一张一弛，有礼有节，既不怠慢处处显示大国霸权主义的赫鲁晓夫，也不表现对他的热情。这种餐桌边的斗智，使赫鲁晓夫霸权野心收敛了许多。

★ 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毛泽东坦率地对他说，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去走。听到这样的允诺，赫鲁晓夫胃口大开，不少腊肉和火腿进了他的肚子

1954年，周恩来从日内瓦回国后，过了两个月就是我国五周年国庆节。这年我国在国内、国际大搞和平运动，因而国庆节洋溢着庆和平、祝胜利、颂团结、赞友谊的和平安定的欢乐气氛。在车站、机场、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摆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外宾看到中国团结、和平、安定、繁荣昌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前途也增加了希望和信心。

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于9月29日到达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举动。当时参加中国国庆的还有许多国家的元首，但毛泽东都没有去机场迎接。可见在中苏关系正常时，我国领导人还是非常珍惜和苏联老大哥的友情的。

对于赫鲁晓夫，广大的青年读者可能对他不是太了解，在这里有必要对他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1岁，出生在1894年。

他的出身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赫鲁晓夫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他信仰共产主义比毛泽东要早，1918年，他就

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此人很有点工农干部的味道，说话有些粗鲁，办事也不思前想后，说干就干。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做出一些有失身份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工农干部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

按照“台阶论”的说法，他倒是一级一级干上来的，不是坐火箭上来的。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也引以为荣，经常和别人说，我当州委书记时如何如何。

在斯大林时期，他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他对斯大林的吹捧也是事实，我们当年在批判他时的那些话虽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十周年的生日。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中外宾客，毛泽东和胡志明、赫鲁晓夫同坐一桌。

有点过头，但大致还是那么回事。

斯大林的去世，给他提供了一个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机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不到两年，他就被赫鲁晓夫搞掉。这其中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赫鲁晓夫还是有些手腕的。

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这当然是后话。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主要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还要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

这是他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事情。

从当年的报纸杂志上，我们看到了这次会谈的成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
2. 《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3. 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
4. 关于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4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这四个公司分别是在新疆境内开采有色及稀有和贵重金属的公司，在新疆境内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在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的公司和民航公司。这些公司中的苏方股份由中方用出口货物在数年内还清。
5. 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6. 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7. 中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8. 苏联为中国提供 5.2 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

9. 帮助中国新建 15 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 141 项企业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应该说，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访华，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的。

在中苏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直接对话。据有些当事人回忆，他们的对话也颇有意思。

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左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

毛泽东说：“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两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以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减去了一半力量。总之，形势是好了，对我们是有利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

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有 20 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强大，从此战争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

他们的看法自然有些差异。

赫鲁晓夫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点艺术性，他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双方的专家天天都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





毛泽东主席对赫鲁晓夫敬酒，脸上却十分严肃。

问题，事情能办通。”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停顿了一下，说：“我们对太阳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不想搞这项工业。”

这太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翻译把这话全部翻译出来后，他呆了好一会儿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

看看毛泽东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又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毛泽东同志，你不知道哇，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

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不说话，中国方面其他人也不说话。

赫鲁晓夫又说：“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电全部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但你们如果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听说，中国人民在解放以后，生活上有了保障，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经常想，你们这么多人口，如果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伸手向国家要，我看很难应付得了。然而不管怎样，这的确是应该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摆在首要位置加以妥善解决，那日子是过不好的，甚至是过不下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

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吗？”

听毛泽东这样说，赫鲁晓夫很高兴，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举得很高很高，说：“好！好！”

毛泽东很坦率地对赫鲁晓夫说：“你第一次到中国来，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去走。特别是到我们的南方，那里是另一种情景。”

赫鲁晓夫更加高兴了，他说：“你们这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哪里都想去，但这次只能到沿海的南方北方走走。”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拿起了一块腊肉，正往口里填，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到哪里都可以，就像在你自己的家里一样。我这个人喜



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去活动，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也不给你作什么特殊安排，随你的便。”

赫鲁晓夫胃口大开，不少腊肉和火腿进了他的肚子。

赫鲁晓夫这次来华，先在北京的街头看了古城的风貌，又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江边漫步；然后他又在杭州西湖品尝了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到广州吃了中国的另一菜系——粤菜。

途经长江时，他也领略了中国第一江“江涛拍岸”的情景；到旅顺时，也看到了与黑海不同的中国内海。

这是中苏关系最高潮的日子。

★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面前树立赫鲁晓夫的威信，给了他不少面子。但毛泽东话不说绝，这为后来他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踏上苏联的土地。

上一次他来这里，是1949年，是来见斯大林，这一次克里姆林宫已经易主，他就是毛泽东并不陌生的赫鲁晓夫。

这次访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二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欧亚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

党代表会议和世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是有不少想法的，但他不肯外露；在飞机上，他还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开玩笑。

他说：“你是哲学家，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说：“我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是老朋友，主席给我出题目考试，我争取及格。”

毛泽东笑笑说：“我们刚才在机场，现在在天上，再过一会儿我们又落到地上，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呢？”



1960年12月9日，刘少奇从苏联访问回国，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尤金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出这么一个题目，他眨眨眼，说：“这个问题我可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他，好像在说你想想看。

尤金看看毛泽东，又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摇摇头。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这位苏联哲学家被他考住了。

他说：“我来回答，请你这哲学家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上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落到地上就是否定之否定……”

“太妙了！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讲哲学！”

尤金不知道，毛泽东早就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走出来，要让广大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要打破哲学的神秘。

当毛泽东坐的专机在莫斯科降落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机场等候了。毛泽东从机舱门口出现时，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睛。他看到了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赫鲁晓夫正在朝他招手。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毛泽东对这一套欢迎的方式很不“感冒”。上一次他访问苏联时，就曾经对斯大林搞的那一套欢迎仪式表示了很不赞同的态度。那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宴会，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开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多才散。回到住地，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为什么要搞这么长。吃也没什么好吃的，看也没什么好看的，鼓了一晚上掌，手都鼓疼了。我们回去不学这个。吃

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

汪东兴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唉，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每人一份，都要服务员送到每位面前，他们的服务员真不少，太辛苦了。”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完成那一套在他看来是繁琐的仪式，然后上了汽车。

赫鲁晓夫和他同坐一辆车。在车上，毛泽东又和赫鲁晓夫说起仪式的事情来。

“赫鲁晓夫同志，我不是和你们打过招呼吗？请你们不要搞什么



仪式，不要来这么多的人接。你们怎么还是搞得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有他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应该的必需的，是不应该也不能简化的。

他说：“我们是收到过尤金的报告，说你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认真地讨论过，我们的同志都认为不应该那样。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的。你这样的同志来了，我们是不能简化的。”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得体，而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谢谢你们们的盛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

毛泽东这次来苏联，赫鲁晓夫还是比较热情的，毛泽东也对他比较热情，但在一些问题上，是没有同意他的意见的，有些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

毛泽东在苏联发表一些精彩的言论，有的言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既讲了赫鲁晓夫不少好话，也对他提出了一些批评。

毛泽东说他的好话是真诚的，批评他也是真诚的。

到莫斯科之后，毛泽东在和兄弟党的领导人接触时，曾多次做他们的工作，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

无论是在国人面前还是在“洋人”面前，毛泽东讲起话来总是那么风趣，那么有味道。

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

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





1964年11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首都机场
欢迎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扫了扫众人，他喝了一口茶，说：“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他看了一眼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说：“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

胡志明正在朝毛泽东点头，意思是说：我当头，绝对不可能。

“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此后毛泽东就大讲苏联的好话，说苏联有如何丰富的经验，如何强大的实力……

即使毛泽东这么说，还是有些党的代表在摇头。

毛泽东又说：“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可能被人家吞掉。”

说到这里，他似乎觉得有点绝对，又补充一句，说：“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

不要小看毛泽东这几句话，这为后来他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毛泽东又说：“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

坐在-一边的赫鲁晓夫自然很得意。他侧过身子听毛泽东继续往下讲。

毛泽东似乎很会把握人们的心理，说了一通苏联的好话：“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500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

于500公斤。搞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5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

赫鲁晓夫倒是还有几分清醒，说：“大家共同努力，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还在将他的军，说：“大家共同努力也对，主要由你努力。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了。”



毛泽东在这里引用的“免于恐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的国家有形成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毛泽东引用罗斯福的话，还说要“免于恐怖”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要有威慑力。他说：“要免于恐怖，要有5万公斤，或者还有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心里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变，还会进步。”

有人说，毛泽东的此次苏联之行，不仅说了不少赫鲁晓夫的好话，而且讲赫鲁晓夫应该注意的事情。这话自然有些道理。毛泽东

在莫斯科期间，为这次会议的宣言做了不少的工作。

11月16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

“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概还觉得想像力不够丰富，又把列宁也抬了出来。他说：“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



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无非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

毛泽东的这次苏联之行，还发表了一个著名论断，叫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当时世界出现了几个重大事件。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等西方大国不得不另眼相看。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不敢贸然出兵干涉。

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号称世界最强大的美军及其盟军打得坐在了谈判桌上，而且是在二八线的板门店。

越南战争，法国也被迫停火。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作被胡志明同志打得呜呼哀哉。

还有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而美国连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去。

那时候，社会主义的确是欣欣向荣，世界形势的确是东风压倒

西风。

但是社会主义阵营里出现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南斯拉夫等国家对苏联的指挥不买账，有几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很有意见。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对苏联也是很有意见的，但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做别人的工作。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素质。

他那时的确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啊！

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又一次讲到了团结问题。

他这次从更高的角度谈这个事情。



他很诚恳地说：“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们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经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在论述了团结问题的辩证法之后，也讲了一些苏联党内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是有不少局限性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努力，这次会议是很难开成功的。

★ 这次赫鲁晓夫访华，没有进宾馆，就直奔中南海，这在外交事务中是罕见的。会谈中，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所震怒，因为他把中国的主权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如果说毛泽东到苏联还做了不少的工作，树立苏联的威信，树立赫鲁晓夫的威信，那么，1958年赫鲁晓夫来华则完全相反，他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在迎接客人的机场上，毛主席与周总理认真地对手表的时间。



这涉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主权问题。

赫鲁晓夫这次来北京，是事先有过信号的。

传递信号的人还是苏联大使尤金。

在一次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他又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的意见。毛泽东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搞？你们是什么意思？”尤金还解释，毛泽东更加不高兴，说：“我不要听到这个事情。”

毛泽东还说：“这个问题，要赫鲁晓夫来谈。”

于是，在北京酷热的7月，赫鲁晓夫要来北京。

中国方面同意他来。

那天是7月31日，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一架“图-104”式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

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机场的候机室已经等候了很久。

他们对这位苏联来客是不能怠慢的。

当飞机的引擎停止转动的时候，赫鲁晓夫出现在机舱门口。

虽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出现在这里，但没有外交方面的最高礼遇，没有鲜红的地毯，也没有欢迎的人群。

赫鲁晓夫自然有一点感觉。

但他还是挥起了手，向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意。

毛泽东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当然还有一点面方礼节，就是拥抱。在机场，他们自然会说很多的好话。

在场的中国同志记得，他们谈到了中国的大跃进。

毋庸讳言，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此时都还在发热的过程中、认为中国的形势很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怕粮食太多了没法处理。”

赫鲁晓夫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复杂表情，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好办，你们粮食多了，可以给我们，我们有办法。”

对中国的大跃进他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并且多次向中国方面表

示过。

也许在这点上，他们是比中国领导人冷静一些。

那对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发热，泼一两盆冷水是不起作用的。经过一阵必要的寒暄之后，他们坐车直奔中南海。

说来也很有趣，到了北京以后，没有进宾馆，就直奔中南海举行会谈，这在外交事务中也是不常见的。

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谈的内容有详细的记述。几十年以后，记忆犹新。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考虑，但说不清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尤金没讲清楚。”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人的意思。然后说自己的想法。大意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降落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舰队现在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云云。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十几分钟，加上我的翻译，就讲了有半个钟点。毛泽东神色肃穆地静听。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听得仔细，越讲情绪越高，有些得意。

突然，毛泽东做了个果断而简洁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您别忙，我还要继续讲，继续讲下去……”他强作笑脸，有些不自

然，“尤金告诉我了，您很火。尤金没有讲清楚，我们只是有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绕山绕水，便语锋犀利地直戳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支支吾吾，说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共同嘛，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问题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一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尽快能建起来。我们的舰队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愤然立起身，指着赫鲁晓夫鼻子声色俱厉：“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我见此情景，在译语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地表达毛主席的情感，使赫鲁晓夫充分感到问题的严肃性。

赫鲁晓夫脸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始终处于答辩地位，仍然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呢？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中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用俄语从旁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是动火了！”

赫鲁晓夫耸耸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了两下，锋芒稍纵即逝，摊开了两只胖而小的手，带着鼻音嘟囔着：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的这个意思不对。”毛泽东重新坐下，他至今还没有附和过赫鲁晓夫一句。去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注意选择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谈谈。这次不然，抓住要害不放，“你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皱起了眉头，提高一些音调：“我们只不过来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解。”说着，

赫鲁晓夫愤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商量了，不好办了。”

毛泽东去年对哥穆尔卡说过：“苏联有多少力量？你
我有多少力量？”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还只处于沿海
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
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
题！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
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埋怨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
场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
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
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挥开，“我
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毛泽东同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正在互相合作，
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
夫微露愤懑，他在不高兴和愤怒时，眼睛便眯成一条线，目
光像被聚光之后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
他的目的达到了：弄清了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
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涉及主权的大事是不行的！

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
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足够坚强，他突然一笑，“为了合
情理，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
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
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
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经过
激烈的争论，结果赫鲁晓夫表示：“你们不理解，我们也不
提了。”



“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囔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帮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在新疆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 and 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这次会谈是一下飞机就开始的，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的主权问题毕生都格外珍重。

有了李越然的这段回忆，我们对赫鲁晓夫这次来华便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但有意思的是，作为当事人的赫鲁晓夫对他这次来华也有一段回忆，他的回忆和李越然的回忆却是何等地相似。这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太深刻了。



★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通过与赫鲁晓夫的交往，毛泽东发现了赫鲁晓夫身上的人格缺陷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透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关系，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则早就是有些眉目的。

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后来集中反映在对待斯大林等问题上，这里面既有他们性格上的因素，也有非性格的因素。

分歧并不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是很多时间积累起来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分歧集中起来，这样读者就会更加一目了然。

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赫鲁晓夫却认为在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根本就谈不来，毛泽东也就不想再谈这个问题，就叫邓小平去和他们谈。

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这是十足的赫鲁晓夫性格。

“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毛泽东就是爱唱个反调。

赫鲁晓夫说：“我们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攻击，我们都要立即还击。”

毛泽东又不高兴了，他说：“这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了没有。”

在战争问题上的许多观点，他们也是有着很大的分歧。赫鲁晓夫认为现代战争可以毁灭人类，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说：古时候

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打起来死的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更使赫鲁晓夫不能同意的是，毛泽东居然认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问题，是他们分歧乃至争论的主要问题。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一切反常活动，早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特别是他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作了那个所谓“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更加认清赫鲁晓夫这个人。

据有关人士讲，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很久很久没有入睡，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一连度过了好几个



不眠之夜……

这个报告使毛泽东震惊了。

这个报告使毛泽东进一步看清了赫鲁晓夫这个人。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就明确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毛泽东所说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

人们还记得，第一个称斯大林为“天才领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赫鲁晓夫。

人们也知道，称颂斯大林为“人民的慈父”，并且称斯大林为自己“生身的父亲”的不是别人，也是赫鲁晓夫。

人们不会忘记，他曾经在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场合，吹捧斯大林，他说：“是您，斯大林同志，在全世界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前挺进。我们向您保证：更紧密地把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

而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他后来的言论中，他又把斯大林称

为“迫害狂”、“虐待狂”、杀害革命同志的“暴君”、一个不学无术的“白痴”……

从人格上讲，赫鲁晓夫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人民熟悉的那位留了小胡子的米高扬来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对斯大林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

斯大林的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



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讲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不久，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一篇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苏联出现的问题，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也进行了十分中肯的批评。

1956年4月2日凌晨，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初稿上改完了最后一个字，抬头看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4点了。

本来可以上床睡觉了，他又坐起来，提笔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少奇、小平同志：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请看过清样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于4日由毛泽东亲自定稿。这足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

在档案馆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修改的这份原稿，那上面真可谓密密麻麻，毛泽东苍劲有力的笔迹是大段大段出现的。

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西方的报刊大肆宣传，说中苏之间的论战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此后，无论是毛泽东去莫斯科，还是赫鲁晓夫来北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和毛泽东讲了不少斯大林的问题。

毛泽东对他的这些说法很不以为然，很认真地对他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斯大林也一样，你们看看吧，任何人都有两点，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你们这样不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专攻他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全盘否定，这不公正。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按你们这种办法，任何人都可以否定，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长处是主要的，应当二八开。”

赫鲁晓夫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斯大林是怎么一个人，你们不说我们也清楚。”他又讲了斯大林的一大堆坏话。

他越说越多，毛泽东不得不连连摆手，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不要再说了，不讲二八开了，三七开吧。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有世界影响，为世人所注目，不能全盘否定。你全盘否定，不符合实际，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你在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怎么传到美国、英国、法国去了？”

对这个问题，赫鲁晓夫没有回答，他似乎认为，这个问题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个“秘密报告”为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提供了炮弹。

赫鲁晓夫却说：“毛泽东同志，这不要紧，我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说那是他们造谣，我根本就没有作过那么一个报告。”

毛泽东觉得这太可笑了，这怎么可以呢？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怎么能采取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呢？他很有几分严肃地对赫鲁晓夫说：“你的‘秘密报告’，我的手里也有，怎么能不承认？你这是给人家提供炮弹！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

当然，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讲过一点赫鲁晓夫的好话。这些好话，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比如毛泽东说过，赫鲁



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他敢去碰斯大林。

毛泽东还说过，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对头，可是揭了盖子，搬开了压在人们头上的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

有了这样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调和吗？

他们还能是同志吗？

★ 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在餐桌访，杜修贤抓拍到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富有戏剧性的照片。其实他们在谈判桌上的交锋要比餐桌上的表现更精彩

人们都说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这不能说没有道理。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自己也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出了洲际导弹，认为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摩擦”。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要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是刚刚参加了和美国首脑的戴维营会谈之后赶赴

中国的。这也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

杜修贤一直没有听说赫鲁晓夫要来参加庆祝活动，到了9月27日，苏联方面参加庆祝活动代表也已经抵达北京。可是到了30日，国庆节前一天，新华社突然通知杜修贤等记者去机场拍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的新闻照片。

他们到机场后，看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已经站在跑道边了，可是许久也没有看见专机降落下来。毛泽东赶紧问周恩来时间，他们两位领导人还极认真地对了手表的时间。杜修贤机敏地抓拍了他们对表的照片，现在看来，这真是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毛泽东在餐桌上，谈得兴奋时，开怀大笑。

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这次毛泽东还是将赫鲁晓夫安排在他身边就座，但是毛泽东的表情已经不是五年前热情、诚恳的表情，他时不时地沉下脸。但整个宴席上他还是保持大国领导人的风度，时而给赫鲁晓夫夹菜，时而嘲笑他一番，时而又严肃地提醒他几句……餐桌旁的毛泽东表情在戏剧性地变化着，杜修贤在一边仔细地抓拍了不少他和赫鲁晓夫边举杯边斗智的精彩镜头。

其实他们在谈判桌上的交锋要比餐桌上的表演精彩得多。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

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对他的谈话很不以为然，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嘛！”

赫鲁晓夫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的问题的。”

赫鲁晓夫在这次访华期间，口气已经不一样了，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还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首先提出的是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

这两名美国人，是当时美国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时抓获的。

这叫人想到赫鲁晓夫是否和美国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来为美国人说情的。

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他一点都不含糊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一句话把赫鲁晓夫堵在了门外。

赫鲁晓夫还用了很多的口舌，说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尼赫鲁

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

参加会谈的周恩来、陈毅、林彪等人都先后发了言，也都和赫鲁晓夫吵了架。

这一点也不夸张，的确是在吵架。

当时作为翻译的李越然在场，他对那时的情景有很深刻的记忆：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



周恩来反驳他，指出他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兄弟国家平等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企图赖账。

我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悄悄报告说：“主席，当时他的话都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吗？”

“可以。”毛泽东点点头。

我站起来用俄语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是说过的，当时的翻译就是我。”我将当时的场景、参加人及每人讲话的内容说了一遍。

赫鲁晓夫喃喃道：“记不清了，记不清……”突然话又一转，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吾吾，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了，冲着陈毅喊道：“如果比军

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无礼……”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是不公平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这赖呀，没因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上。

结尼赫普，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像这样的会谈实在是不多见的。

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之后，赫鲁晓夫决定撤走所有的苏联专家，撕毁了所有的合同……

紧接着就是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

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这次会议上散发一封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面前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不能不激怒中国共产党人。

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26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又和赫鲁晓夫做过许多次的交锋。

在对待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赫鲁晓夫说：“这个党很不像话：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还反过来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邓小平说：“你们不是说援助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吗？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你的援助不应该是控制和干涉。”

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又在指责中国，说：“你们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地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可以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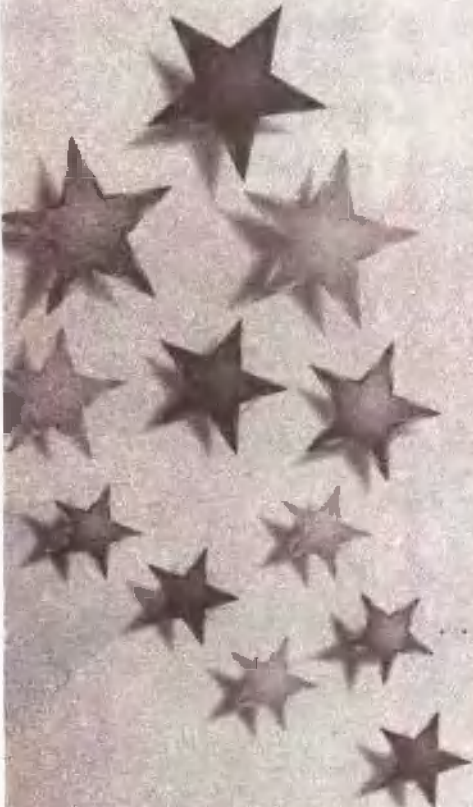
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到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此后毛泽东又派邓小平去过一次苏联，邓小平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方针和路线，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到了70年代，毛泽东还说，小平这个人，很硬，不向苏联人屈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靠自己的努力，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说来也巧，就是在中国西部上空出现蘑菇云的时候，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交出了一份“辞职申请书”——有人说这份申请书是被迫写出来的，也有人说足出于赫鲁晓夫的自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终于下台了。





第十一章
同志加兄弟



毛泽东和越南老朋友胡志明在一起。



1965年，首都各界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支持越南抗美斗争。

314



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同演员们合影。

★ “患难见真情”，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友谊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他们之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相互吸引，才使他们的友谊是那样牢不可破。

一位漫画家讲过，画政治家的肖像，毛泽东和胡志明放在一起画最好把握——一个有很长的胡子，一个没有胡子；一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另一个清瘦干练，线条分明……

这是两位世界知名的政治家。

他们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良好关系，被人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楷模。

在有关重大的政治决策上，他们互相通气，开诚布公，互谅互让。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相互关心——毛泽东曾经劝说胡志明不要搞“独身主义”，曾经安排胡志明到中国的黄山、西湖去休养度假。胡志明睡不好觉，长期失眠，毛泽东又派医生去教他学习中国的太极拳；甚至连胡志明喜欢抽的“大中华”牌香烟，毛泽东也要求有关部门给他长期提供……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与中国和越南两国、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两党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但又不仅仅是一种同志关系，他们之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相互吸引，才使他们的关系是那样牢不可破。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

胡志明是一位越南农民的儿子，他出生在亚热带的山区。

毛泽东没有正式上过大学，胡志明也没有正式上过科班的大学。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是一个教师，他确实当过老师，教出了不少的学生。

胡志明也当过小学的教师，后来还当了小学的校长。据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校长。

只是后来，胡志明出国了，到过许多国家，而毛泽东没有出国，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奋斗了好几十年。

在一定程度上说，胡志明的经历比毛泽东的经历更为复杂和曲折，他当过厨子，做过海员。在英国和法国当过最下层的清洁工、司炉工。

胡志明的政治生涯应该从1919年算起，那时他在法国向凡尔赛和会提出八点申请——要求越南人享有同法国人一样的权利。这次申请虽然没有成功，却使胡志明在越南侨民中有了很高的声誉。

说来很有意思，胡志明加入的共产党是法国共产党，他还在法国办过《流浪者》杂志，后来他抗击的也是法国侵略者。

胡志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因为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次很激烈的讲话，抨击法国共产党反殖民主义不力。此后，他就到了中国，在广州成立了一个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那个时期的胡志明恰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他们的组织也很有活力，要不是蒋介石清共，他们的活动说不定就能成气候。

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了他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探索，他们走的都是武装斗争的道路。

胡志明在苏联呆了一些时候，成为共产国际在东南亚的代表，出现在了暹罗（今泰国）。1930年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成立了印度支





那共产党，并且发动了武装起义。在鲜血和烈火中，他们的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他被反动派判处了“死刑”。

他逃到中国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毛泽东也在艰难地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没有机会见面，更没有机会切磋一下关于革命，关于人生等问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毛泽东经过长征以后，到达陕北，在延安站住了脚。关于这次见面，我们没有看到有关的权威材料。会谈的内容，肯定涉及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涉及反对法西斯……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和军队，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惊



毛泽东会见越南客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天地泣鬼神的活剧的时候，胡志明也和他的战友们在越南的丛林里开始了坚苦卓绝的斗争。

1942年8月的一个清晨，胡志明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越南高平的一个镇子）出发，来到了中国广西的靖西县，他想从这里到重庆去找周恩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一名警卫向中国的警察告了密，胡志明被逮捕了。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耳朵里。为了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想了不少办法。他找到了后来成为中国有名历史学家的翦伯赞，要他通过有关渠道把胡志明救出来。翦伯赞找





毛泽东与越南领导人会谈。

到了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又找到了李宗仁，通过他们去和蒋介石说。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才答应给张发奎发电报，要他把胡志明放出来。

胡志明带着他的《狱中日记》走出了铁窗。日本投降以后，他和范文同、武元甲等人领导越南人民占领了河内，并抓住时机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当选为国家主席。

胡志明是在越南革命中造就的一代革命者，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中造就出来的革命者。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和不同的经历。这些相同的经历使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惊人的一致意见，而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他们又是那样地不同。

这些相同和不同，构成了毛泽东和胡志明几十年间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援越抗法的斗争，使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胡志明主席离开中国时，周恩来到机场欢送。

322

- ★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还是义不容辞地给予了越南的抗法斗争以有力支持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中国大地上响起不久，胡志明就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谨代表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祝贺。

越南和中国两个民族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从今以后，这一关系将为发展我们两个民族的自由幸福、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而更加密切。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胡志明

据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有关人士说，胡志明紧接着又来了一封信，这后一封信的重要内容，就是请求中国给越南提供援助，并希望中国派人去越南。

随后，胡志明亲自来到中国。当时毛泽东已经出访苏联，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和他共同研究援助越南的问题。

几天以后，他和周恩来一块儿到了苏联。周恩来是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去苏联的。胡志明到当时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是和斯大林一起磋商有关抗法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和胡志明在苏联进行了几次交谈。在对待苏联的一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致的想法。

胡志明感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性格是那样地不同。斯大林比毛泽东难接近，而且他很多疑。胡志明拿了一份画报，请斯大林签

名，斯大林签了，后来又叫人把这份画报偷走了，说是怕胡志明拿了这份画报去当尚方宝剑。

而毛泽东是有什么说什么，不绕弯子，也不搞小动作……

胡志明先于毛泽东离开了莫斯科，经中国回国，并在中国逗留了一些时候。

这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到了国内的电报，称越南政府要求中国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知道，现在越南正是需要支持的时候，斯大林由于种种关系，没有立即表态。我们中国就是要支持弱国。

他提起笔，给在北京的刘少奇写了一份电报。





越南朋友向毛泽东赠送礼品。

少奇同志：

（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一个复文，请于明（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胡志明。

（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民主国家。

毛泽东

1月17日下午10时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还觉得意犹未尽。又随手起草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给越南外交部长的复电。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又觉得这两份电报上还有可修改之处，马上又给刘少奇补发了一份电报。

过了几日，毛泽东又和周恩来联名给刘少奇发了电报，请他代向胡志明表达问候，并且告诉胡志明，苏联已承认越南，我国驻苏联使馆已将越南请求各国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文件转交给各民主国家驻苏使馆。

——毛泽东对待越南和胡志明的态度，从几封电报上也有很清楚的反映。

尽管中国人民刚刚解放，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毛泽东还是热情地伸出了友谊之手，给了越南无私的援助。用中国农民的话说，这叫“宁肯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朋友”。用后来报纸上的话说，就是：“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中国给越南的援助，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

毛泽东先后派出以罗贵波、陈赓、韦国清等人为首的顾问团，帮助越南解决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问题。

黄文欢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期间，



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

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枪支11.6万多支，火炮420门，以及大批的通讯工兵及器材。

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胡志明于1951年的严冬再一次来中国，当面向毛泽东请求给予帮助。他清楚地知道，这种时候，毛泽东是靠得住的。

关于胡志明这次秘密访问，罗贵波是当事人，他有一段很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1951年冬季，胡志明又一次秘密访华来到北京。一天我陪他来到丰泽园的颐年堂。我们进去时，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都迎出来。他们相互亲切地拥抱。胡志明主席早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分别相识，他那带有广东味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可以不用翻译。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一点外交形式，胡志明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而热情。

他见到毛主席，像久别的兄弟，相互问候，说了一阵亲切的话语，很快话锋转入正题。

胡志明把越南抗法战争的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以

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周总理、朱总司令把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我国国内的有关情况，也向胡志明作了简要介绍。

在交谈中胡志明问毛主席：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们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主席说：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提的意见和建议



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毛主席和胡志明交谈时，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观点和意见都融合在家常话中，看似聊天，但细想却含意深刻而又耐人回味。胡志明是个极富感情的人，看得出他被毛主席的诚挚感染了，他站起来说：“我和越南同志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意。”

到吃饭的时间了，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我一起走进餐厅用餐。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提前告退。餐厅跟会客室只用一屏风隔开，只七八步一挑帘就进去了。餐厅仅有摆两张餐桌的地方，这时只摆了一张餐桌。吃饭时，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边吃饭边继续谈话。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插话，互相补充，谈得非常热烈。

席间，胡主席看到端上来的辣椒，就对毛主席说：“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没法下饭？”毛主席笑笑。胡志明又接着说：“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长得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大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完越北森林里的朝天

椒以后，毛主席说：“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厉害；他（指罗贵波）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接下去的话题就是各自介绍各自家乡的辣椒的烹制方法。然而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越南吃辣椒的方法。胡志明说，把朝天椒加点鱼露（越南人炮制的一种酱油）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这时毛主席说：“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





毛泽东在书房会见范文同等越南客人。

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呢！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这次谈辣椒的故事。

从罗贵波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时毛泽东和胡志明的亲密关系。

由于毛泽东在和苏联的交往中，对那种不平等的东西特别反感，因而在和比自己弱小的越南交往时，特别注意。这种交往，正如胡志明自己所说，是一种完全的国际主义的。

就在那天，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以后，他又把罗贵波留下，专门对他进行了交代。

毛泽东说：“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的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不论是提意见还是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罗贵波说：“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

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也叮嘱说：“你的工作是好的，更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范围，重要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毛主席和中央。”

毛泽东接过话茬儿，回忆起中国革命的历史，他问罗贵波：“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知道李德此人吧？”

罗贵波当然知道，就是那个所谓共产国际的代表，人们叫他“独立房子”。





1965年，毛主席在首都各界人民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上。

毛泽东那天很是健谈，他说：“李德这个人，参加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的赏识，把他派驻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说得很缓慢：“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道的战略战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罗贵波明白，毛泽东是在给自己提醒，不要犯李德那样的错误。他连连点头。

毛泽东又说：“贵波同志，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

这一点，罗贵波是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在后来的工作中他正是这么做的。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

毛泽东还要他叮嘱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

走出中南海，罗贵波还在想，毛主席对那种“钦差大臣”可真是深恶痛绝呀！

越南的抗法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大力帮助下，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毛泽东对胡志明、对越南劳动党中央表现得更尊重。我们翻阅当年的电报，几乎每一份电报上都有“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由你们决定，你们比我们熟悉、了解情况”。

在中共中央联络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毛泽东又作了如下的指示：

“热爱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

正是大批中国同志和越南同志一起并肩战斗，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才进一步取得胜利。这里有中国同志的鲜血，有的同志就永远地留在了越南的土地上。当时有的同志也有些想法，毛泽东知道以后，就要求当时的顾问罗贵波做这些同志的工作，他还举了白求恩

的例子，要这些同志向白求恩学习。毛泽东还吟了两句古诗：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友谊才进一步得到发展，毛泽东和胡志明之间的友谊也才能越来越巩固。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都承认这一点。



★ 越南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刚刚打走了法国人，又来了美国兵。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支持胡志明

1954年5月至7月，有8国代表参加的越南问题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划分南北两个政权，到1956年举行全国大选。

这对越南人民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但事情并不是按人民的意愿发展的。

到了1956年，美国 and 南越又变了卦，他们阻挠这次大选，使刚刚走向和平的越南又重燃战火。

从此越南这块土地上枪声不断，流血不停。到了60年代中期，战争进一步升级了。

1965年2月7日，是个正常的节假日——星期天。许多不祥的事情就发生在星期天，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突袭贝鲁特……

1965年的2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全面攻击……于是印度支那又燃起战火。

2月10日，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人的大示威，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十里长街吼声震天：

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

从印度支那滚出去！

从亚洲滚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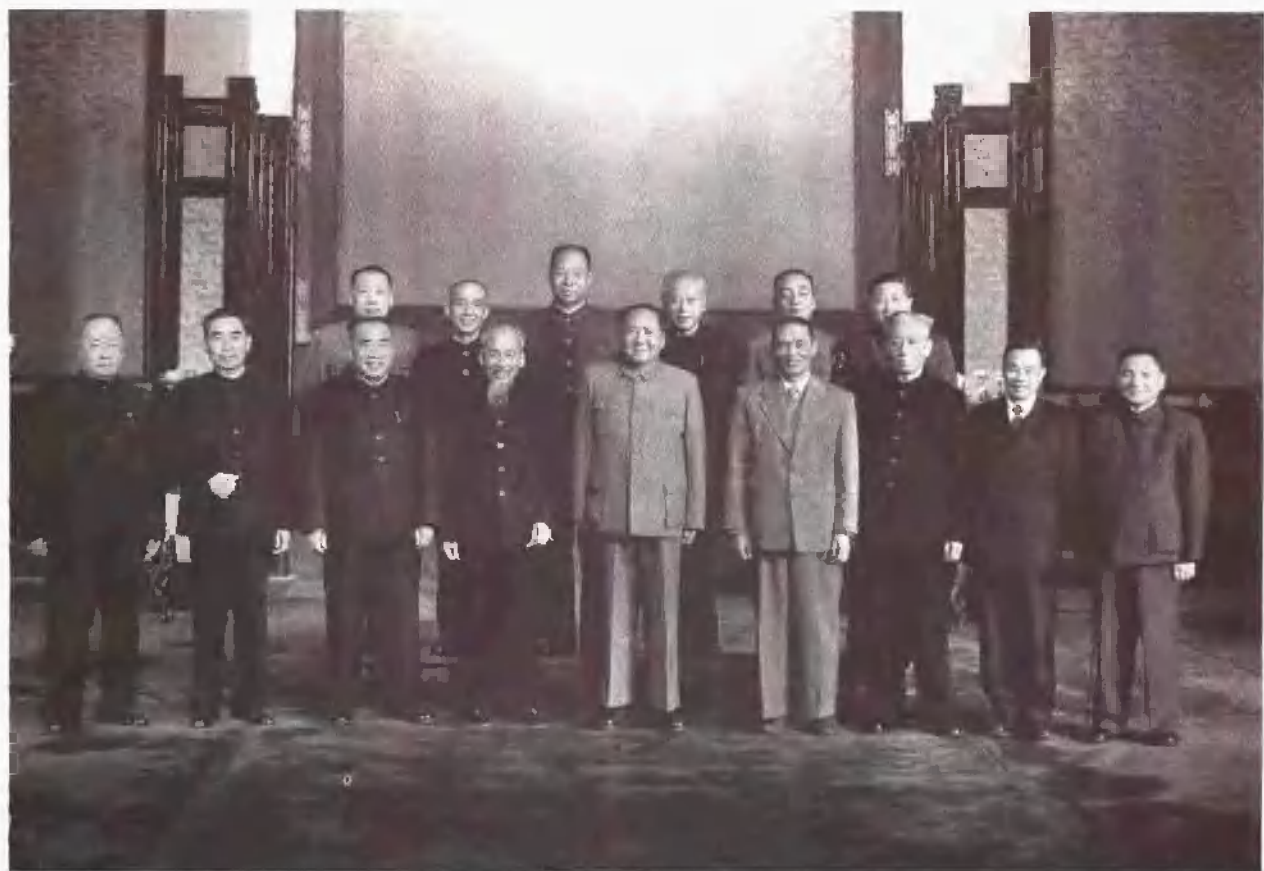
从非洲滚出去！

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占领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此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正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向示威游行的群众致意。

这是做给美国人看的，也是做给越南同志看的。

毛泽东就是要告诉美国人，我们当越南的后方，当定了！我们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前排：陈毅（左一）、周恩来（左二）、朱德（左三）、刘少奇（左七）、邓小平（左九），后排左起：伍修权、李富春、彭真、李井泉、杨尚昆、罗贵波〕会见越南客人。



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声援越南抗美的讲话。

就是要支持越南人和你美国人打下去！你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不是见过面了吗？中国人就敢和你较量较量。

毛泽东同时告诉越南人，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有我们做你们的后盾，你们可以放心地打下去！

然而越南人并不放心，4月，黎笋来到了北京。下飞机后，他迫不及待地封一封胡志明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中方的接待人员中的负责人。

当他得知中国方面为他安排了礼节性的晚宴和有关的文艺演出时，他说：“这就不必了吧，我想尽快和中国的领导见面。”

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了，他决定刘少奇和这位越南领导人会谈，并且给了刘少奇这样一个原则：我们要无条件地满足越南同志的要求。

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原则呀！

事后人们说，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一个原则。

刘少奇和黎笋的会谈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

关于这次会谈，《秘密出兵亚热带丛林》一书有过如下的描绘：

会谈正式开始，中越双方各坐一边。少奇微笑地望着黎笋，眼光慈祥，带着关切和同情。他说：“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援朝斗争，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

黎笋往前欠一下身子，连连称道：“我们一直认为伟大的中国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最充分。”

少奇吸了一口烟，没有对黎笋的话做出直接的评价。他只是以坚定的口气，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

“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援助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黎笋是斗胆说出这话





这对在法国留学时就相识的中越朋友
见面依然喜欢用法国的拥抱礼节。

的，而且说得有点动情。像是出于内心，又像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立场，同时也为下面的会谈作铺垫。停了一下，他把话锋一转，果然以恳切的口吻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的飞行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必要人员都在内的中国部队。”

少奇知道，这是今天会谈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一条：有求必应。于是，他既热情果断又策略地说：“好嘛，大敌当前，我们岂能坐视不救？！但是，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这是黎笋渴望已久的结果。因此，听了少奇的话，他的脸色瞬间由阴变晴，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急忙代表胡志明和越共中央，向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然后，指着坐在他身旁的武元甲对少奇说：“至于中国派出援越抗美部队的任务、人员、着装、给养、入境时间与路线等一系列具体事宜，请两国军界去谈吧！”少奇点点头，“好的。我们今天只定大原则，也不发表公报。至于去什么兵种，要多少兵力，怎么个去法，都由两国军方负责人再具体磋商，草签协定吧！”

很快，中国援越抗美的部队就出发了。

不久，胡志明又秘密来到中国。

这些年，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胡志明来过许多次中国，毛泽东也和他谈过好多次。

这次胡志明来，毛泽东不在北京，而是在他的老家湖南。胡志明是在长沙和毛泽东见面的。

毛泽东在长沙的住所是绿阴掩映着的一栋平房，院里有一些平常的花草。

毛泽东习惯夜晚办公，常常是睡到中午，今天他起得比较早，他



记着，今天上午，胡志明要来访。

胡志明准时来到了这里。

毛泽东会见国内的同志，一般都不出来迎接的。对来自越南的同志，他是一定要到房门口迎接的。

胡志明依然穿了他的那身米黄色的中山装，脚穿一双“长征鞋”，老远就伸出手来。

“毛主席，你好哇！”

两只大手握在了一起，并且还有一个非中国的礼节——拥抱。

坐在会客室里，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天南海北地谈了起来。

美国在越南的暴行，是他们谈论的重要话题；世界局势，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还有中国国内的一些问题，也有所涉及。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要人，要物，你说。”

毛泽东十分坦诚。

胡志明摸一下已经雪白了的胡须，对这样的朋友，他还有什么需要客气的呢？

他从中山装的大袋里摸出了一张图，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上。

毛泽东眯了一下眼睛，看清楚了，这是一张河内以北急需抢修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不用翻译，自然使他们的谈话更加自如。

走出那所房子以后，胡志明还在回味着毛泽东的一些话。

此后的日子里，中国先后派出了部队，到越南的丛林中，担负起了防空、修路、后勤保障等任务，为越南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尽了最大的努力。



★ 毛泽东没有出席胡志明的葬礼，但他内心是很不平静的……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离开了哺育他的土地，去见他的老师马克思了。

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还有他未竟的事业。

关于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泽东先于9月4日去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8日，再由李先念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葬礼。

毛泽东自60年代以来，没有再出过国，这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如果是在50年代，毛泽东一定会出现在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上的。现在这种安排，应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

午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

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手有点发抖，以至于他写得最熟练的“毛泽东”三个字，都有些和平时不同了。

签完这份报告，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他站在桌前，狠狠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思绪飞了很远很远……

他接响了叫秘书的铃。


秘书走了进来。

他指指桌上的报告，说：“马上送总理。”

秘书拿起报告，正要离去，只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

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见毛泽东的脸上淌着泪水。





第十二章
巨星陨落前的霞光



1970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 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批评，狠狠打掉了江青一伙的气焰

1975年5月的北京，杨柳抽绿，桃花绽红，一派春意盎然。

5月3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还是去年7月毛泽东离京南巡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方。转眼9个月过去了，然而，对在座的人来说，当时会上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他作了一篇很长的讲话，这是几年来很少听到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是批评江青的。

持全体委员坐定后，毛泽东声调缓慢，却语气有力：

“好久不见大家了。现有一个问题，我和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当然是个别的人。”

毛泽东面朝坐在远处的江青、张春桥几个人看了看，接着讲下去：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讲经验主义的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是听了一遍。我在那里也不能看书……”

毛泽东提到的“讲经验主义”的文章，正是他在杭州听读的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当时那种状况，要求

他听一遍就能发现洋洋万言的枯燥文章里的“差错”，确也勉为其难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就这件事作出自我批评。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倒。”

毛泽东略显激动。他显然是想起了“批经验主义”的那几个人还有一笔“旧账”未算。

接着他又习恨地打起手势，以加重讲话的分量：





1973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7月17日，周恩来总理陪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会见毛泽东主席。

“这一次我还是要讲‘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接着，毛泽东谈到列宁的一本书。这时，江青突然插了毛泽东一句话。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话锋一转：

“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江青不如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

争》。”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在座的众人心里都明白，毛泽东这是在批评江青。

对江青等搞“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又说：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这次讲话，不仅使江青一伙批所谓经验主义批不下去了，而且把江青等人搞“四人帮”问题作为政治局内最大的问题了。毛泽东讲的这番话的分量，以及在党内的作用，江青等人是心中有数。

9个月前最后一次南巡的所见所闻所思，使得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毛泽东更加重了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们倚重和信任，而把批判的锋芒再次对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这次会议，成为政治局内“风向”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会后被迫“下马”，由邓小平实际担当

起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任。在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邓小平趁热打铁，接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狠狠打掉了江青一伙的气焰。

在此基础上，1975年夏秋，邓小平领导全党毅然决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对各项工作实施整顿，揭开了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屈斗争的新篇章。



★ 一息尚存，奋斗不已。面对着死神的挑战，毛泽东又一次到“中流击水”。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进入1976年，是毛泽东晚年中最艰难的岁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最多的一年。

江青一伙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越来越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邓小平的威望反而越来越高了。因为在批邓中，人民都在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逝世后，江青一伙制造种种事端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同时又加紧开展批邓运动，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

1月11日，百万群众伫立在十里长安街上，为敬爱的周总理送灵。1月15日，北京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毛泽东因病未能参加。

1月21日、22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决定，虽然邓小平

已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被打下去了，没有让邓小平接替总理的工作，但是也没有让张春桥当总理，打破了“四人帮”想当总理的美梦。

1976年2月2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通知的下发，对江青一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估计，原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已在批判中，也停止了她的不少工作，这次肯定





越是豪气十足，越是浪漫非凡的人，越是感到孤独。



不出来，总理的职位一定会落在张春桥的身上。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提张春桥，而是提了华国锋。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左这个有感中，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何等地无奈，对自己的失败又是何等地不甘心。他们要窥测方向等待时机。

几十年来，毛泽东总想在革命斗争中挑选接班人，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次选上了华国锋，能否成功呢？

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华国锋按毛泽东生前的愿望，参与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避免了“血雨腥风”。同时他也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左”倾错误，继续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因而犯了重大错误，最后不得不逐渐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虽然华国锋在位时间不长，但可以说，他功过分明。

1976年2月间，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第二次来中国访问的尼克松。尼克松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记述：

“1976年再次来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像一连串音节的咕哝和呻吟，不过他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

此对的毛泽东：虽然他的思维仍然敏捷和清晰，但是能接近他的人太少了，只有毛远新和张玉凤等人。毛泽东听到的只是少数人

向他的汇报，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情况了。而传达毛泽东话的人，也只是少数几个人。在这个时候，江青等人哄瞒毛泽东，或“假传圣旨”是有便利条件的。

越是豪气十足，越是浪漫非凡的人，越是感到孤独。当毛泽东发现大多数人并未达到他的理想人格，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现实的变化并未按照他的思想实现，理想的世界依然是那么遥远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孤独感便在晚年，特别是周恩来逝世后，强烈地表现出来。

自进入70年代以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要见马克思，见上帝。1975





晚年的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情景。



年4月18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一代伟人的悲凉，溢于言表。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清。

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夜饭是张玉凤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侧卧在床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工作人员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名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大家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就这样，正在值班室的几名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几节鞭炮，用火柴点燃后在房外燃放了起来。此刻的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大家心里都明白，他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他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爆竹是为陪伴他的工作人员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他们去除旧迎新。

春节期间，中南海专门为他放映了电影《难忘的战斗》。据吴旭君回忆，当银幕出现人民群众热烈欢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毛泽东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看不下去了。

几个月后，他老人家又一次禁不住老泪纵横。那是见到他亲生

女儿李敏时。他的生命已经垂危了。他仰卧在床上，面无血色，气息微弱，但神志还是很清醒的。他认出了女儿，叫她坐到身边，拉着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看我了……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我呀……”听了这话，李敏真想大哭一场，告诉爸爸不是她不想来，而是有人不让她来！她是冲破了江青的重重阻挠才得以这次见面的。但她克制住了，没说。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把爸爸那双衰弱无力、有些发凉的大手捧起来，紧紧贴在自己胸前，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

虽然毛泽东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甚至说话也很费劲了，但他的

头脑依然十分清楚、依然全身心地为国事操劳。

由于长期卧床，为了侧卧时看书批阅文件方便，工作人员为他配了单腿的眼镜。后来连举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让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和文件来阅读。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又导致了身上的肌肉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主席不仅行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使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6月初，毛泽东的心脏病再度发作，经过全力抢救，才又平缓下来。这时他已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医护人员为他下了鼻饲。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鼻子上同时插着氧气和鼻饲两根管，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从1960年起开始为他作内勤和卫士的周福明回忆：“我时常看到在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地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严重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的，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个不停。”

毛泽东病情恶化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由北京、阜外、301、305等医院选派人员成立的医疗小组对他实行了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心情和工作人员一样，盼望着主席的病能够一天天地

好起来，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过来。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抢救。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

这时的毛泽东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务人员为他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心地为他配制的。护理人员隔段时间就把食物往管子里注入一次。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镇，具体领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



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毛泽东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语来宽解医务人员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301医院的一位专家感慨地讲：“我行医已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书”仍与主席为伴，不过毛泽东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成了他与病魔斗争的“武器”。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不停地看。自己举不动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帮助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读。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

这段时间毛泽东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大字本，他特别喜欢这套书，起码读过10遍。

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病中的毛泽东被担架搬进了游泳池边上的新居“二〇二”。当时毛泽东已服用了安眠药，醒来后他执意要求搬回游泳池的旧居去。最后由华国锋亲自做工作说，等地震平稳下来，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

可毛泽东再也没有能搬回旧居，伴随着唐山、丰南地区的余震，

永远离开了他居住十年的游泳池。

毛泽东十分关心震情和灾区人民。送来的震情汇报，他都亲自过问。当他听说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时，止不住热泪涌流。8月4日，毛泽东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是他生前批发的最后一份文件。

不久，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8月26日，危病中的毛泽东似乎不知道生命的终结将要到来，又向工作人员索要了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这是他比较喜欢读的一本书，也是他向工作人

员要的最后一本书。

9月2日，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3日，病危。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同死神抗争。

据徐涛、吴旭君统计，毛泽东在9月8日这一天先后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而这一切是在上下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的情况下，由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来读的。周福明回忆：“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把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参加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也正是这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

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紧张地观察、注视着。

入夜了，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病榻前，同他做最后诀别。

当时，毛泽东的意识尚清醒，只是已发不出音来。叶剑英走过来了。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十分崇敬、一生追随的伟大领袖，昔日那叱咤风云、风流倜傥的伟岸雄姿，已经变成今天这消瘦的病躯；颇具历史感，能看透历史、能将人看穿的炯炯双目，今



天已经黯然失神；那极富幽默感、极富吸引力的话语，已经难以再现。想到这些，叶剑英禁不住悲袭心头，热泪横流。

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努力活动已十分不灵活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去！”

叶剑英立即从休息室返回到毛泽东卧榻前，说：“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叶剑英全神贯注，准备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最后遗教。毛泽东睁大眼睛，注视着叶剑英，嘴唇轻轻地翕动，但嗓子里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来。毛泽东用最大的力气，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不停地晃动着，好一阵子，毛泽东累了，闭上了眼睛。叶剑英只好又退了回来。

叶剑英心想：“主席为什么第二次招呼我呢？他还有什么嘱托？”也许，毛泽东在自己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夕，已经清醒地预见到，他离去以后，党将面临新的危机，因而要对叶剑英有所嘱托？叶剑英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几个小时后，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既有过革命高潮时在风头浪尖上的搏击奋进，也经历了挫折时在低谷中的一次次努力。但无论是成功与失败，

356



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说那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死之将至，但他的行动却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也许毛泽东用最后的力气读那些书和文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但这却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一息尚存、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到中流击水呀，这是面对着死神的挑战，用生命进行的最后一搏。

★ 巨星陨落，神州悲恸。一次罕见的效忠活动和一张封存了二十多年的照片，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年月

9月10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天空阴沉，这是秋季里少见的天气，就像中国人民沉痛悲伤的心情一般。

人民大会堂彻夜通明，人们紧张地布置着新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灵堂。

在中南海里为领导人拍摄了16个年头的杜修贤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也没有合眼，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支接一支猛吸香烟。他看了一下表，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再有两个小时，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到这里，开始为期7天的吊唁活动。灵堂的布置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阶段，也就是最缜密的检查落实阶段。

他检查了一遍摄影灯光和摄影架，觉得差不多了，就瘫坐在大厅旁的沙发里，准备吸一支烟就回家睡一会儿，明天还要来这里拍摄瞻仰遗容的场景。

这时，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不知什么时候走进大厅，不声不响来到杜修贤身边。

“老杜，你跟我走。”

杜修贤一愣，想都没想，就起身迷迷糊糊跟着往外走。

才走了几步，汪东兴掉过头见杜修贤两手空空，就说：“唉，你的相机呢？”

“我没有带相机。”

“布置灵堂又用不着相机。”杜修贤心里嘀咕道。

“去，带上相机。”汪东兴不耐烦地朝杜修贤挥挥手。

杜修贤出现了少有的迟钝，“我没有带相机啊！”

“你不会向其他记者借一部？”

“噢？……好。”杜修贤看到一种命令的眼神，脑袋清醒了许多。





“红太阳”坠落了，人民群众痛哭流涕，络绎不绝地望着安详睡去的毛泽东主席。

358

赶快向别的记者借了一部相机，又要了两个胶卷。

“才两个胶卷？不够！再去借点。”

这是去干什么？要这么多胶卷？杜修贤没敢问，又跑去要了几个胶卷。

出了大会堂，汪东兴又叫杜修贤坐他的随车，而杜修贤的车子叫空放回去。

杜修贤心里更加疑惑不解，做什么事情这样神秘？

杜修贤在极度不安中，看见汽车进了中南海的西门，心里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估计是照主席最后的遗容，因为一旦遗体运到人民

大会堂的灵堂里，遗体就要放进无氧罩里，那时就无法再对遗体拍摄了。不然这时急切要进“海里”干什么？肯定是这码事！不过下吗要搞得这么神秘？怪吓人的！

汽车没有驶进游泳池……这是到哪儿？杜修贤的心又提了起来，两眼透过车窗上的纱窗，外面夜色朦胧，白天所熟悉的景物都隐进了黑暗之中，也分不清汽车是朝着哪个方向行驶。不一会儿，汽车停在一处清冷的院子里，好像以前从没有来过这里，显得这么陌生。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里的另一处住宅。其实和游泳池相邻，只是杜修贤以前没有来过，所以感到陌生。

一进门是个走廊，灯光很亮，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真是见鬼了！杜修贤心里惊奇万分，竟不觉得恐慌了，好奇地想朝里望望。这时坐自己的主车先到的汪东兴站在走廊的一端，也不知他是从哪个房间里出来的，他朝杜修贤招招手，让他进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沙发和茶几，四壁空空如也。

“你这里先等着，等会儿有事叫你。”

杜修贤只好按照他的指示先在这间空寂的房子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他送了一杯热茶。他慢慢地吸烟喝茶，一点一点地消磨这难捱的时间。这样着急神秘地把他叫来，就是为带他到这间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房子里增加一个人的影子吗？简直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

瞌睡渐渐袭来，杜修贤迷蒙之中突然被一声门的碰撞声惊醒，睁眼一看，走廊上依然空荡如初。奇怪，这声音是从哪传出来的？他正疑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虽然这声音很轻很轻，但还是分辨出来，而且是好几个人走动的脚步声。从门缝里朝外瞧，他心里暗暗吃了一惊！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还有华国锋、汪东兴，最后出来的是陈锡联，他们正从走廊顶端的一扇门里走出来。哟！万万没有想到这陌生的房子里还“藏龙卧虎”般地藏着这么多的大人物呢！

华国锋手里拿着牙签，不时在牙缝里剔一阵，有的还打着饱嗝



儿。杜修贤这时也觉得饥肠辘辘，也想去找哪个能解决肚子“危机”的房间。可是他刚出门就被姚文元一眼捉了去，连连喊住他。

“老杜老杜，啊呀，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

“我早就来了。”杜修贤心想，在那个空房子都快坐一个小时了，还到处找？谁相信！

“那太好了，有重要任务要你完成。”

一听任务，杜修贤难耐的饥饿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马上想起那位负责人找他时的急切和神秘的表情。这任务一定很重要！他的神经顿时绷紧了。

“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儿就来。”姚文元对另一个人说。

杜修贤连忙背上摄影箱跟在那个人的后面，从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间的门口，带他的人止住脚步，缩了缩脖子，似乎有点胆怯，朝里指指，对他说：“就里面，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进去了。”

杜修贤应了一声，抬脚就往房间里走。一进去，他的眼就直了，冷不丁浑身汗毛唰地立起来，脖子后升起一股冷风……毛泽东活着……他就睡在杜修贤眼前的一张宽床上。

好半天杜修贤才从惊悸中镇静下来。仔细观察眼前曾经十分熟悉的形象安详地睡在白色素洁的木床上。以前镜头里只有他谈话、走动、看书、吸烟和坐在沙发里沉思的目光，现在是第一次看见他

睡觉的模样。他双眼合闭，经过淡妆的脸庞微微泛起红润的光泽，灰白的头颅枕着白色的枕头，白色的被单齐胸盖在他淡灰色的中山装上，显得非常恬静，栩栩如生。

以前常听人说，接触生前熟悉的人的遗体是不会感到恐惧和害怕的。难怪一见到毛泽东，杜修贤脑子里就出现了错觉，以为毛泽东还活着，只是刚刚睡着……他好奇地打量四周，这空无一人，没有一点生气的房子，大概就是抢救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宽大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毛泽东睡的大床和几只木箱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如果不是脚下彩色图案的地毯还存有柔软温暖的生机，他无法想像这



是站在“红太阳”坠落的地方，这里曾经进行过人类最紧张最痛苦的生死搏斗，曾经经历过人类最悲伤的生死离别。而现在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生命走进他的另一个世界里……毛泽东永远地睡着了，不再需要生机和空气，永恒的宁静将伴随着他，连同他“睡”的这个房间也被带进了无比的宁静之中。

杜修贤在宁静中，轻轻地对着毛泽东的遗体调好焦距，拍了一张半身的，又拍了一张全身的。快门的“喀嚓”声竟叫他担心，生怕吵醒主席，就像以前生怕打搅他难以安寝的睡眠似的。

杜修贤为能来拍主席的遗容而欣慰，这个任务的确是很重要的。毛泽东遗体和外界空气隔绝以后就不可能再拍照了。

杜修贤正拍着，身后传来推动门的响声。这时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门外的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随便走进去。

“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哼……又是一个平板光！”杜修贤一扭头，见江青不满地瞥了他一眼。自从她去年底为大寨照片收费的事情和他搞僵后，近一年没有和他有过任何联系。她突然扯着嗓子说了这么一句阴阳怪气的话，算是打破了一年的“封冻”。

杜修贤没有说话，也没话可说。你说平板就平板吧！

他放下机子，才发现房间里已进来了好几个人。到这时他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今天给他的重要任务究竟是不是拍摄毛泽东的遗容，还是其他什么内容。他看大家个个都是阴沉沉的脸色，几次

话到嘴边又咽回肚里，不敢贸然开口问。他心想反正他们干什么就拍什么。

杜修贤见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怎么拍摄，就提着机子离开毛泽东睡的大床边，贴北面的墙边站着，等他们商议完后再拍摄。

杜修贤还没有反应过来，突然看见几个人排成一队，一个接着一个低垂着头，绕着毛泽东安睡的大床缓缓行走……他一时呆了，没能领会眼前这奇怪举动的要领，心里猜测是不是向毛泽东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由记者见缝插针“抢”新闻的本能驱使，杜修贤赶快做出反应，





1976年9月11日，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瞻仰毛主席遗容。

拿起相机跟着他们的身影拍摄。转一圈后，他们每个人都要在毛泽东的床前默默地致哀。这时他正好一个人一个人从容地拍摄。

蓦然，杜修贤心头掠过颤抖，取下相机，用惊恐的目光投向眼前的几个人。天！这里面没有叶剑英啊！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负责军队工作的，他为什么没有来？这里是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

如果说是在京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那么人数就差得更多了。

会不会是毛泽东医疗组负责人的告别仪式？也不对呀，姚文元又不是医疗组的成员。

杜修贤反复苦思冥想也没有为今晚的活动找到合适的解释。

他不仅纳闷也很疑虑，开始为自己的处境不安起来，这里似乎是个绝缘地带，不该留有其他人存在的地方。他的镜头犹如越过“雷池”般恐惧和颤抖：“我是不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拍摄了不该拍摄的镜头？”

猛然，他心里打了个寒噤，眼前人影突然变成了一道“人墙”。几个人默默地手挽上了手，神色异常凝重，阴沉的目光聚集在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毛泽东身上……

他强制自己镇静，镇静！记者的天职促使他真实地记载历史。

他想站在高处拍摄这个惊心动魄的全景，可是环屋一周，发现连个可以站脚的凳子也没有，就灵机一动，跃步跳上暖气片，另

只脚站在窗台上。这样挽手场景就全部清晰地落进了镜头里。

当杜修贤在他们结束仪式后跳下窗台，触地的双脚顿时麻痛无比，像电流通过全身。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真实存在。

他迈着麻木的脚步走出这间房子，在走廊里看见了毛泽东生前的工作人员们。他奇怪极了，刚才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然早点问问他们情况，也不至于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到如今他也不能再问什么了。

杜修贤打了个电话叫车子到中南海的西门等他，然后快步离开了这栋陌生的住宅。



出了中南海的西门，他倏然闪过一个念头，去叶帅家看看。

到叶帅家已经是凌晨一点。叶帅的儿子告诉他，他的父亲到“西山”去了，今晚没有回来。他只得悻悻折回车头，往回走。可是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西山”就在北京的近郊，如果叫叶帅参加今晚的告别，也不过只需叫秘书打个电话就行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叫叶帅参加，这究竟为了什么？

汽车穿过沉睡的市区，他觉得他刚才经历了一个梦游患者的奇遇，虚无缥缈恍然如梦。如果真是个梦多好！

11日上午9点，杜修贤又带着疲倦的身躯来到人民大会堂，拍摄人们吊唁毛泽东的活动的镜头。他有点心神不宁，怕江青他们提问起几个小时前拍摄的照片。他们吊唁的镜头一拍摄完，杜修贤就转开去，想法尽量离他们几个远一点。

照片奇迹般地被他们忘却了三天。他有了充分的时间调节和控制不安的情绪。


直感告诉杜修贤那张照片对自己构成了新的威胁！

他将照片和底片作了特殊的秘密收藏——一个抄家也找不到的地方。毕竟是在坎坷严峻的政治环境里摔打滚爬往50岁上跑的人了，岁月积累的持重已远远多于片刻的惊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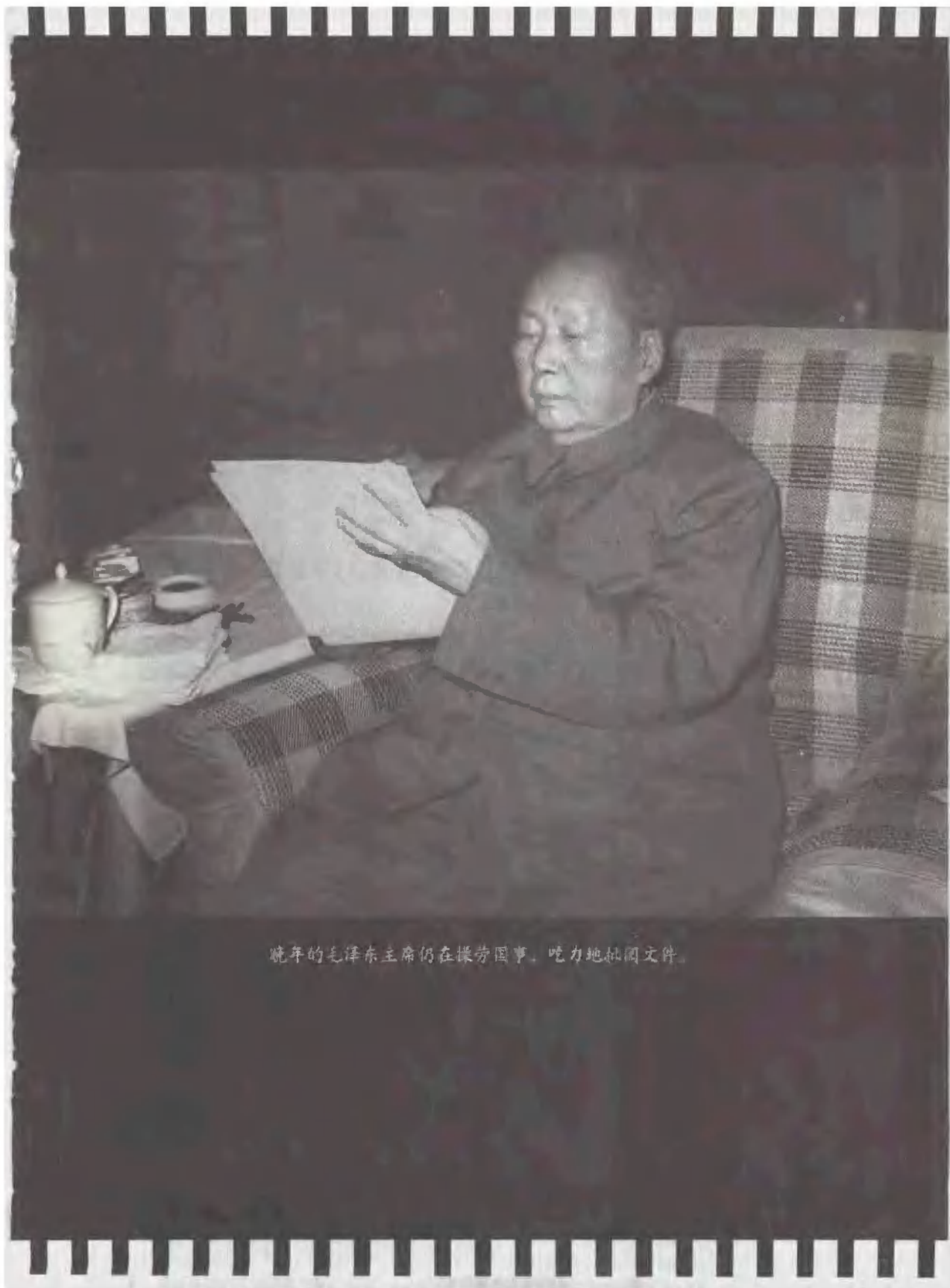
14日，日夜担心的电话终于在人民大会堂里响了起来。第一个电话是江青的，这是她的特点，喜欢用电话追在为她办事的人后头，

让人始终处于紧张之中。她叫杜修贤立即去钓鱼台，将照片给她审看。刚放下手里的电话，第二个电话接踵而至，一接竟也是找杜修贤的，不过这次不是江青的而是姚文元的电话，内容和江青电话内容如出一辙。他惊诧万分，他们竟这么巧不约而同打电话找自己？幸好将照片随身带了好几天了，就估计到他们是要照片的。杜修贤和同事们打了个招呼，准备去钓鱼台，没想到这时有人在吊唁大厅旁的门里叫他，又是电话？见鬼！杜修贤嘀嘀咕咕去接电话。又是问照片，不过这个电话是从中南海里打来的。

不过10分钟的时间，杜修贤就接了三个从不同的地方打来问同



第十三章
无尽的思念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仍在操劳国事，吃力地批阅文件。

★ 李讷说：“父亲在玩的时候和工作一样，也非常认真，非常投入。他不但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朋友。”女记者突然问李讷：“毛泽东平时喜欢什么？”李讷脱口而出：“打牌。”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幼时没有离开他身边而长大的女儿。或许是最小的缘故，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女儿。从许多照片上都能看出毛泽东这种炽热的感情。他不是用他那充满父爱的大手拉扯着可爱的女儿散步，就是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还在浑然之中玩耍的幼女。也是这个诞生在延安的小女儿，给予了毛泽东许多别人无法给予的慰藉，使他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享受了温馨的天伦之乐。

转眼间，当年那个聪慧漂亮又乖巧的女孩，已经是年过半百、饱经人间风风雨雨的中年妇女。

女记者初次见李讷，是在李讷的家里。已被电影、电视曝光多年的女记者，自然不用介绍，李讷夫妇一眼就认准，上前热情地招呼她和摄制组的朋友们。

在女记者脑海里的“红色公主”，就是眼前这位朴素温和极普通的老大姐吗？

用文学语言描绘李讷，总是离不了朴素、简朴或者是文静、谨慎等词汇。当你看见李讷，便会觉得用任何简单的语言描述她都显得肤浅。李讷是有思想、有深度、历尽沧桑而又身份独特的成熟女性，是属于精神贵族类型的人，比如她的简朴她的沉默以及她的隐居。无论是年轻的朋友劝说她赶赶时髦，服饰换换色彩，还是熟知她的“长辈”（李讷管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年龄大小都尊称长辈）劝她走出去，感受感受时代的变迁，她都笑笑，并不苟同，依然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理智行事。于是，她在默默无闻中保持了自己完全独立的个性和人格力量。不过，近年来，在各界朋友的盛情下，





脚穿布鞋，平易近人的风度令多少人为之倾倒。

她也到各地走动，去考察，对当前的经济建设尤其有浓厚的兴趣。渐渐地她的思想脉搏也和她父亲当年热爱的百姓们一起跳动了。

女记者的采访，是李讷很少有的直接面对摄像机镜头，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表达内心感情的一次机会，这对于深居简出的李讷，也属破天荒的新鲜事了。

女记者采取直接点题的方式采访。

“您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听说主席最喜欢你？请您和我们谈谈。”

“我出生在延安，当时哥哥姐姐都在苏联，在父亲身边的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父亲接触得就多，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最喜欢我。因为我最小，父亲和我在一起时间就多一些。我记得小时候他常和我一起玩，我喜欢在地上盖房子、挖窑洞什么的，有时爸爸工作累了，就走出窑洞，和我一起玩。他玩还不是一般的玩玩，他是真玩。教我怎样设计挖窑洞盖房子，认真极了。他看见下雨后地上还汪着水，就想办法把水引到挖好的窑洞跟前。爸爸说：‘有窑洞没有水，怎么行？人要饮水的。’他玩的时候和工作一样，也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绝不是哄哄小孩子的游戏。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认为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

李讷说到这里，脸上泛起红晕。

女记者和所有在场的摄制人员都被李讷的回忆感动了，展现在

人们面前的毛泽东是一个活生生的父亲。

“父亲和我玩也不是经常的事情，只是家里的大人见他工作的时间太长，就把我推进去拉他出来散步。我最愿意拉父亲散步，因为他离开办公桌，就会和我一起玩了。父亲见我拉他，就高兴她和我出来。我那时人小，父亲带我散步，我就抓住他一个指头……不是啊，不光是个子小，我的手也小，他的手大，我只能抓得住他一个指头。我要一溜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走到有水的地方，他教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幼儿诗歌；走到有树的地方，又教我‘微风燕子斜……’的诗。我受的启蒙散



育就是从父亲教的诗歌开始的。以后我到北京，上了小学，他就从历代诗词中圈点出比较容易背诵、容易理解的诗词，让办公厅打印成小册子，发给我们子女每人一本。每个星期我们从学校回来，他还要亲自检查，是不是会读，是不是都懂了。”

女记者问李讷：“主席还亲自检查你们的学习成绩吗？”

“他实在工作太忙，顾不上检查我们的学习成绩。学校的成绩都是母亲过问，母亲对我们的学习抓得紧，我们家是慈父严母。”

听见李讷如此评价父母，女记者就忍不住问：“主席有没有打过你？”

李讷直摇头，“没有没有。”停了一会儿，李讷若有所思，大概想起了小时候的什么事情，说：“好像打过我一次……是的，是有一次。那还是在北方，我才五六岁吧，正好父亲他们在指挥大决战。我小，不懂事。好几天没有人和我玩了，觉得孤单，就老去拖父亲，想让他出来和我一起玩耍，他也不理我。他手里老是摆弄一堆纸，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前方来的电报，父亲的精力全都放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我觉得就是这些纸片把父亲吸引过去了。我生气了，悄悄在他的桌底下，把电报放进火炉里烧，心想没有这些纸，爸爸就会和我玩了。父亲一见，这还了得！一把将电报从火里抢出来，随手就给我头顶一巴掌。本来我就委屈，父亲一打我，我更加委屈，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地大哭起来。父亲见我哭了，心软了，赶紧抱我哄我，

连连答应和我玩。只要有人和我玩，我马上就不哭了。就记得那次打过我一巴掌。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有他在，我什么时候都觉得快乐。”

李讷的眼圈红了，取下眼镜用手擦了擦眼睛，扬起头对大家笑笑，又戴上眼镜继续倾听女记者的问话。

女记者大概觉得他们父女太有趣了，就问：

“毛泽东有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没有！他绝没有这个思想！是他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他都爱。解放后，特别是父亲老了，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实在顾不



过来，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才少了。”

“毛泽东对你们有没有特别的照顾？学校的老师知不知道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父亲一直要求我们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其他学生一样住校，每星期回家都是坐普通的公共汽车。回到家里，父亲叫我们在职工食堂就餐，不让我们有一点特殊的思想。那时我们对特殊化想也不想。学校的老师知道我是毛泽东的女儿，但他们也知道父亲的严格要求，对我和其他同学都是一视同仁。”

“外面许多文章都说、中国的‘红色公主’们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样挨饿，是这样吗？”

“有一些困难，但不像外面说的那样严重。困难时期我在大学读书，每次回家，父亲总是问我学校的生活情况。我告诉父亲：开始学校要求我们学生自己申报定量，我是团员，就申报了21斤，后来学校考虑我们学生正在成长发育时期，统一将定量提高到27斤。父亲听后微微喘了口气，‘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

“那你怨恨不怨恨你父亲？他怎么不让你生活得好一点哪？”

“你怎么会提这个问题？现在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有什么不好？父亲留给我的是精神财富，这是终身享受不尽的财富。能有这样的父亲，我是非常幸福的。”



“我听说主席晚年很孤独，你们子女都不在身边。是这样吗？”

“不能这样说。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是累病的，不是人老的原因。我们都大了，有了自己的家，离开他的身边。但是我非常想他，可是又不敢去看他，知道他的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我们都珍惜他的每一分钟，希望他能多休息一会儿。我们去生怕占用他的时间。”

“主席去世的时候，你在生病，没有去参加追悼会，你遗憾吗？”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好生了病，而且很重。不知道父亲去了，当然也没有能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我想，对父亲的悼念，不应该讲

究形式。我在心里怀念他，悼念他，心灵的哀悼，比任何形式都重要。”

这时，女记者将话筒对准了一旁默不做声的王景清。他是李讷的丈夫。他是在李讷身体、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和她走到一起，结为患难夫妻的。他曾经担任过刘少奇的卫士，现在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顾毛泽东遗孤的责任。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李讷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两人形影不离、相敬如宾，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很美满。

“我是1984年和李讷结婚的，是战友介绍的。如果说认识，我在延安就见过她，李讷那时还是个孩子，我也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小鬼，所以没有说过话。”

王景清话不多，说了几句就不再说了。不过，客厅里举目可见他的书法作品，端正地挂在雪白的墙上。猛一看，觉得眼熟，细细一品，觉得有些像毛泽东的手书体：苍劲、浑厚，颇有灵气。如果出远门，王景清的兜里揣着毛泽东手迹本，没事的时候就比比画画的，就连笔者也曾经向他借读了半天。但半天的工夫，自然是学不会毛体书法的，不过也好奇地从头看了个遍，回过头再看王景清的书法作品，还真有那么点味道呢！

“毛泽东平时还喜欢什么？”女记者的话筒又转向李讷。

“打牌。他的手气特别好，都是打大牌的。我的老天爷……他的手气真好。”说到这里，李讷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们都不是他的对

家，只有母亲能和他打对家。不过父亲比母亲牌技还要好，一般母亲是打不过父亲的。”

“我们父女关系一直很融洽，不像有些文章上说的那样。父亲是我的长者、仁人、朋友、知己。我很感谢我的父亲，虽然他没有给我留下金钱，但是精神财富比任何有价的东西都要永恒，都要无价。”



★ 张玉凤高雅文静的神态依然如故。张玉凤说：“毛主席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女记者手持话筒，身穿肩部有黄色印花的白地衬衣，显得活泼自然。张玉凤着黑白相间的套装裙，从容不迫地微笑着，一种特殊的气质从她言谈举止中悄悄溢出：沉稳、安静和敏锐。这是属于“中南海”特有的气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领袖熏陶培养形成的。我们能从许多工作人员的身上感受到这种气质。


女记者采访的第一个工作人员是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的张玉凤。提起她，大家并不陌生，当年她搀扶着年老体衰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镜头，频频出现在电影电视里，引起多少人的羡慕，其知名度绝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们。

岁月流逝了二十多年，现在铁道部工作的张玉凤已经不再年轻。在几经风雨洗礼，跌宕起伏后，她越加沉稳，也很谨慎。但她款款温馨和高雅文静的神态没有随着岁月流走，仍然是风度翩翩。

女记者和张玉凤寒暄了几句，便开始采访：

“张玉凤同志，请您谈谈，是怎样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

张玉凤点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我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是有一段过



程的。1960年，我才17岁，调到专列上工作。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是随毛泽东去广州制定农业60条。我们专列在广州停留了好几个月，一直等候毛泽东返回北京。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谁乘坐的专列，有纪律规定，是不可以到处打听的。专列有12节车厢，毛主席活动的也只有几节车厢，我们虽然在专列上工作，但不是随便就能见到毛主席的。专列回北京的时候，在一个站台停留，毛泽东下火车，在站台上散步，我们才知道这是主席乘坐的专列。后来我又调到主席乘坐的车厢工作。就经常能见到主席了。几年后，也就是1970年初，我调到中南海，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开始是服务人员，1974年被任命为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张玉凤搀扶着毛泽东。

“您第一次见到主席和以后到他身边工作，感觉上有没有变化？比如以前是用崇敬的眼光看他，以后是不是还用这种眼光看他？”

张玉凤微微一笑，说：“你的问题又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得从我小时候谈起。我的老家在东北，比较偏僻，教育也落后。我上小学时，就从书本的第一页认识了毛主席，认识了天安门，老师指着天安门中间的位置告诉我们，这是毛主席站立的地方。那一刻，毛主席就站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看见他，我是十分激动的，虽然不像红卫兵那样热泪满面，但是觉得心在突突地跳，好厉害。主席走过来和我们一握手，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也忘了问声好。毛





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和医务人员合影。

376

主席确实像电影和照片上那样，高大、和蔼，走路时步子快，让人觉得他身体很好。以后我到主席身边，他已经是快80岁的老人了，而且在1970年以后，他的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

“发。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职尽责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



本书作者与张玉凤合影。

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

“主席一辈子爱看书，是这样吗？主要都读什么书？听说爱躺在床上看？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是这样吗？”

“手不释卷这个词用得好，用在主席身上很恰当。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看不清，却不肯戴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听说主席晚年还学习外语，而且口语还不错？”

“是这样的。主席生病以后还坚持学习外语。我不懂英语，他和



外宾用英语交谈，我在一边也听不懂。不过听翻译说，主席的英语口语还是不错的。”

★ “毛主席是怎样对待死亡这个话题的？”张玉凤说：“毛主席是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林彪事件对毛主席健康有影响吗？生病后又是怎样对待死亡这个话题的？他和平常人一样感到恐惧吗？”

“毛主席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说的这个唯物主义，是真正彻底的，不是做做样子，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毛主席从来不回避死亡这个话题，直到逝世那一刻都保持自若的安详神态。”

“林彪事件”对他的身体是有影响的，但是，对毛主席的精神打击是在林彪叛逃之前。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矛盾已经激化，他那时就开始承受精神上的打击。林彪逃跑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

“有一次，我们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二，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安慰主席：‘主席，您的身体底子好，有病好好治疗，会好的。’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才是屁话！’人家都知道，建国初期，主席就提倡中央领导人死后火化，并且带头第

一个在火化的决议书上签名。”

“主席也吃滋补药品吗？”

“主席历来不相信吃药能治百病。他相信人要锻炼，食五谷、身体才会强壮。他经常有意多吃粗粮，比如玉米、红薯等食物。主席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比如面食，他最不喜欢。我们老家，过年就爱吃饺子，主席就不理解，饺子有什么好吃的？哪怕喝稀粥，也不吃面食。”

女记者这时笑出了声，“和我一样，我最怕吃面食。”

“主席到身体实在不行的时候，才接受医生的意见，吃一些西洋参、蜂王浆之类的补药。”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书房里。



机要秘书张玉凤和保健护士吴旭君在毛泽东灵前痛哭。

“唐山大地震，主席已经进入到生命最后的岁月，他的神志还清楚吗？知道唐山发生地震吗？”

“1976年是我们国家的灾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那天半夜两点，地震波及北京。主席在6月因心肌梗塞已经抢救了一次，到了7月病情才稍稍平

稳了些。他的卧室太小，医疗器材放不下，医护人员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将主席的大床搬进书房里，就是人们常看见主席会见客人的地方。地震发生后，主席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我们正在睡觉，震醒后，起身就往书房跑，怕掉东西砸到主席。我们见主席床上没有遮挡，这时地震还在继续，房子摇晃得很厉害。主席住的是平房，旁边就是游泳池，因为空旷，感觉很明显。我们就用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

“你们是置自己生死不顾了？”

“那时想不了那么多啦！天亮后，我们又将主席搬到旁边防震的房子里。几天后，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在新华社的内参上，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重病之后，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了。以前光是眼睛看不见，我们念文件给他听，1975年夏天一只眼睛动了手术，戴上眼镜能看见字迹了，可是耳朵又聋了。”

“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去唐山灾区慰问，主席知道吗？”

“知道。是他看了报告后，亲自圈阅的。”

一个半小时，她们的访谈结束。最后，女记者非常动情地说：“我代表全国的观众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敬爱的领袖所做的服务工作，也感谢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张玉凤说：“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是你在主席身边，也会忠于职守、尽责尽力的。最后我想说一句：主席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学习的一生，坚强的一生，不考虑个人的一生！”

★ 一张毛主席与尼克松以茶代酒“碰杯”的照片打开了红墙摄影师记忆的闸门。他记得邓小平“解放”后第一次到主席书房的情景，主席笑咪咪地望着小平

凡是《中华儿女》杂志忠实的读者一定记得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的故事，现在和女记者对面相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摄影大师杜

修贤本人。

他们面前放着一本毛泽东主席的大型画册。女记者机灵活跃的模样以及白皙的肤色正好和杜修贤不动声色及皮肤黝黑形成张烈对比。摄影灯下，一个充满青春活力，一个则经历坎坷沧桑，一老一少，一男一女，边翻动画册，边侃侃面谈。

女记者面对摄像机向观众一一介绍杜修贤那一连串光辉的职务后，笑问道：“您那时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的组长，管电影电视摄影，职权是很大的，可一听组长还以为是个学习班长，小职务呢。”

杜修贤恢复了他的幽默：“文革小组大不大？陈伯达不也是个组





1974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这是毛泽东最后站立合影的新闻照片。

长吗？”

如果不是正在录音采访，旁边的人都差点笑出声，那个阴阳颠倒的年代，部委办的职务全部取消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律统称小组，组长遍地。

女记者问：“您是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又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的专职摄影记者。在您的感觉里，毛泽东是不是不喜欢摄影？”

“我是1970年担任毛主席摄影记者的，从1960年起，我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师。在负责毛主席外事摄影时也同时负责周总理的摄影采访工作。来到主席身边，正是主席开始衰老、多病的



1975年，毛泽东、邓小平在“游泳池”书房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时候，拍摄比较困难。毛主席不喜欢面对闪光的摄影灯，特别是情绪不好的时候，见我们记者在他书房里拍摄会见外宾的场景，就生气地挥动大手叫我们走。没有办法，只好赶快走啦。”

“为主席摄影，一定责任重。你们感到有压力吗？”

“那还用说？特别是主席审看了他的画册照片后，就是这本画册。他提出新闻摄影要生动，不能是老一套。这以后再拍他的新闻照片就要送他亲自审阅了。”

“主席晚年会见外宾比较多，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您觉得是这样吗？”





杜修贤与李讷、王景清一起交谈。

“是这样。1972年以后，中国先向美国打开大门，迎接美国总统来华访问。又在同年和日本建交。记得主席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有个插曲，可以说是主席幽默和潇洒的见证。我在拍摄他们会谈时，突然发现主席端起茶杯，往高里举了举，示意尼克松也举起茶杯，尼克松稍稍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主席的意思。

384

1973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



也学着他的模样，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他们以茶代酒，兴高采烈地碰了杯，这个画面非常有意思。”

“这张是主席和邓小平握手，主席很高兴。是哪一年拍摄的？”

“这是1974年4月照的。是邓小平解放出来工作以后，第一次到主席的书房。主席见了我非常高兴，这个神情你也看到了。以后周总理住院，都是邓小平陪同外宾来主席这里，主席总是笑眯眯地望着邓小平，他心里是很高兴的。”

女记者和摄影师一问一答，笑声不断，特别是在翻看画册的时候，话题更多。采访结束时，女记者精彩的采访已经征服了有近50年摄影生涯的老记者，杜修贤最后握着女记者的手，用赞赏的口气说：“你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

★ “我给主席理发从来不用吹风。你们信不信？这不是吹牛。”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拒绝服务员擦汗。游泳池边，主席挥动大手像赶鸭子一样把大家往水里赶

周福明是毛泽东身边的老工作人员，从1960年就跟着主席，整整16年。

周福明和毛泽东相识的缘分还是从理发开始的。周福明是扬州人，自古扬州的“三把刀”闻名于世：一厨刀，二剪刀，三理发刀。



周福明带着扬州地灵人杰的独特手艺，20岁出头就已经是杭州小有名气的理发师傅了。

1959年12月，毛泽东到杭州视察工作，正巧赶上66岁寿辰。周福明便被派去给主席理发，他不愧是杭州的一块牌子，第一次给主席理发，就给主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已经60多岁的周福明面对女记者的话筒，好像打开了话匣子：“主席觉得我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我多大？24岁嘛。年轻？那时候有成绩的年纪都比较轻。在主席走后不久，也就是1960年初，办公厅来了同志到杭州，问我愿不愿意到北京。北京是大城市，我当然愿意去。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是到主席身边工作。我当时又是紧张又是激动。第一次给主席理发倒没有紧张，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倒是紧张起来，生怕服务不好，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希望。

“主席平时在家办公，对穿戴也没有特殊的要求，我的工作也很轻闲。不久，主席就和我说：‘我理发不多，一星期不过两次，你年纪轻轻应该多做点工作，也好锻炼锻炼自己。跟着卫士长值班，做点管理工作。你看行不行？’因为我刚到主席身边的时候，主席就跟我说过：‘你到我这里就要听我的。’意思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主席这么一说，我当然服从，马上就跟着卫士长学习值班。当时在主席身边有好几个老卫士，他们都没有提拔。主席心里清楚，在他身边工作，提拔得慢，工作也单调，和社会接触少，年纪轻轻经受

的锻炼就少，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所以他不主张卫士们在他身边守到老。1962年我开始独立值班，老卫士们陆续退伍，有的走上社会去经风雨见世面，有的走进学校学习知识。

“毛泽东绝对不是一般人！比方说，毛泽东读书，他读书的毅力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别人或许今天读书，明天又去干别的，主席休息就是读书，他几乎是天天读书，一本接着一本地读，好做没有终止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首先要带的就是书。”周福明是个豪爽朴实的人，他对主席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去世后，他没有离开中南海，至今还忠诚地守护着毛泽东的故居——丰泽园。



1973年为保护毛泽东主席的眼睛，工作人员在书房里试验灯光（左一为周福明，右一为张玉凤）。

“我给主席理发从来不用吹风。你们不信？这不是吹牛。主席的头发比较硬，睡觉起来头发就乱了，用主席自己的话说：怒发冲冠。我就给他用热毛巾敷，然后再用篦子反复篦，直到头发顺溜溜。你们看到照片上的主席，那头发理得怎么样？”周福明由衷地表达了

因为在那个年代承担了特殊使命的自豪。

“主席一般不发脾气。不过你别惹到他，惹了他，那发脾气可是厉害。”周福明认真地对女记者说。

“记得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天气比较热，太阳也厉害。主席站了一会儿就出汗了，额头上，脖子上都有汗。我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别人就推我，说主席脸上有汗，快去擦擦。我就拿着毛巾上前想给主席擦，还没有走到跟前，主席就生气了，用手使劲把我扒拉开，意思说在公开场合，别人出汗都没有人擦，主席就该特殊了？我被主席扒拉开，知道主席发火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搀扶他的是周福明。



的同志，平时很少惹主席发火的。主席就这一下已经够我受的，哪里还敢再违背他的意志？只好眼睁睁地见他在太阳底下晒得汗流满面，也不能上前为他擦汗。事后，主席也没有再批评我，以后在公开场合，我就非常注意了，不敢再冒冒失失地为主席服务了。”

“主席爱游泳，平时在中南海也游泳吗？”

“主席泳游得可好啦！60年代几乎天天游泳，一般都是下午3点下水，游半小时。在家时他去中南海游泳池游，中南海游泳池是开放的，中南海工作人员也是到这个游泳池游泳，有时碰到主席去游泳，大家有礼貌地让主席先下水。主席一见大家坐在池子边上，不高兴了，‘怎么我一来，你们都上来了？下去下去都下去！’主席挥动大手把大家往水里赶，大家被主席逗得直乐，稀里哗啦往水里跳。主席见人都下去了，这才满意，慢慢下水游了起来。”

“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女记者开心地连连叫道。

“主席对我们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举一个例子，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比较紧张，照顾不了家。结果我的二孩子得了败血症，住进了医院。主席知道了，马上叫我回家照顾孩子，后来又派人给我送来500元，说是给孩子治病用。我接过钱，泪水就不住地往下淌，500元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真是救命的钱哪！孩子的病治好了。这命是医生救的，是主席给的。至今想起我都忍不住想落泪……”周福明的眼眶红了，哽咽着快说不下去了。“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

几乎都用过主席的钱，有多有少……”

“主席去世已经27年了，可是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看见有主席身影的电影电视，一看见，就要流泪，我太想念他老人家了。他对我们太亲了。比亲人还亲！我这一辈子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结束采访时周福明已是泪水涟涟，不再年轻的脸上写着他无限的思念和对以前岁月的向往。如果有人告诉他，毛泽东早已逝去了，不要再激动了，他表面点头，内心一定会说，主席在别人眼里是永远地走了，在我心里却是永远地活着……

